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尚全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副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要高度重视农村中低收入者问题

马晓河 (005)

大型银行面临金融摩擦风险的前瞻性评估

黄志凌 (013)

“后疫情 + 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与需求侧改革

贾 康 (027)

· 国际经济 ·

基于全链路跨境电商的数字化新外贸研究

——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例

王晓红 夏友仁 梅冠群 梁 鹏 郭 霞 李 蕊 (035)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复苏面临潜在风险

——2020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和 2021 年展望

张国洪 李婧婧 王庭锡 郝悦 胡晨沛 (055)

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基于英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任继球 (068)

美国减税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刘栩畅 (086)

北极地区能源问题研究 魏 蔚 陈文晖 (097)

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研究 颜少君 (110)

• 名人观察 •

正确认识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 范恒山 (121)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6)

CONT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Low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Rural Areas	<i>Ma Xiaohe</i> (005)
Prospective Assessment for the Risks of Financial Frictions Faced by Large Banks	<i>Huang Zhiling</i> (013)
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Demand-side Reform During the “Post-Pandemic and New Economy” Era	<i>Jia Kang</i> (027)
Research on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Based on Full-link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Case Study of Alibaba International Station	<i>Wang Xiaohong , Xia Youren , Mei Guanqun , Liang Peng , Guo Xia , Li Rui</i> (035)
The World Economy is in Deep Recession and Recovery Faces Potential Risks ——Review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0 and Outlook for 2021	<i>Zhang Guohong , Li Jingjing , Wang Tingxi , Hao Yue , Hu Chenpei</i> (055)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of the World Factory: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Ren Jiqiu</i> (068)
The Impact of U. S. Tax Reduc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i>Liu Xuchang</i> (086)
Research on Energy Issues in the Arctic Region	<i>Wei Yu , Chen Wenhui</i> (097)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Yan Shaojun</i> (11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要高度重视农村中低收入者问题

马晓河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农村中低收入者问题。目前衡量中低收入者的方法中，排除法较适合中国。按照排除法，不管用购买力平价还是实际汇率计算，我国农村的中低收入者占比都较高，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进程缓慢。当前面临着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农业收益率下降、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冲击农民非农就业、城镇化进程放慢、基础性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建议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实施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支持力度，实施农村中低收入者就业专项工程，落实“全面取消”“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政策，加快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关键词：乡村振兴 中低收入人口 农业农村政策

作者简介：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2020年11月，随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已实现全国贫困县清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任务。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还将面临着大面积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以下简称中低收入人口）问题。今后，我国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过程中，将这部分中低收入人口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问题，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一、目前我国农村有多少中低收入者

衡量中低收入者有三种方法：第一，按照世行贫困标准，极贫国家每人每天收入按购买力平价为1.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3.2美元，高收入国家为5.5美元。以此计算出不

同收入类型国家的贫困人口，在贫困人口和中等收入人口之间的人群就是中低收入人群；第二，比例法，即按照一国人口收入的中位值，以此基数分别确定中等收入的下限比例和上限比例，处于下限比例以下者为中低收入人群；第三，排除法，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年人每天收入/消费在 10~100 美元者为中等收入人群，在 10 美元以下者为中低收入人群。

由于我国在现行标准下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人群问题，运用第一种方法因标准不同又会测算出许多绝对贫困人口，显然不可行。比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 年我国农村仍然有 11032 万人人均收入每人每天低于 2.76 美元。运用第二种方法，以人均收入中位数确定上下限比例，明显带有人为因素。而且，以此种方法测算，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无论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一个相对恒定的中等收入人群，在中低收入阶段会人为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规模，相反在中上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又会人为增加中低收入人群规模。因此，这里我们选择第三种方法进行测算。按世界银行标准，中等收入者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 10~100 美元（购买力平价），也即年收入 3650~36500 美元。以 2019 年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折算人民币汇率 1:4.224 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年收入 15418~154180 元人民币。以此推算，凡年收入在 15418 元以下者都属于世界银行标准范畴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以下统称中低收入人群）。

以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衡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到 2019 年城镇居民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的范围已扩大到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也就是说当年我国城镇人口中，100%的居民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最低收入界限。再看农村，到 2019 年，农村居民中只有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属于世界银行标准范围的中等收入人群，而其他三类收入组都属于人均每天收入在 10 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就是说，当年农村还有 60%的人口，即 33096 万人每人每天收入低于 10 美元。其中，有 11032 万人口人均每人每天收入不足 3 美元（表 1）。

表 1 2019 年中国每人每天收入低于 10 美元的人群分布结构

	人均年收入（元）	每人每天收入（美元）	人口数（万人）
农村低收入组	4263	2.76	11032
农村中低收入组	9754	6.33	11032
农村中等收入组	13984	9.07	1103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按此方法，假定我国城镇高收入组中有一半为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人群，那么2019年中国城镇有90%，即76359万人属于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人群，农村有22065万人为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人群。这样，到2019年全国城乡有中等收入人群98424万人，占总人口的70.3%；中低收入人群为33096万人，占总人口的23.64%。即2019年中国有70.3%的人口已经成长为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人群。显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城镇没有中低收入人群是不客观的，同时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也被明显高估了。笔者以为，这种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太大的偏差。

从另一个角度识别，按实际汇率计算，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6.8985，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者标准折算人民币为人均年收入25180元到251800元人民币。以此推算，凡年收入在25180元以下者都属于世界银行标准的中低收入人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中，已经有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都进入了世行标准范畴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样，假定城镇高收入组中有一半是世界银行标准的高收入人群，那么当年城镇中等收入者数量达到城镇总人口的70%，即59390万人，另外有20%的城镇人口低于10美元/人天，这部分人口约为16969万人。

再来测算农村：到了2019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只有高收入组进入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人群范畴。其余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都属于世界银行标准界定的中低收入人群。据此测算，2019年农村人口中还有80%，即44130万人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0美元，其中低于4美元的人口多达22064万人。

如果将2019年我国城镇每人每天人均低于10美元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共有中低收入人口61099万人，这意味着2019年全国还有43.6%的人口属于中低收入人群。同时，全国城乡也有70422万人为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比重的50.3%。从这个结果看，无论是从中等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比例，还是中低收入人群占比看，似乎比按购买力平价测算出的结果离实际情况要更近一些。

由上述测算可以看出，不管用购买力平价还是实际汇率计算，我国农村的中低收入人群还比较多，占全国人口比例也较高。

二、农村中低收入者比例高的五大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比例高，迈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进程缓慢，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入围”中等收入群体步伐变慢

自 2010 年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由 2010 年同比增长 11.4% 下降到 2019 年的 6.2%。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更是下降到 3.8%（图 1）。今后，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势必会延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更高台阶的步伐，也会推迟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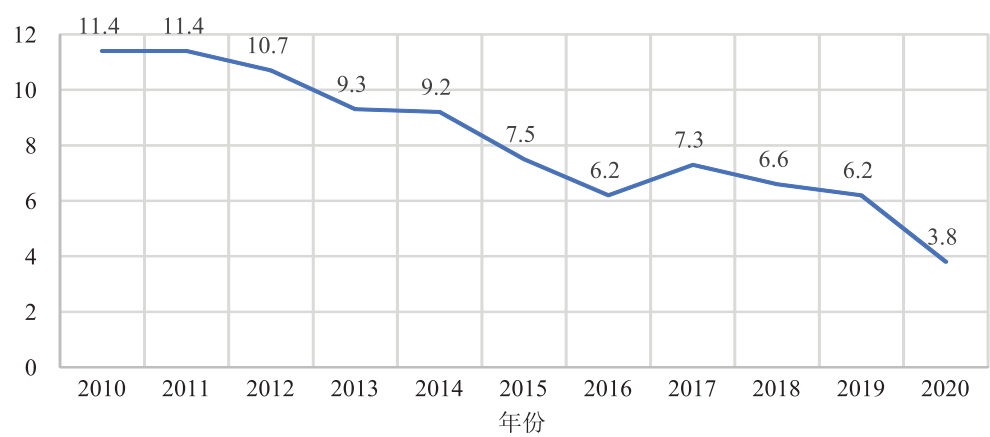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以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变动曲线 (%)

数据来源：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20》计算，2020 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农业收益率下降，中低收入人群增收变难

农村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一般选择进城打工或者留在农村务农。多年来，农业的生产成本一直在上升，收益率在不断下降。2013—2018 年，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上升了 6.6%，两种油料每亩总成本上升了 7.8%，棉花成本上升了 4.5%，大豆成本上升了 6.5%，甘蔗成本上升了 12.2%，苹果成本上升了 9.3%。由于农产品生产总成本上升，主要农产品收益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粮食、大豆、油料、棉花亩净利润全部由正转负，糖料、烤烟、苹果等产品每亩净利润也出现下降（见表 2）。主要农产品收益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对收入主要来自务农的农民来说，走出“低收入困境”的难度势必会越来越大。

（三）产业结构冲击农民非农就业，务工创收空间变窄

2014 年以来，我国工业用工人数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表 3），2019 年与 2014 年相比，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数量减少了 2048.1 万个，下降了 20.5%，其中国有及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外资和港澳台工业企业分别下降 23.0%、7.4%、29.3%。今后，以下三方面的变化还将继续减少工业企业用工数量。第一，企业成本全面上升条

件下部分制造业可能加快向东南亚转移；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的国际市场对我国中低端制成品需求将继续下降；第三，工业资本深化特别是智能化改造将不断减少工业劳动力需求。这些变量会大大增加农民就业困难，农民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收入增长也可能会延续下降势头。

表 2 2013—2018 年我国重要农产品净利润情况 单位：元/亩

年份	三种粮食	两种油料	棉花	大豆	甘蔗	苹果	烤烟
2013	72.94	13.25	－214.98	33.68	116.81	3246.72	－37.30
2014	124.78	－8.98	－686.44	－25.73	－150.04	3480.85	－146.08
2015	19.55	－81.67	－921.55	－115.09	117.80	2128.34	278.57
2016	－80.28	－30.22	－488.30	－205.81	410.45	896.80	－112.13
2018	－85.59	－79.99	－460.90	－192.04	331.31	2614.02	83.61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19。

表 3 2014—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人数变化 单位：万人

年份	总计	国有及控股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港澳台企业
2014	9977.2	1842.7	3505.3	2472.4
2015	9775.0	1777.8	3464.0	2355.4
2016	9475.6	1695.9	3397.8	2182.4
2017	8957.9	1595.8	3230.0	2052.3
2018	8356.4	1524.1	3318.6	1856.9
2019	7929.1	1418.5	3245.4	1748.3
2014—2019	2048.1	424.2	259.9	724.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当然，“十四五”期间服务业的发展会吸纳一些从工业领域流转出来的劳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领域的“互联网+”“5G+”和形形色色的电商正在替代传统的商贸、物流、金融等行业，已经造成传统服务行业的衰退。因此，服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首先是对传统服务业的替代，其次才是规模扩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业等领域大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同时需求弹性还低于传统服务业。这无疑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难的矛盾，使得农民依靠非农就业增加收入也遇到了难题。

（四）城镇化进程放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阻力变大

转移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最主要途径是城镇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最快时期恰恰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处于中上等收入阶段。2010 年以后，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到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10261 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此时我国城镇化应处于加快发展时期，城镇化水平理应达到甚至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60.6%，户籍城镇化 45%，不但明显低于同类国家水平，而且近几年城镇化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三个问题。第一，一些城市出现了产业收缩，进而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收缩。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不当干预导致城镇人口密度下降，甚至有些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挤走了大量中低端人口，使得城市人口数量趋于下降。第三，城镇化进程在中上等收入阶段提前出现了减缓趋势。按常住人口计算，2010 年我国城镇化率上升 1.61 个百分点，2015 年上升 1.33 个百分点，2017 年上升了 1.17 个百分点，2018 年上升了 1.06 个百分点，2019 年上升了 1.02 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尽管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除了超大城市外的其他城市实行“全面取消”“全面放宽”的改革措施，但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缺失，许多农民进城只能是“望城兴叹”。

（五）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足，中低收入群体突破困局能力变弱

当前，针对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他们短期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缺乏支撑保障。比如，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者收入分配比重不高，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基础养老保障、贫困救助标准都不高。这些社会保障只解决了“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忧”（后顾之忧）的问题。还有，农民财产性收入还缺乏体制保障，土地制度改革还在“路上”，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所有这些都会使中低收入人群难以在短期内提高收入水平，很快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三、建议实施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十年倍增计划

当前和今后，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国最需要的是提高消费持续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从消费增长潜力分析，多年以来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要高于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农村居民中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最高的。就是说今后我国要想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

撑力，就要把重点放到农村，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特别是要提高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

为此，针对农村中低收入人口比例高、人口多的问题，建议统筹城乡融合、制度改革，从 2021 年开始实施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现有各收入组人均收入比 2020 年翻一倍，今后每年收入需要增长 7% 左右。如果实现了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目标，届时农村居民中将有绝大部分人口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农村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做好“加法”。第一，大力增加公共投资，用 5~10 年时间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将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到接近城市水平。为此，建议首先提高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第一步先提高到 40%，下一步提高到 50%。同时建议发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专项国债，用于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第二，适当增加农民发展高附加值农业的投入补贴，可对农民经营农业建立无息贷款专项基金。第三，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包括农业技能、非农业领域的技能培训。第四，较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继续增加农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建议 2021 年开始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上调到 200 元。第五，相应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线标准，实现扶贫标准与国际标准渐进式接轨。

（二）实施农村中低收入者就业专项工程，拓宽增收渠道

积极发展农村新兴服务业，在观光农业、文化旅游、康养休闲、信息服务、智能农业、农村电商、冷链物流等方面拓展就业空间，为中低收入者创造优先便利条件。在对中低收入者技能培训、初始创业投资、用地政策、税费缴纳、市场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对于所有能积极主动吸纳农村中低收入者就业的企业，也要从政策上给予激励支持。

（三）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两个全面”“一个完善”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改革政策，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

及时调整城镇化战略，从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转向实施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的战略思路。上建“群”即在全国区域布局上，构建几个大城市群；中构“圈”即在城市群内部发展若干城市圈，通过群圈结合提升和带动城镇化；下强“底”即提高现有小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下扩“底”即把现有贴近城市群、都市

圈的人口超过 2000 人以上的行政村全部按城市标准建成小城镇，并推进这些小城镇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所在城市群实现同城化和一体化。以此大幅扩展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空间，使他们有更多改变身份的机会。同时，中央政府应该明确各大中城市“两个全面”“一个完善”^①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条件的最后期限，对在期限内率先开放放宽的城市给予政策激励，对超过期限“不打开城门”的管理者，要实施处罚措施。

此外，要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尽量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成本。为了便于实现劳动力跨区自由流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也能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异地转移接续。中央政府可以承担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生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由政府承担的那部分公共支出；地方政府承担住房保障、劳动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贫困救助等事权责任；企业承担农民工进城就业需要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支出；其他落户成本由进城农民个人负担。

（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础性安排

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分配比重，把重点放到缩小城乡居民、阶层群体收入绝对差距扩大方面。同时，也要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制度条件。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要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级政府要逐渐退出土地市场，公益性征地应按市场价格交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享受同城镇国有土地一样的政策待遇，可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农民承包地按市场原则流转。农民的宅基地及其建筑物流转交易要坚持市场化方向，秉持与市民同等待遇的原则，尽快出台改革落地方案，让农民也能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尽快获得财产性收益。

参考文献：

1. 马晓河：《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2. 李培林：《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3. 李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破户籍制约、就业歧视》，《新京报》2020 年 11 月 25 日。
4. 皮海洲：《稳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需要制度倾斜》，《新京报》2020 年 11 月 8 日。
5. 洪岚主编：《制度与贫困——以制度演进促进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6 年版。

责任编辑：谷 岳

^①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指出，要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人以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人的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人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积分落户政策。

大型银行面临金融摩擦风险的前瞻性评估

黄志凌

摘要：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摩擦已经由常规贸易领域转向技术领域。如果美国不能从贸易领域达到自身政治目标或战略目标，又或者美国的根本目标就是遏制中国发展等，则贸易摩擦升级至金融领域将会是必然的。美国极端场景下可能对国内商业银行采取如下封锁或攻击措施：一是金融市场禁入，封锁交易渠道，禁止被制裁银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是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二是切断清算体系，封锁被制裁银行美元甚至是其他外币的清算渠道；三是 IT 技术封锁或攻击，禁止被制裁银行使用美国公司的 IT 硬件及软件服务，极端情景下采取技术攻击。鉴于国内商业银行对美国存在相当大的运营依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保持警惕，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极端场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一是拓展交易渠道，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金融市场禁入的制裁措施；二是高度重视国际清算受到限制的风险；三是为应对美国的 IT 技术封锁，也可以针对几种可能发生的制裁场景分别做好应急预案。

关键词：大型银行 金融摩擦 金融风险 前瞻性评估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研究员。

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摩擦已经由常规贸易领域转向技术领域，下一步会不会转向银行领域，目前还不好判断。但有几点应该比较确定：一是如果美国政局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依据现有的行事风格推测，将对华制裁的战火扩大至金融领域，尤其是对准国有银行体系，概率还是很大的；二是现任美国政府对高端产业的对华技术封锁政策并不

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合规借口对中资银行实施一定制裁的金融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三是中国一些银行日常运行的硬件与软件对美国存在技术依赖，很容易成为美国会顺势扩大对华技术摩擦的新领域；四是虽然美国中短期内对华发起类似于对伊朗、朝鲜那样的极端情景金融制裁的可能性不大，但大型银行肯定会受到美国政客的“特别关注”，我们必须做好前瞻性准备。

一、贸易摩擦升级至金融领域的可能性判断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开始针对对立国家使用金融制裁，2000 年后使用的频率显著增加。美国金融制裁的手段多样，从最初的冻结制裁对象资产，禁止向制裁对象提供金融服务，到切断第三方援助，近年来发展至通过封锁清算支付渠道，切断对立国整个金融体系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制裁向制裁对象提供金融服务的第三国机构。美元在全球清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叠加美国对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影响力是美国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基础，目前也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金融制裁较经济制裁成本更低，打击更精准。从美国与伊朗、俄罗斯、朝鲜等对立国家发生冲突的历史来看，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升级至金融领域。市场也普遍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延伸至金融领域。如果美国不能从贸易领域达到自身政治目标或战略目标，又或者美国的根本目标就是遏制中国发展等，则贸易摩擦升级至金融领域将会是必然的。

从 2018 年 3 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情况看，美国短期内全面封锁中国银行体系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借口涉朝、涉伊、反洗钱、反恐怖、国家安全以及香港、新疆等因素制裁一家或几家中国金融机构的可能性，且制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可能性很大。结合美国对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的金融制裁典型案例及贸易摩擦前期对中兴、华为等公司的技术封锁案例，美国极端场景下可能对国内商业银行采取如下封锁或攻击措施：一是金融市场禁入，封锁交易渠道，禁止被制裁银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是全球主要金融市场。这是美国较常用的封锁手段。二是切断清算体系，封锁被制裁银行美元甚至是其他外币的清算渠道。该手段打击精准，从美国以前与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的冲突来看，一般是在采取金融市场禁入措施后，冲突再次升级时使用。三是信息技术（IT）封锁或攻击，禁止被制裁银行使用美国公司的 IT 硬件及软件服务，极端情景下采取技术攻击。目前美国仅针对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实行技术封锁，暂时没有对金融机构进行 IT 技术封锁或攻击的迹象。

从战略重要性的角度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受到美国重视是必然的。现阶段，银

行业仍然是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更是银行业的中流砥柱。2019 年末上市银行总资产规模达 196.47 万亿元，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82.04%，其中 6 家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 116.78 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42.27%。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通过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资金融通、财务管理以及风险控制等金融服务，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地位重要，而且还存在对美国核心能力的依赖，更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与兴奋。就现状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美国核心能力的依赖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易渠道，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元交易市场，包括场外及场内交易，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彭博终端等。二是清算渠道，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外币资产及负债以美元为主，其美元清算需通过美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账户和清算服务，美国利用美元的核心地位掌握着贸易结算与支付渠道的话语权。三是 IT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硬件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网络系统和应用系统，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美国科技公司的 IT 核心技术有不同程度的依赖。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各国的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和促进，逐渐整合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泛采用的新技术、不断形成的新市场、层出不穷的新工具以及新的交易方式，对金融全球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汇率交易为例，电子交易平台已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场所，主要包括毅联汇业（ICAP）旗下的 EBS、彭博外汇交易系统、路孚特旗下的 FXT、360T 等，这类电子平台日均交易额接近 3 万亿美元，占比超过 50%。这些平台显著增强了市场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与此同时，面对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和日益增长的全球资产配置要求，中资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电子交易渠道的依赖也不断加强。如果一家银行失去金融市场电子交易渠道的准入资格，意味着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的地位将显著降低，投资交易渠道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得不通过其他代理机构进入市场。由于不能直接进入全球交易市场，资产价格发现的难度提升，增加了金融机构投资交易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成本；同时，在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时，对于资产敞口的管理难度也将显著增加，交易的执行效率大幅降低。

国际清算体系是由提供支付清算服务的中介机构和实现支付指令传送及资金清算的系统共同组成，是一种用以实现债权债务清偿及资金转移的金融安排。以美元为例，无论哪种清算方式，必然需要通过美国的银行和美元清算系统，后者主要包括纽约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HIPS）、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以及 SWIFT。无论是

美国的银行还是美元清算系统，都受美国政府管辖，因此，被制裁的个体或机构的清算交易将受到严格审查、被拒绝服务甚至被冻结或没收，美元清算服务是美国金融制裁的关键一环。

如果一家银行与国际清算体系的连接被切断，意味着这家银行自身发起的所有外币收付业务都将无法进行，所有外币资产负债均处于无法支配的状态，银行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及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将受到重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第三方制裁的影响，其他金融机构和经营跨国业务的企业集团出于制裁威胁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将中止与被制裁机构的业务合作，被制裁机构将无法开立或维持清算账户，无法满足客户的取款请求，引发银行挤兑现象。

二、假想 IT 技术封锁或攻击情景的专业分析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目前在主机硬件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网络系统及应用系统等方面对美国公司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如美国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 IT 技术封锁或攻击，预计将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生产安全、数据安全和业务运营造成较为严重影响。

第一，关于主机硬件设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使用的来自美国公司的硬件主要有大型机、小型机和微型机。大型机硬件及其操作系统、相关应用是 IBM 的自主知识产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市场上没有直接替代产品。大型机主要有部署简单、无需多节点配置的优点，但是售价高、维护困难、单点依赖性较强。小型机一般用于数据库服务器，是一种运行 Unix、AIX 系统的封闭专用计算机系统，供应商也以 IBM、惠普为主。微型机国内有供应商可提供成熟产品，包括华为、联想、新华三、浪潮等。大型机、小型机可由微机集群替代，将大型机、小型机上的应用迁移到微机集群可部分实现自主可控，一些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已顺利迁移到由微型机组成的分布式服务器架构。国内微型机供应商完成的主要工作是集成和组装，配件都是由相应配件厂商供应，包括：中央处理器（CPU）、主板、硬盘、内存等。其中主板、硬盘、内存均有来自于台湾、韩国、日本的供应商。技术含量最高、最为核心的是 CPU，主要使用 X86 和 ARM 架构两种类型，其中微型机主要使用美国公司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X86 架构，一些银行的生产以及桌面办公使用的微型机配备基于 X86 架构的处理器；移动设备领域主要使用英国知识产权的 ARM 架构，全球超过 95% 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 ARM 架构。

中国在十几年前已开始进行 CPU 的自主研发，目前国内 CPU 企业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采用国际上成熟的 CPU 核，如上海兆芯、天津海光、天津飞腾、华为海思等。使

用X86 或者 ARM 架构体系，均需要取得国外相关厂商授权才可进行研发和生产。使用成熟架构和技术的优点是生产的 CPU 性能可达到较高水准，且支持国内外主流操作系统，兼容绝大多数应用软件和外设产品；缺点是一旦授权终止，产品研发升级将受阻。另一种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如龙芯中科，优点是基本可以达到自主可控的目标，缺点是工艺不够先进，性能方面和世界领先水平有较大差距，且需操作系统和应用针对芯片做相应的优化，重新构建一套软件生态环境。目前在桌面应用方面，搭载龙芯的计算机已经可以满足一些简单办公的要求，某些军政单位已经开始使用。但在服务器领域，由于对性能要求较高以及缺乏应用支持，短时间内还是需要使用基于 X86 架构的 CPU，龙芯在取得技术突破以及现有应用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前无法做到大规模商业使用。如果美国公司停止向国内商业银行提供主机硬件支持服务，鉴于各类设备的自然生命周期，短期内对银行业务运营及数据安全不会有明显影响，但中长期来看存在缺少技术支持、升级遇阻的安全隐患，同时因不能更新迭代，将影响在主机设备之上部署的各类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软件（各类银行业务应用），严重制约业务发展。

第二，关于操作系统。需要安装操作系统的设备包括生产服务器、桌面办公电脑、生产设备，如自动取款机（ATM 机）等。其中，生产服务器主要使用 Z/OS 大型机操作系统、Linux 系统，桌面办公机、ATM 等生产设备使用 Windows 系统。许多大型银行生产系统特别是核心系统目前运行在大型机上，使用的操作系统是 IBM 的 Z/OS，属于完全封闭的操作系统，市场上尚无替代产品。除大型机外，其他生产服务器主要使用基于 Linux 内核的 RHEL 操作系统。由于 Linux 是一个开源项目，基于 Linux 内核的 RHEL 本身也开源且免费，但可通过付费得到供应商的在线升级、技术支持等服务，譬如一些银行已经使用供应商 REDHAT^① 提供的各种系统支持服务。在生产服务器领域，需要的不只是单纯的操作系统软件，更重要的是对操作系统的服务支持，包括安全、运维、应用支持、咨询、在线升级等。Windows 系统广泛应用于桌面办公电脑以及 ATM 等一系列具有图形界面的生产设备。微软拥有 Windows 系列系统的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在客户购买正版系统后，为客户提供持续的服务，包括安全和应用支持等。目前国内部分厂商已自主研发出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替代产品，如中标麒麟、银河麒麟、深度等操作系统，大多是基于 Linux 内核开发的。这些国产操作系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相应的软

^①REDHAT 是全球最大的 Linux 系统厂商，为客户提供开放资源软件解决方案，主要为客户提供高效能、可扩充、灵活、可靠、安全及稳定的技术，以满足企业所需的 IT 基础建设，在 2018 年被 IBM 以 34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件生态，仅可以满足基本的办公需求，但专业性比较强的软件在这些操作系统中没有对应版本，例如 Adobe 公司的 Photoshop 系列产品。对于一些银行来说，某些自主研发的应用是部署在 Windows 平台的，如需迁移到国产操作系统平台，改造工作量还是很大。操作系统作为各类数据库软件和应用软件运行的基础软件平台，其安全性、健壮性、稳定性、高效率等非常重要，是各类应用软件顺利运行的基石。

第三，关于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系统是为适应数据处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处理系统，也是一个为实际可运行的储存、维护和应用系统提供数据的软件系统，是存储介质、处理对象和管理系统的集合体。数据库系统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数据库、硬件、软件、人员。其中软件中的 DB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数据库管理系统）是核心关键，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据库系统。数据库对技术的要求很高，拥有先发优势的甲骨文、微软、IBM 等老牌厂商长期垄断全球市场。虽然中国数据库起步较晚，但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场景的出现点燃了中国数据库产品的发展，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及需求给国产数据库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已涌现出阿里巴巴、巨杉、腾讯、华为和星环科技等一批厂商。其中阿里巴巴更是入选全球权威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 Gartner 2018 年度“数据库魔力象限”，^① 当年共有 14 家公司入选，其中除思爱普（SAP）来自德国、阿里巴巴来自中国，其余 12 家厂商均来自美国。数据库系统是商业银行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具体到应用场景上，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用于实施交易的核心业务系统；二是用于管理分析的分析类应用，如数据仓库、大数据分析等。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由于业务应用的不同，在数据库选择上较为多元化。总体而言，国内商业银行基于其业务特点，对数据库的可用性、安全性要求很高，一般在重要业务系统或高复杂度业务系统中多以 Oracle、DB2（IBM）等传统商业数据库为主；普通系统也会选择 MySQL 等开源数据库和国产数据库；在数据仓库及管理分析系统上，选择相对更为多元化，包括 Teradata、GreenPlum 等数据库。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基本上是基于国外的数据库系统，Oracle、DB2（IBM）等主流数据库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市场份额。虽然国内也有数据库产品，但是由于性能和稳定性存在差距，基于其开发的信息系统相对较少，在国内银行业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连续两年入榜 Gartner 报告的国内厂商巨杉，其红杉数据库

^①Gartner 每年都会推出数据库系列报告：《数据库魔力象限》《数据库核心能力》《数据库推荐报告》，其中魔力象限门槛严格，每年控制在 11~15 家，评选标准包括全球市场份额、产品能力、客户反馈等，一直让科技巨头不断神往。

(SequoiaDB)为金融级分布式交易性数据库产品，其客户评价得分高于平均值。另外，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OceanBase 广泛应用于蚂蚁金服、网上银行等金融级核心系统，在 2015 年“双十一”活动期间支持了蚂蚁金服 100%的交易、支付及账务流量。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对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数据库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更大的挑战，无论是对于数据安全性的考虑，还是业务连续性的要求，以及数据库故障修复方面的担心，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均需要充分考虑到系统故障带来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数据库产品多来自美国厂商，中美贸易摩擦一旦碰触该领域，美国选择停止提供产品或服务，短期内可能影响不大，但一旦出现故障，尤其是影响到银行核心业务运营，无论是从生产运营、管理分析、企业声誉等方面都会产生极大不良影响。就数据库产品替换而言，与用于运行交易的核心业务系统相比，用于分析管理的数据库替换难度及风险相对较小，但基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庞大的数据量基础及繁多的应用场景，替换也是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一家大型银行自 2015 年便开始与华为合作，替换基于 Teradata 的数据仓库，该项工作历时 4 年时间于 2019 年 6 月底完成。另外，国内厂商的产品稳定性和服务能力还需要在实际运行中进一步验证和提高。至于用于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库系统还依赖操作系统、应用系统，并且对正确性要求很高，对国内商业银行是个十分艰巨的挑战。

第四，关于网络系统。在移动互联的智慧时代，万物皆可连接。然而信息高速公路的构建却离不开基础网络设施，包括各类有线或无线路由器、交换机、云存储、防火墙和其他网络安全设备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业务运行也依赖这些基础网络设备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通信公司，一些大型银行构建网络设施使用的产品也以国产设备为主，包括华为、H3C、锐捷等厂商提供的产品。虽然新购网络基础设备基本不采用国外厂商供货，但早期采购的旧设备当前仍在使用的美国厂商生产的产品（例如 Cisco 交换机），这些网络设备有可能存在着隐藏安全控制手段。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通过外部控制（后门侵入、安全漏洞或恶意攻击）出现网络设备失效，导致银行系统网络大规模瘫痪的风险对银行负面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总体上，因中国已实现网络通信设备自主化研发和量产，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但从规避极端风险的角度考虑，即使大型银行也需不断替换外购网络设备，才能确保业务网络运营安全。

第五，关于应用系统。虽然一些大型银行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新一代业务应用体系基础设施，但该体系内仍有不少专业系统依赖外部厂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极端情景下，

国有商业银行应用系统如果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购应用停止提供服务。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或多或少都购买了外部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软件服务（例如 POMS、Opics 等），某些服务器仍部署在境外，例如 POMS。这些系统的服务器由供应商控制，一旦主动或被动关停应用服务，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少数业务及数据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外部厂商后台监控银行外购软件服务应用。国外软件厂商开发的系统部署在国内的应用系统，例如（以金融市场为例）Kondor+、Opics 等系统，虽然为便于银行自身业务开展或满足管理需要，系统部署在银行自身搭建的服务器环境下，但不排除这些软件留有隐藏后门或安全漏洞，如出于贸易摩擦等国家层面的政治原因，可以实现在特定条件下后台监控或终止提供应用服务，从而影响银行业务正常开展。三是通过系统攻击导致商业银行自身建设的应用系统瘫痪。当前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都建立自身的应用系统体系，这些应用系统的整体安全防护水平良莠不齐。在极端背景下，通过发动大规模黑客或者网络攻击银行自身建设的应用系统，一旦银行应用系统被攻破，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自身整体或局部应用服务的瘫痪，无法提供正常服务，从而对银行业务运营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四是当前应用系统均部署在主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之上，如果这些基础软硬件出现问题，各类应用系统将无法独立存在，业务影响巨大。

三、中短期美国不太可能对华采取极端“金融战”方式， 但需及早制定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对预案

2019 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不断升级，不断挑战市场的心理底线，虽然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压力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并没有达到其战略目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些政客似乎认为“极限施压”有效果（市场与社会担忧），但力度还不够（中国经济数据表现很顽强），以至于许多人士判断美国很可能会对华发动“金融战”，而且是极端情景的“金融战”（只要能够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即使美国承受巨大损失也会付诸实施）。对于美国可能对华发动的金融战，我们不仅要分析判断总体可能性，还要深入分析最大可能性会从什么地方入手，以及实施的方式。以抖音短视频海外版（TikTok）和微信为例，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美国商务部发布（也是不断调整）的对 TikTok 和微信的制裁措施，与特朗普的前期说法甚至是总统令有一定区别。尤其是对于微信的说法，也局限于在美国境内不得提供支付服务。表明他们说出来的话必须有所行动，但具体行动一定是要“算账”的，方案是精细化的。对于美国在华公司和

在日本、欧洲、东南亚公司利用微信的支付功能去吸引中国客户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在美国的华人尤其是留学生和华商的影响比较大。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不会改变，政策力度或许还会不断加码，但暂时还不会丧心病狂。我们不要轻易认为他们会不计后果地采取行动，应该避免“鱼死网破”“破罐子破摔”思维习惯定势。美国的官僚阶层和智库专家还是追求成本最低及利益最大化。我们不能幻想他们的道德底线，但也不能“自己吓死自己”。

具体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频繁发动金融制裁，屡屡得手，对受制裁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形成了很大冲击。许多人习惯于将这种行为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称之为“金融战”。从过往的历史来看，美国挑起金融战的背景各不相同，但发动金融战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实体（包括国家）和个人的金融制裁；二是狙击主权货币，汇率、利率市场，击垮货币体系，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三是切断对外收付的主要渠道，使其对外贸易遭受重创（极端做法是切断美元清算渠道或踢出 SWIFT 组织）；四是阻断国际融资通道，人为制造资本恐慌，从根本上打击投资（习惯上是先关闭其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然后再以五眼联盟为核心构建金融封锁联盟）。

首先，中美博弈中，美国肯定会动用金融制裁，但方式、时机还不好判断，或许美国也还没有“成本最低、对国际金融市场冲击最小、美国最终利益最大”的成熟方案。不管各种名目的金融制裁什么时候发生，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一是美国往往以合规理由对战略遏制的目标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但我们不能将美国所有的对外金融摩擦甚至局部或个案制裁放大成发生了金融战争；二是要警惕美国制造中国金融市场恐慌，阻吓国际资本，甚至借故“攻击”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尤其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银行）的薄弱环节；三是要努力避免美国的金融制裁导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丧失等。

其次，货币安全与自由兑换有关。由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跨境流动受限，人民币资本项目并未开放，人民币汇率若被狙击对经济与金融产生破坏性冲击的概率非常小。据统计，2015 年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离岸人民币的存量 2014 年达到峰值约 30000 万亿元左右。当索罗斯放话要进行狙击后，央行及时收缩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存量，停止并收回账户行融资渠道，扩流入、控流出，离岸人民币的存量持续下降，从 2016 年至 2020 年 6 月底，离岸人民币存量大约 11000 万亿元左右。其中香港地区的离岸人民币存款近年来稳定在 6000 万亿元左右。

再者，关于透过国际清算体系实施制裁。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前文已经介绍过，针

对市场上的一些担忧再多做一些分析。任何一笔汇款的执行都是由“汇款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两部分组成。“汇款信息流动”主要在 SWIFT 平台上完成。SWIFT 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纽约分别设立交换中心（Swifiting Center），并为各参加国开设集线中心（National Concentration），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服务。SWIFT 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遵守 ISO 中有关创建和维护金融电文的标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Message）来完成金融交易。除此之外，SWIFT 还向金融机构销售软件和服务，其中大部分的用户都在使用 SWIFT 网络。到 2015 年为止，SWIFT 的服务已经遍及全球 2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11000 多家银行、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司客户，每日处理的报文次数达到 1500 万次。“SWIFT 的目标是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为了确保安全准确地完成对私有的、保密的、专利的金融报文的通讯、传输以及路由等行为，研究、创造一切必要的方法，并且将其付诸使用和操作。”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库和几家相应的银行）所依赖的技术十分简陋：支付与确认信息是通过 Telex 网络来实现的，既慢又不安全。Telex 的速度只有 50 波特/秒，大致相当于 8 字节/秒，格式松散，大大增加了自动接收报文的难度；Testkey 是以报文的一小段内容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毫无安全性可言。为了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 1974 年，7 家主要的国际性银行举行了会谈，最终成立了 SWIFT。1977 年，其成员便拓展到了 230 家银行，遍及 5 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报文的类型呈爆炸性的增长，每年都有新型的报文出现，全方面覆盖了金融交易。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报文交易量，网络基础设施不断更新，老式的网络被 X.25 取代，而在不久前的 SWIFTNet Phase 1 阶段，基于 IP 的互联网又取代了 X.25。一旦 SWIFT 接收了报文，就会对它全权负责，这使得 SWIFT 网络具备了内在的安全性和健壮性（每年持续运营的时间比率超过 99.99%）。因此，SWIFT 在市场上的地位不可动摇。

SWIFT 仅仅是个信息渠道，不牵涉资金的真正划转，但“汇款信息流动”驱动其后的实际“资金流动”。在跨境美元支付活动中，资金流动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 Fedwire，美国央行清算系统；二是 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三是美元清算行，以内部转账（Book Transfer）的形式完成。从操作意义上看，由于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Fedwire、CHIPS 和美元清算账户行又是美国自主控制的，只要这三个支付系统对与中国相关的美元资金不进行清算划转，就可以对中国金融与贸易构成重大影响。然而，由于中国是最大的商品贸易经济体，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存在密切经济关系，贸然全面关闭对华美元清算系统，将带来什么样的经济与金融震荡，尤其是对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华尔街来说是难以估量的。对此，美国应该很清楚。

有人还担忧最极端的情况，美国利用长臂管辖原则，掐断中资所有机构使用 SWIFT。由于 SWIFT 的特殊结构，美国并不能直接干预 SWIFT 的决策。历史上美国曾经运用其影响力，将伊朗、古巴、朝鲜“踢出”SWIFT，但这些国家都是小型经济体，报文的数量很小，而且都是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所以掐断 SWIFT 成为可能。而对于如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美国也仅仅是对金融机构、能源及军工行业和一些个人进行制裁，并没有掐断俄罗斯的美元 SWIFT 报文，更不用说掐断所有币种的 SWIFT 报文。

我们关注的是，在“9·11”以后，迫于美国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恐压力，SWIFT 组织对美国开放所有报文信息，美国藉此能监控到全球交易、资金流向。理论上，由于 SWIFT 组织向美国开放了报文信息，美国能监控到我们所有的汇款信息流。因此，怎样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封闭的汇款信息流，保证我们信息、贸易、资金的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加快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建设，有助于减轻美国压力。但目前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不仅占比低，而且扣除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之后的真正国际清算量很小，对美元清算体系的替代能力十分有限。根据 SWIFT 统计的全球支付数据，近年来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排名在第五和第六之间浮动，截至 2020 年 6 月的数据显示，虽然人民币排名第五，但只有 1.76% 的份额，而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分别为 40.33%、34.1%、7.08% 和 3.74%。并且，根据 SWIFT 统计数据，2019 年全年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经济体中，香港占有近 72% 的份额。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阻断国际融资问题。国际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自己很重视国际资本，美国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一些人士担忧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关闭资本市场？这种担忧也不是无中生有，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借助监管合规性问题不断向市场发出信号。但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下，美国对华关闭资本市场可能难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尤其是在国际游资过剩的大背景下，在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多元化的格局下，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金融市场封锁难以见效，而联合欧日组成封锁圈的可能性也不大。有人问，欧洲和日本为什么会加入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封锁。这可能是欧日出于同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地缘政治的担忧。日本对中国崛起存在疑虑，也有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纠葛，也有可能配合美国的对华金融封锁行动。但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很小，欧洲或许名义上会配合美国，但实际上会想办法填补日美制裁留下的市场空缺。面对美国可能的金融市场封锁，我们应最大限度地

避免美国拉拢日欧形成国际金融封锁圈。

尽管如此，透过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案例，我们还是应该早做预案。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没有采取类似对古巴、朝鲜、伊朗等小国家的全面制裁，而是采取针对特定人物（普京的亲信）和特定行业的精准制裁，重点针对俄经济两大支柱行业——能源和军工。技术封锁措施主要包括限制与俄油气企业合作、禁止向俄出口油气勘探开采所需设备和技术、禁止与俄签署武器进出口合同、禁止向俄出口武器生产所需的高科技材料。金融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冻结相关个人和企业的资产、切断俄罗斯国有银行和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国际支付体系停止向受制裁的俄银行提供支付服务。到 2020 年 8 月为止，俄罗斯约有 415 名个人、525 个实体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等俄最大能源企业均在制裁之列，这些油气公司勘探油气、钻井以及铺设管道都需要巨额资金。由于俄罗斯本身金融市场不发达，大型油气公司在欧洲资本市场筹资的渠道被掐断。即使对能源和军工的金融制裁也并没有停止全面的交易，只是融资的期限不断缩短，譬如对俄能源和军工企业的融资期限最长从 30 天降低到 14 天等，也没有全面阻断俄罗斯的美元支付体系。美国之所以这样操作，是出于四方面的考量：一是外交上，制裁初期，顾及欧洲盟友的利益，留有回旋余地；二是制裁方式上，预留对俄制裁政策上升的空间；三是从经济方面，美国也不愿意彻底丢掉俄罗斯的市场；四是更为重要的出于制裁效果的考量。对俄罗斯这样具有一定经济实力，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结构相对完整的国家，美国即使耗费巨大也不能够彻底封锁，而且容易误伤“盟友”，产生同盟内部纠纷和麻烦，甚至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冲击。为此，美国选择俄罗斯最具有优势和急需国际资本的两个行业实行金融制裁，进行精准打击。金融制裁在初期（2014 年）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汇储备下降 20%，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 25%。但俄罗斯经济并没有一蹶不振，俄罗斯打出组合拳，深化和其他国家战略合作关系、颁布反制裁法令、调整经济结构、开展金融业的梳理整顿。金融机构也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保证流动性，不发生系统性危机，咨询境外律师事务所对受限业务的边界进行界定，银行持续在境外布局，更多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2015 年以后，俄罗斯的 GDP、外汇储备以及银行业利润开始持续回升。

鉴于国内商业银行对美国存在相当大的运营依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保持警惕，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极端场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一是拓展交易渠道，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金融市场禁入的制裁措施。情景策略之一，被禁止参与与美国相关的场内外交易市场。可选择欧洲或其他地区交易所，使用国内交

易平台、其他国家公司提供的多银行平台和单一银行平台、电子邮件、电话等多种交易渠道。情景策略之二，更严重的，美国使用“长臂管辖”，干预其他国家公司提供的交易平台，禁止中国商业银行使用。可使用国内交易平台、电子邮件和电话等交易渠道。同时可向监管机构及国内交易平台公司提出建议，积极推广中国主导的交易平台，吸引境外参与者，扩大中国交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高度重视国际清算受到限制的风险。鉴于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核心地位，如果美国刻意切断中国商业银行的清算渠道，目前尚无实际有效的应对方案，但不同情景还是有相应的回旋余地。情景一，美国限制或禁止中国商业银行美元结算。被制裁银行将无法参与在岸美元清算，但理论上作为应对方案，被制裁银行可选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银行开立离岸美元账户。情景二，美国限制或禁止中国商业银行使用 SWIFT 报文平台。这虽然直接影响被制裁银行所有外币业务清算，但理论上可使用网银或经有权人签字的手工付款书等方式作为替代，向账户行发送付款指令。当然，这种理论上存在的应对方案，实际操作可能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一旦一家商业银行被美国制裁，账户行与交易对手考虑到自身合规风险，会减少甚至避免与被制裁银行的交易。长远来看，只有提高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才能降低此制裁方式的影响。因此，必须积极推动贸易支付结算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做大做强。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在外币资产负债布局中，应逐步减少美元业务占比，适度增加欧元及亚洲货币资产负债品种，拓展非美业务，扩大非美交易对手、交易渠道，不断减少对美业务依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与金融同业之间保持紧密的双向连接，在金融双向往来较大的情况下，金融制裁的机会成本更高，可能遇到的反对阻力更大。

三是为应对美国的 IT 技术封锁，也可以针对以下几种场景分别做好应急预案。情景一，对于本地部署的外购硬件和软件，美国公司停止提供支持服务。考虑软硬件设备自然生命周期，初步判断短期内对业务运营和数据安全不会有显著影响，但一旦硬件（主机及网络设备）或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发生故障，则会因缺少技术支持严重影响业务正常运营。可以考虑的应对方案为：其一，提高对于外购软件和硬件的自主运营维护能力；其二，逐渐使用国产硬件（主机、网络）和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进行替代，对各类应用系统进行适应性改造。商业银行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无论从底层主机硬件和网络设备，还是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甚至是部署在此之上的各类业务应用软件，已经深入依赖各类 IT 信息系统支撑，在当前业务体量、关联复杂度及业务发展阶段，无法做到全部恢复为手工业务处理。如果美国使用 IT 封锁的方式对中国金融机构进

行制裁，若主机、数据库、操作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部署在之上的新一代体系无法运营，实际影响面将极为巨大和深远，预计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为从根本应对此类极端场景发生，建议尽快针对主机硬件（大、小型机、网络设备）、操作系统及数据库软件进行详细梳理分析，充分做好国产设备的可行性替换方案后，研究实施自主更换的可行性。情景二，美国通过各类硬件和软件后门或安全漏洞干预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营，或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发起攻击，造成 IT 信息系统瘫痪，进而导致业务瘫痪。理论上各类主机设备、网络设备、数据库系统、操作系统设计之初均有可能不同程度存在超级用户管理权限（后门）或安全漏洞。如果这些后门或漏洞被恶意利用，也可能对中国商业银行安全运营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应彻查和整改各类外购主机设备、网络设备、操作系统及数据库系统的系统管理及软件包安全隐患，确保系统安全性，杜绝安全管理后门和安全漏洞等情况出现；做好各类网络安全保障，尤其是外网的安全防护等级，提高安全防护水平，杜绝因被境外、异地攻击而影响业务的可能；按照情景一的应对措施，做好基础设施（主机、网络）及软件（数据库、操作系统）的自主更换及各类应用系统的配套改造。情景三，对于服务器不在本地部署的系统，美国公司停止提供服务。当前国内银行绝大多数系统服务器均部署在本地，只有极少量业务系统部署在美国（例如 POMS 系统中的外币债券业务），整体判断影响很小。该情况下，个别业务数据安全和个别业务连续性将受到影响。建议做好本地数据备份，做好业务应急预案，例如手工处理，确保紧急情况下业务正常运行。对于非本地部署的外购系统，尽早使用国产本地部署系统替代。

综上，针对美国对中国采用 IT 技术封锁或攻击的极端场景，长远来看，只有通过研发具有自身核心能力的 IT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减少或杜绝对外购硬件、软件的依赖，才能根本避免极端场景下的影响。仅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自身难以实现这个目标，而是需要国家在战略层面进行统一部署和推动。

参考文献：

1. 黄志凌：《贸易摩擦的确定性与强化金融基础的紧迫性分析》，《全球化》2019 年第 9 期。
2. 黄志凌：《关于金融战的理解》，《全球化》2020 年第 3 期。
3. 陈文玲：《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与运作密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年 3 月号。

责任编辑：谷 岳

“后疫情+新经济”时代的 健康产业发展与需求侧改革

贾 康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类社会生活，到目前为止其变化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认为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我们一方面对疫情应有打“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需针对性地考察分析疫情造成的突出问题和后疫情时代特定的重大社会需求，进而研讨相对应的增加有效供给之策。本文主要对于“后疫情时代”与“新经济”交互作用情境下的健康产业发展及相关的“需求侧改革”，进行框架式的研讨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 新经济 健康产业 需求侧改革

作者简介：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类社会生活以来，其变化还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但如做一基本判断，可以认为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所谓后疫情时代。我们一方面对疫情应有打“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应有针对性地考察分析疫情造成的突出问题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定重大社会需求，进而研讨相对应的增加有效供给之策。本文主要对于“后疫情时代”与“新经济”交互作用情境下的健康产业发展及相关的“需求侧改革”，做框架式的研讨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后疫情时代基本的背景情况及矛盾的凸显

中国“后疫情时代”的阶段，应从 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解封开始。虽然之后陆续还出现一些零星的和小区疫情，但是中国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做出决定性的局面控制。世界上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在推进疫情的控制（从防病疫苗的使用，到治病的药物效力与治疗经验提升）。人类社会对新冠病毒疫情从力求控制、到基本控制、到未来不知道何时可以像消灭天花病毒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这中间需要经历多长时间，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不确定性之中还存在一些确定性，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从 2021 年下半年到 2022 年，估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逐步地普遍使用新冠疫苗；治疗的有效药物和护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可以使死亡率进一步降低。中国在这方面既然走在了大国防控疫情的前面，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要义无反顾地拥抱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从而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来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因为“数字经济”概念所代表的“信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并必将进一步地对防控疫情、保障和增进人民福祉作出重要贡献。

在这个背景之下，社会对于健康产业的强烈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并且其有声有色地大发展正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也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已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所激发出的健康需求客观上必然要求和产业对接，以形成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使国人的需求升级，明显表现为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一开始要求解决温饱的“吃穿用”，升级为越来越多的“住行学”（住房、出行、旅游），还有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又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服务，以及生活中更丰富的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设施及活动。从这一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升级的视角看，党中央已经给出了一个总体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思路的基本判断，就是必须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使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这是党中央统领全局给出的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思想。贯彻这一战略性指导方针，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从哲理上讲，发展的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关键是当前的“不充分”是由“不平衡”的结构问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引出的，由此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这里所述的健康

产业还不能够覆盖所有关于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的形成，因为其中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如果能将“社会政策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国民健康供给事项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健康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本文将对此重点展开讨论。

二、对健康产业发展格局及优化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经济领域之一。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一些纠结现象：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中的“医”，其实首先是于医疗之前，还要有一个预防（公共卫生防病）环节，接着是有对疾病早期发现的客观而迫切的要求，所以“体检”近年在国内得到具有“产业化”特征的很大发展，但仍供不应求。在一些中心城镇区域已有产业化特征的“体检”领域里，也迅速表现出所谓“寡头垄断”特征：一些在市场上比较成名的体检系统运行现场相当拥堵，人们如想在网上预约体检也需等许多天。这反映的是供给短缺。虽然这种体检供给能力还在提升，但从当下趋势看表现出来的是仍然跟不上社会需求。健康体检的供给还主要体现在城镇区域，尚没有发展到可以覆盖一般农村区域。14 亿国人里，现在能到体检机构现场接受这种系统性体检的其实还是少数，以后还需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提供这种医养条件。

适度产业化发展探索，如说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作为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怎样处理好？这方面虽然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形成了很多模式和经验，但现在并没有看到已很成熟的模式，还需继续探索，努力克服“就医难”“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不容讳言的：老百姓现在在治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还要托“黄牛”（票贩子）去解决挂号问题。也出现了“国外替代”的现象，即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寻求就医。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即在挂号排长队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如果医院挂号排不上，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有神医，有特别的解决办法，有妙方诀窍等等。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情况都是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笔者试图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提出如下几点认识，供大家进一步探讨。

第一，需承认，讨论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社会政策的托底”，即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应牵头把这个层次的托底事项做好，使社会中那些最弱势的群体也能得到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体系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市场化。笔者不赞成一种极端化观点，比如由国家承担全民医疗，国家对别的事情减少一些支出，

而出钱让整个医疗系统做到全民免费医疗。这恐怕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这不仅是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以使用的财力限制问题，还涉及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问题。比如在极个别县域所做的全民免费医疗，确实有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导向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在医院里不肯出来等矛盾怎么解决？所以，还是要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需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既有激励又有约束，需要与市场机制兼容和对接。

第二，需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试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病以后所得到的医疗待遇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需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在这方面要解决的是怎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老同志退休以后，比较直率地抨击了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体制内高端人员医护上面的问题。这类事情怎么处理好？目标上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的确需要有节制取向的优化管理，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在这个领域里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一定有竞争；而竞争会引发内在的动力，让医护人员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对接信息内可知的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世界，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中国内部的医疗体系中，必须打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形成一种所有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养生养老产业内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积极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性。

第四，在中国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医疗卫生的事业与产业也要确定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发展。从实际生活中的客观发展诉求看，也有相关的物质性必要条件。中国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已越来越多地不局限于城镇区域了，特别是医养结合概念下的健康疗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

三、健康产业发展需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邓小平同志当年所强调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新经济”引发“颠覆性创新”而形成的种种升级版的新供给。在健康产业领域中，由于数字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越来越多的期冀。可举出最新得知的以高科技数字化创新手段支持的一些案例。一个是 5G 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相当成功，时延仅 1 毫秒，就等于是同步做手术。高水平的医生，

在几千公里之外来完成过去认为在偏远地区完全没有可能做的手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化能力提升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的治疗水平。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具体锁定到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特定患者的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境界。还有就是已看到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一些残疾人，用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一些功能，造福于这些原来认为没有治愈希望的人群。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理所当然值得称道。相关的发展事项可特别注重如下三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两新一重”^① 建设与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的硬件支撑力升级上台阶，进而可以使研发和运行更加进步。不必讳言，世界性的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中国现在虽然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已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新基建如果建设得好，在若干年内技术、软件方面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会更多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即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取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也必然会支持社会生活全局中数字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和相关医疗卫生事业与健康产业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结合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新经济形成的有效供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聚焦、投射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还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腹地。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天然具有淡化乃至冲决城乡差别的技术能力和特点，插上数字化新经济的翅膀，把“高水平城镇建设”结合“乡村振兴”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使健康产业从具体形态到内在质量，更好地结合于“健康中国”发展场景中，城与乡各自的相对优势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开发，会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在这个视角上，很有必要重视和开拓政策性融资机制，这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比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①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的PPP创新机制就具有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其建设和运营所做的事情是应当由政府牵头来做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正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市场兼容和对接，于是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中，打开了PPP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将更多的资金由非政府企业主体那里调动而来，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 and 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这种建设事项显然要与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很多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需要体现在PPP项目建设中以优化供给结构。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这也正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或“守正创新”。守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之正，但还要知道市场也有缺陷、有失灵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出市场主体与政府打造伙伴关系之奇，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超常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高速，如果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明显缩小与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并且最终在总量上超越它。我们如果要引领“新常态”由新入常，在中高速平台上，关键要有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正是要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状态下，更好地使之带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里面数字经济应发挥创新的龙头作用，要跟上硅谷打开的新经济潮流，对已“卡脖子”的高端芯片供给问题做攻坚突破。对于这种高端的芯片，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无论出多么高的天价也买不来了。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这种“卡脖子”问题的解决，既关联打造“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又关联着新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支持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形成。

四、健康产业发展与需求侧改革的联结

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们理解，中央这次表述的“需求侧改革”是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的一种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打通堵点”。中央说得十分明白，是要

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以及其所指导的实践中。

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加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是要以“消除堵点”“贯通循环”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即过去所说需求总量可以先结构化为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形成的净出口这三个视角上，从而形成一个所谓动力机制。关于这“三驾马车”的动力机制，新供给经济学已强调，只讲需求还没有把话说完，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必须延伸推进到供给侧，去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由“三驾马车”为结构化起点来考虑：

第一，从需求侧的消费视角看，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首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比如中国这方面的一大突出问题是如何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所需要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以社保制度建设，既托好低收入阶层的底，也要使中产阶层能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的收入更敢于花出去，即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是涉及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改革。

第二，应积极而有力地消除与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这涉及“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一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法”来形成结构优化的。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在初期时的布局错了，以后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要体现在全局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通盘安排，这是需要政府牵头做出的顶层设计。与此相联，已提出的现代社会很多概念显然都无法回避，比如说在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已经强调的建设事项，它们需要确定标准化的系统，并需要有关各方面共同协调努力将其对接到可操作和可落地。与此相关的一项建议是，国家管理部门应作出一种硬性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今后中国所有新开发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来建设，哪怕投资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的事情。遗憾的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尚缺乏清晰的国家管理规则。海绵城市与此类似，它实际上是与综合管廊联系在一体的，直观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架构，既需要达到建设海绵城市的标准，又需要达到建设综合管廊的标准，必须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和系

统工程安排来解决问题。把这些事情解决好，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还有 PPP 的规范化，2014 年以后国务院领导多次督办，两大管理部门已经把其推到了发展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注重稳一稳，而现如今，又迫切地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把 PPP 推到新一轮更健康的发展状态。所谓 PPP 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PPP 形成的高绩效水平投融资，有望为中国消除健康产业建设发展的瓶颈和堵点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三，在外贸方面，显然需要更为积极有效地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进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制度建设和管理优化来按照中央打造新发展格局意图落实到运行层面。这还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比如海南博鳌已在考虑建设外交医养园区，又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区的总体方案中，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方面也首先要提高规划的水平，使相关的双循环中，需求和供给的互动跟着活跃起来。进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面对风云变幻国际市场的抗风险机制等等，过去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需要在“后疫情+新经济”时代进一步总结好和推广、运用好。

参考文献：

1. 贾康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2. 贾康、苏京春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3. 贾康、欧纯智：《创新制度供给：理论考察与求实探索》，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4. 贾康等：《新供给：创构新动力》，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 贾康等：《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克难》，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7 年版。
6. 贾康等：《新供给：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 年版。
7. 贾康、刘薇：《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基于全链路跨境电商的 数字化新外贸研究^{*}

——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例

王晓红 夏友仁 梅冠群 梁 鹏 郭 霞 李 蕊

摘要：“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加速了贸易数字化进程和新业态、新模式成长，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外贸正在成为外贸业态创新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外贸增长的新引擎。本文梳理了数字化新外贸的相关概念及主要特征，研判了全球和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发展趋势，并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案例探讨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实践。研究认为，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新外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贸易发展格局，并将为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因此提出将数字化新外贸作为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渠道、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数字化新外贸持续发展、加强跨境电商合作、支持数字化新外贸平台创新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新外贸 全链路跨境电商 新发展格局 制度型开放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夏友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副研究员；

梅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梁 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研究员；

郭 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李 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副主任。

^{*} 本报告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数字化新外贸趋势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感谢课题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同志的悉心指导，感谢阿里巴巴国际站对于本研究给予的大力支持。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加速了贸易数字化进程和新业态、新模式成长，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外贸正在成为外贸业态创新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和外贸增长的新引擎。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使全球贸易遭遇重创，但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强势崛起和数字化与外贸深度融合，促进数字化新外贸成长壮大。数字化新外贸有效推动了贸易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成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整合生态链上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利用数据、算力和算法实现与国际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对于境外客户需求挖掘、海外营销推广、跨境支付、外销产品设计研发、境外产品售后服务、跨境供应链管理服务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数字化新外贸能够有效实现国际国内市场联通、供需匹配和企业降本增效，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数字化新外贸概念及特征

（一）数字化新外贸的概念及内涵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跨境贸易的各环节，驱动跨境电商不断转型升级。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代表的一批跨境电商平台不断拓展功能，由平台撮合跨境买家与卖家达成货物贸易逐步向外贸服务领域延伸，形成平台整合资源提供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全链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我们称之为“数字化新外贸”。即：以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为核心，衔接生产商、销售商（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服务提供商（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及消费者的生态系统。数字化新外贸不仅包括跨境商品流通，还包括与之相关联的物流、金融、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财税等配套服务，高效透明的通关、收汇、退税外贸综合服务，以及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新型监管方式和新的国际规则体系。

阿里巴巴国际站创建了全链路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B2B）模式，即新一代跨境电商范式。从表 1 可以看出阿里巴巴国际站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与传统跨境电商在客服、物流、支付、通关、退税和财务等环节的差异，前者通过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能够实现网站和跨境交易履约服务的结合，形成跨境 B2B 交易从商机到履约的闭环，买卖双方可以在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完成担保交易。

表 1 阿里巴巴国际站与传统跨境电商的对比

	阿里巴巴国际站	传统跨境电商
客服环节	使用智能在线沟通，提供多语言实时沟通工具、在线翻译服务	使用邮件、电话、微信/WhatsApp等沟通工具
物流环节	搭建全球“海陆空快” ¹ 体系，推出不同产品的全球专线，打造集成跨境货运全链路（客户下单、货代接单、货代内部管理、货代运力采购，资金结算）于一体的数字化软件即服务（SaaS）操作系统，提供可智选、可服务、可视化的一站式跨境货运服务，提高全链路效率，让买卖双方都实现数字化货运履约	商家自行选择第三方物流企业
支付环节	构建全球支付和结算网络，支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墨西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本币支付，在欧美加澳等发达国家实现本地收单，收款全链路可视，为客户提供委托汇兑、自主汇兑两种方式，通过全球支付创新（GPI）服务实现资金全链路可视，并提供极速提现服务，客户可一键完成国际收支申报	以电汇、西联汇款、银行汇款等线下支付或信用卡、网络银行支付为主
通关环节	打造服务外贸企业、报关行、货代的一站式智能报关平台，实现图文识别、智能录单、自动跟进、全程可视、数据对接、单证管理等功能	不提供相关服务
退税环节	2020年9月11日起，与浙江电子口岸、宁波电子口岸合作，客户无需提供备案单证，即可实现秒级退税融资服务 ²	
财务环节	构建本地高水准外贸财税服务生态，服务过程全程可视，服务质量动态监控，一站式解决记账、退税、税务合规咨询等综合财税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1. “海陆空快”包括：海运，涵盖海运整柜、拼箱、船东直采、货代 SaaS 等；陆运，全国 7 个大区，覆盖 28 个港口，近 26000 条线路；空运，与全球优质空运服务商合作，覆盖 170 个国家和地区；快递，支持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个仓库服务。2. “出口退税融资”是创新信用融资产品，报关出境时符合国家退税标准的商品提前支付退税款的一种融资服务。

（二）数字化新外贸的主要特征

一是数字化特征。交易标的包括商品、服务以及信息数据等，且交易全流程高度数字化。二是平台化特征。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是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织，不仅是汇聚各方数据的中枢，更是实现价值创造的核心，大幅降低了产品和服务进入海外市场的贸易成本。三是普惠化特征。数字化新外贸大幅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中小企业、个体商户都可以通过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面向全球消费者，在传统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的群体能够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四是个性化特征。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智能化的精准营销、交易履约和信用资产等服务，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五是生态化特征。平台与企业遵循共同的契约精神、共享数据资源、共创价值，形成互利共赢的生态体系。六是全球化特征。由数字技术搭建的全球网络空间将来自各国的产品和服务内容面向全球市场提供，推动生产全球化、消费全球化、服务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不断加速。

（三）数字化新外贸的产业链

数字化新外贸的产业链是一个以跨境电商平台为核心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主要包含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制造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商、贸易商、采购商、物流公司、报关行、第三方支付公司、金融机构、代运营公司、财税服务提供商等市场主体，分别参与“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流”等多个环节。在该系统中，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将一系列从事外贸活动的上下游企业或紧密联系的生产企业、服务提供商、用户聚集起来，组成一个共享资源、共创价值的生态网络系统。



图 1 数字化新外贸产业链

1. 跨境电商平台

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是数字化新外贸的核心和产业链经济活动的依托，平台集聚各类贸易主体，是集成商品展示、询盘问价、商品交易、支付结算、物流安排、报关通关、金融征信、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平台。生产商、服务商可以在平台上与消费者直接对接，改变了商品生产流通方式，大幅缩减了中间环节，商品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消费者体验度均较传统国际贸易获得较大改善。

2. 生产制造商和供应商

跨境电商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聚合买方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数据反馈给制造商。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通过数据改变产品结构、调整产品功能、

合理安排库存，使供给端和需求端更有效对接，使生产制造更加柔性，更具即时响应、订单生产、预测生产能力，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向智能化发展，工业大数据、工业物联网、数字工厂、工业大脑等新的技术和模式不断被应用，从研发设计、制造生产、运营管理都将实现智能化改造，来自跨境电商平台的采购数据可以帮助制造商和供应商实现更高效率的产品结构调整，更快捷地满足市场需求变化。

3. 服务提供商

数字化新外贸中的服务提供商指在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上，提供虚拟展示、通关报关、支付结算、金融信贷、国际物流、企业托管、财税代理等全部服务的主体。这些企业嵌入跨境电商平台，通过与生产商、贸易商乃至采购商的合作互动及时获取相关贸易信息，并结合自身功能提供相关服务。如，在采购商品时，采购商可以自主选择物流服务商、支付结算方式；商品在进出口报关时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选择适宜的报关服务商；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给商家贷款或个人消费信贷时，可通过商家外贸行为评估风险；生产商和供应商在研判未来市场变化、制定生产销售策略时，可以借助贸易大数据进行市场分析等等。总之，通过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市场服务主体可以提供多种类型优质便利的专业服务，可使生产商和贸易商更加专注于生产和销售。

二、全球数字化新外贸的发展

（一）全球数字化新外贸发展的推动因素

近年来，全球数字化新外贸快速发展，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供给侧看，网络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相结合创造了贸易新业态，带来了数字化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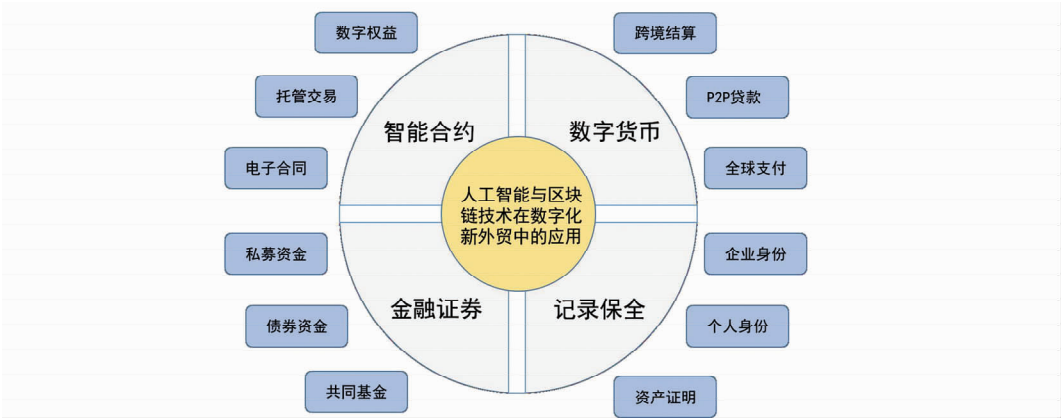


图 2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化新外贸中的应用

外贸的兴起，形成了基于电商平台的 B2B、B2C（企业对消费者）、C2C（个人对个人）等贸易新模式。数字技术不但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也广泛应用在与贸易相关的物流仓储、支付结算、融资贷款、报关通关、收汇结汇、广告营销等各个领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乃至虚拟现实、量子计算、人机互动等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正在不断提升数字化新外贸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从需求侧看，随着国际产业分工愈加精细，对国际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刺激和催生了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基于数字通信和传输技术，上下游企业可以实现无缝实时的信息互换和共享；基于智能优化算法，可以更加高效而低成本地组织物流；基于大数据征信技术，融资结算可以更加高效而安全；基于数据的高效采集、清洗和分析技术，生产企业和贸易商可以更加精准地投放广告、拓展市场空间。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全流程、全链条的广泛应用场景和广阔前景，加速了国际贸易与数字技术融合，并促使由单一货物贸易的传统跨境电商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全链路跨境电商转型升级，推动数字化新外贸加快发展。

（二）全球数字化新外贸的发展现状

1. 全球数字化新外贸市场规模高速增长

近年来，全球跨境电商呈爆发性增长态势。据麦肯锡数据，2016 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总额仅 4000 亿美元，预计 2021 年达到 1.25 万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 25.6%，并将保持较高增速。同时，数字化配套服务不断提升，相关数字服务的市场规模也在大幅拓展。以数字支付为例，Worldpay 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电子商务支付主要依靠信用卡，占全球电子商务支付方式的 29%；但目前电子钱包已取代信用卡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最主要的支付方式，2019 年全球电子钱包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使用量占比达到 42%，2021 年预计占比高达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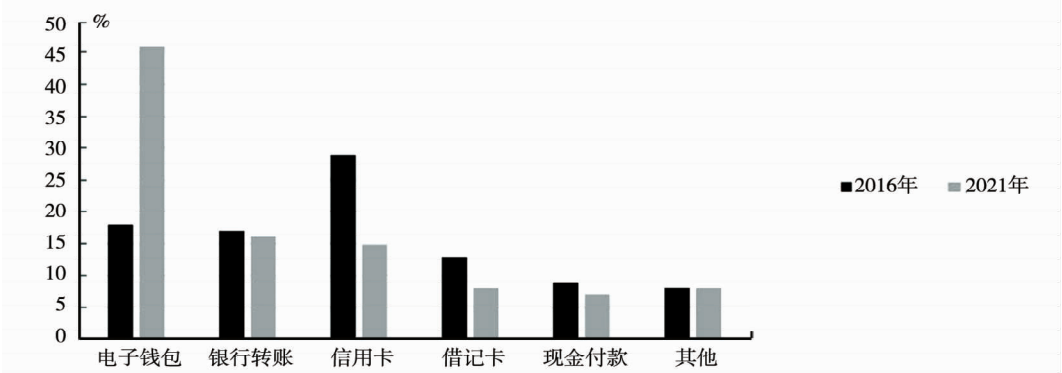


图 3 主要支付方式占全球电子商务支付方式的比重

数据来源：Worldpay。

2. 亚太地区是数字化新外贸最重要市场

从全球跨境电商市场分布看，亚太、北美和西欧是全球最主要的数字化新外贸市场。据 Statista 数据，2020 年亚太地区跨境电商市场交易额约 4500 亿美元，约占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的 53.6%；西欧为 1430 亿美元，约占 18.9%；北美为 1090 亿美元，约占 14.4%；拉丁美洲为 470 亿美元，约占 6.2%；中东欧为 320 亿美元，约占 4.2%；中东及非洲为 210 亿美元，约占 2.7%。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主要市场，到 2035 年跨境电商有望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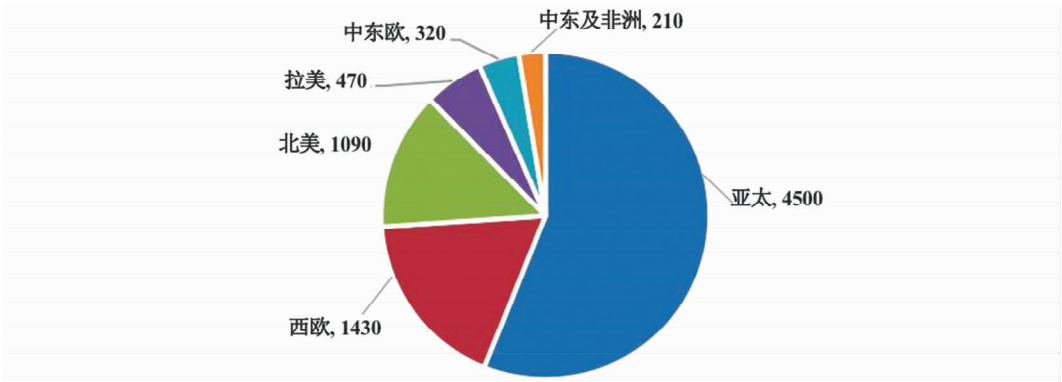


图 4 2020 年全球主要地区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分布（亿美元）

数据来源：Statista。

3. B2B 成为数字化新外贸的主流模式

跨境电商包括 B2B、B2C、C2C 等多种模式，但 B2B 是主流形态。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当前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中 B2B 约占 83%、B2C 约占 16%，表 2 为 B2B 模式的全球主要电商平台。B2B 模式将大幅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展，也将促进跨境电商监管治理规范化和现代化。

表 2 全球主要数字化新外贸平台（B2B 模式）

国家	平台名称	特点
中国	Alibaba.com	2600 万活跃企业采购商，覆盖全球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近 6000 个产品类别
美国	Amazon Business	亚马逊的 B2B 业务
沙特	TradeKey.com	主打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中国大陆、巴基斯坦、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及地区
韩国	EC Plaza	网站会员数量已经超过 100 万，拥有超过 400 万个供应商
新加坡	Global Sources	大量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集聚在该平台

续表 2

国家	平台名称	特点
美国	Thomasnet. com	拥有 67000 个工业类别以及 65 万个分销商、制造商和服务公司，每月超过 180 万访问量，主要销售工程和制造类商品
韩国	EC21. com	拥有 100 万买家，每月超过 60 万次询盘，目前有 EC21 中国站、EC21 韩国站和 EC21 全球站 3 个站点，持 8 种不同语言
美国	Global Spec	美国主流 B2B 平台，面向北美和亚洲市场，主要提供工业部件、机械以及相关服务
美国	Joor	与全球超过 15.5 万名零售商和 1500 个品牌合作
俄罗斯	Tiu. ru	俄罗斯最大的 B2B 平台之一，主要目标市场为俄罗斯、乌克兰、乌斯别克斯坦、中国等亚欧国家
俄罗斯	FIS. ru	月访问者 100 万，平台共有 310 万件商品和服务，有 21.4 万家公司供货，覆盖 1400 个城市
印度	IndiaMART	印度最大的 B2B 交易平台，拥有超过 3500 万买家，400 万供应商和 4300 万种产品
印度	Tradeindia	有 290 万注册会员，平台汇集各类产品约 2250 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三、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发展

（一）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主要发展阶段

根据跨境电商模式的变化，中国数字化新外贸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萌芽期（1999—2003 年），是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试水阶段。1999 年中国最大的外贸信息黄页平台阿里巴巴（即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 com）的成立是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该阶段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展示为目的，交易和支付等其他环节仍在线下完成。

第二阶段，1.0 阶段（2004—2012 年），是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探索发展时期。该阶段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电商平台依靠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服务、资源整合有效打通上下游供应链和服务链，将线下交易、支付、物流等流程数字化，实现数字技术与外贸业务流程的初步融合，推动供应链扁平化和虚拟化，压缩了供应链周期，提升了企业盈利能力。

第三阶段，2.0 阶段（2013—2017 年），是数字化新外贸的爆发期。2013 年电子商务立法进程启动，国务院出台支持跨境电商的“国六条”，启动全国首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台。全产业链在线化、移动化，带动数字化新外贸高速发展和生态系统不断完善。此阶段跨境电商呈现出大型工厂上线、企业类买家成规模、中大额订单比例提升、

移动用户量激增和全产业链服务在线化等典型特征，商业模式由 C2C、B2C 向 B2B、M2B（生产商对经销商）模式转变。

第四阶段，3.0 阶段（2018 年至今），数字化新外贸生态趋于完善。2018 年 8 月《电子商务法》发布，支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数字化新外贸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构建全球支付结算金融、数字化关务、数智化物流三大跨境供应链体系，提供全链路、一站式智能解决方案是现阶段商业模式的显著特征。数字化新外贸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营销解决了跨境电商发展中存在的“订单荒”问题，借助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解决了“履约难”问题。

（二）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

数字化新外贸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模式、新途径和新动力，在规模、产品类别和覆盖国家等方面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为 33.29%，2020 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进口 0.57 万亿元，增长 16.5%。从出口产品类别看，除 3C 电子产品、服装、家居用品、鞋履箱包和母婴产品等消费品外，汽车、装备、中间品等产品的全球网络销售进一步拓展。从进口产品类别看，除化妆品、粮油食品和日用品等消费品外，通讯器材等中间品进口额增长较快。此外，跨境电商平台出口由珠三角、长三角不断向内陆延伸。珠三角地区借助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门类齐全、外贸基础强大等优势，孕育了中国最大规模的跨境电商出口群体；长三角作为中国制造业集聚地，出口规模也保持较快增速。数字化新外贸在打通国际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数字化新外贸重塑制造业产业链

制造企业是数字化新外贸的主要参与者，涉及产业和相关产品种类众多，这些产业企业之间存在着上下游关联，在数字化新外贸生态系统中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上游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下游企业生产的部分衍生物或废物可供上游企业使用，互为卖家和买家，彼此之间和谐共存、合作共赢。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企业组织方式和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从生产制造环节来看，传统制造企业为了及时适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纷纷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使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并解决产能过剩、物流成本高、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从制造企业采购行为来看，货期长、批量大、金额大的传统模式将被短周期、小批量、碎片化取而代之，跨境电商

平台提供的专业沟通、交易、结算、支付和物流等服务将为其提供支撑，有效解决制造商在国际采购中的金融、物流、专业人才等短缺。从外贸方式来看，传统外贸模式下制造企业要将产品卖给最终消费者，通常需经过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四个环节才能实现。而数字化新外贸模式下，跨境平台可以有机整合上述环节，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缩短了贸易服务链。

2. 数字化新外贸平台的运营模式

按照数字化新外贸的运营模式，可将其分为以跨境 B2B 为主和跨境 B2C 为辅的模式。B2B 模式是跨境电商中最具发展潜力、最有能力形成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商务模式。B2B 模式下，平台企业将供需双方汇聚到一起通过发布供需信息，方便买卖双方通过平台自主选择交易对象，并通过在线支付或结算系统完成交易，又可以细分为出口 B2B 和进口 B2B 两种模式。出口 B2B 主要有四种模式：以阿里巴巴国际站^①为代表的“批发贸易+外贸服务的平台模式”，以敦煌网为代表的“批发兼零售的平台模式”，以环球易购为代表的“自采或 POP 兼营的全域零售平台模式”。进口 B2B 模式目前作用有限，也缺少大型平台。B2C 模式主要有以速卖通为代表的“海外直供模式”和以考拉为代表的“海外优选模式”。“海外直供模式”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海外经销商与国内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平台企业负责制定适合跨境电商进口交易的规则和消费流程，通过打造良好的购物体验，收取商家入驻费用和交易佣金。该模式主要建立在供需双方的丰富程度之上，一般要求海外企业具有零售资质和授权，并且能够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商品一般是直接采用海外直邮方式运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该模式在 B2C 中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海外优选模式主要以自营型 B2C 为主，平台直接参与到货源的组织、物流仓储及销售过程。一般采取保税备货的模式，物流时效性较高，用户体验相对更好，但产品丰富度较低。

3. 数字化新外贸的服务体系

数字化新外贸服务体系由国内外的物流企业、第三方支付企业、金融机构、信息服务商、政府管理部门等构成。这些企业和机构在数字化新外贸生态中扮演着服务支持角色，其中交易服务维度的物流服务和支付服务尤为重要。

数字化新外贸的物流服务是指为跨境商品贸易提供的存储、运输、配送、装卸及仓内加工等一系列服务的总称。目前的物流运作方式主要有邮政小包、快递、空运、海运、复式联运、海外仓等模式。其中专线速递的服务包括：货物揽收、装卸打包、运输、在

^①2016 年起，阿里巴巴国际站从一个展示商品的撮合网站转变成拥有支付、交易、结算的全链路跨境贸易平台，买卖双方在此平台可以完成担保交易。通过一站式的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网站和跨境交易履约服务的结合，做到跨境 B2B 交易从商机到履约的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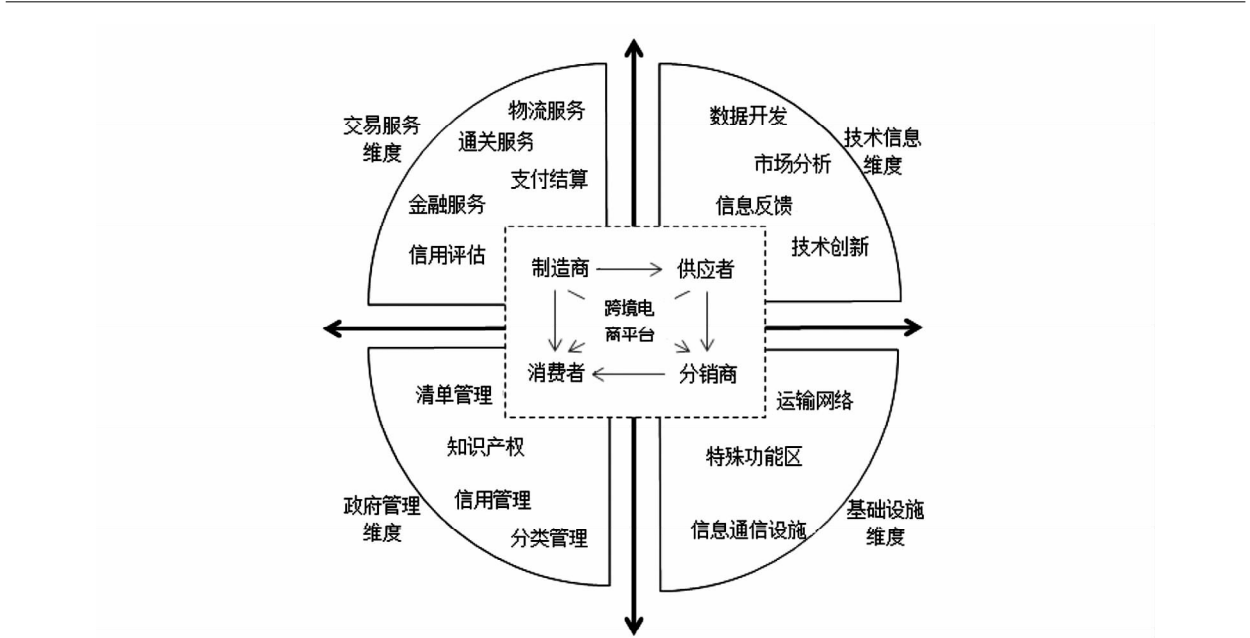


图 5 跨境电商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程炜杰、姜丽丽，《跨境电商生态圈构建的四个维度》，《开放导报》2019 年第 6 期，第 86～90 页。

线追踪订单、清关和本地派送等。海运快船模式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物流拼箱模式，整合了快递、传统拼箱、快船、超级快速交付服务（SUPER HDS）等物流模式的优势，“在成本不变或更低的基础上，让传统拼箱的门到门交货期缩短一半”。如，中欧班列作为国际物流贸易的新通道，运行时间短、安全稳定、绿色环保，缩短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运输时间，对中欧贸易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欧班列运营过程中，参与主体众多，主要包括中国和沿线国家的铁路公司、物流公司及进出口企业。国内目前典型的中欧班列运营平台企业有渝新欧（重庆）、郑州国际陆港、蓉欧国际（成都）、汉欧国际（武汉）、长安号（西安）、营满欧（满洲里）、义新欧（义乌）等。海外仓指境内外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货物存放、加工、分拣、装卸、打包、返修服务的仓库，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保税仓和普通仓，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国内仓和海外仓。国内仓主要以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等为主要载体，主要应用于网购保税进口商品。海外仓主要分为电商平台自建仓库、第三方海外仓库和跨境电商卖家自建的海外仓库，^①

^① 亚马逊和京东都是采用自建仓储体系模式，亚马逊在上海自贸区内建设了保税仓和物流中心，可以享受到更低的税率。天猫国际采用的是租用保税区仓库模式，海外品牌商根据阿里大数据分析提前向保税仓备货。阿里巴巴在跨境电商领域还注重与政府层面合作，与上海市松江区合作组建了跨境物流园区，与新加坡等国家邮政体系签约，菜鸟在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海外仓。

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境物流采用“跨境电商+海外仓”的模式，即海外买家首先通过跨境电商网站完成产品的在线购买，然后利用卖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本地化海外仓储、物流系统实现商品的及时运输和配送。

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主要是指为 B2C 跨境电商交易全流程提供海外收单、资金跨境、结算分发等服务。跨境电商 B2B 目前支持汇款、信用证和托收等主流国际结算方式。从支付方式来看，支付服务主要分为本地电汇、跨境电汇和信用卡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国际电汇仍占据主导地位。

（三）数字化新外贸的管理体制和商业模式演进

1. 数字化新外贸的管理体制演进

在制度供给层面，政府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不断完善跨境电商管理体系，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平台，促进跨境电商快速健康发展。跨境电商政策以“先行先试”为抓手，以“梯度推进、辐射全国”为演化路径，以“支持性政策与规范性政策相辅相成”为基本特征。

2004—2012 年，政策以培育产业发展为主。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2 号）是国内第一个关于电子商务的政策性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实行体制创新，加快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环境，推广电子商务应用；在政策法规环境、支撑体系、推动电子商务应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各部委为落实这一政策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商务部发布《关于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意见》（商改发〔2007〕490 号），提出规范电子商务信息传播行为、交易行为、支付行为、商品配送行为，以及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保障措施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高技〔2011〕463 号），决定联合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同时以首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为起点，从中央部门政策性试点和示范城市应用性试点的重点领域着手，推动电子商务的有关政策在局部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3—2017 年，政策以激励为主。针对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制度创新与时俱进，推动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2013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由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9 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国办发〔2013〕89 号，即“国六条”）。一方面，推出了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如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并进行专项统计，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检验监管模式，支持企业正常结

收汇，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出口的税收政策等。另一方面，加快跨境电商通关试点建设，加快电子口岸结汇、退税系统与大型电商平台的系统对接。各部委出台了相关政策，如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将直邮进出口和保税进出口赋予海关监管代码（“9610”和“1210”），实现“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通关便利化。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5〕44号），同意试验区在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商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商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2018年至今，政策支持与规范并重。《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跨境电商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内容涉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合同、争议解决、电子商务促进、法律责任等方面。具体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在经营者法律责任与义务的界定方面，既规定了一般性电商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也界定了电商平台经营者作为新型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责任与义务。二是确定了电商合同的特殊交易规则。三是强调了政府责任。如，规定政府必须将电子商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维护电子商务交易安全、推动数据共享、坚持开放发展电子商务等。四是体现了对竞争秩序的规范和对中小电商经营者的规范。^①《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复制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管理模式，优化通关作业流程，建立全口径海关统计制度。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简称跨境电商综试区）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载体。自2015年以来，分5批共设10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杭州是第一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至今已向全国输送113条制度创新清单，其中“六体系两平台”政策体系已在全国普及。商务部等14部门发布《关于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探索形成的成熟经验做法的函》（商贸函〔2017〕840号），将“六体系两平台”等成熟经验和做法向全国复制推广（表3）。六体系指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电子商务信用、统计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提供了涵盖跨境电商全流程、各主体的管理和服 务；两平台包括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产业园区平台，提供了综试区建设的软硬件条件。“六体系两平台”实现了政府与市场、部门与地方、线上与线下的有效结合，调动了各参与方积极性，催生了跨境电商生态圈。其他跨境综试区进一步拓展跨境电商制度创新体系。如，郑州综试区增加了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和企业孵化平台与质量安全体系，形成了“三平台七体系”，还在“网购

^①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专题》，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zswf/。

保税 + 实体新零售”“秒通关”“E 贸易”等方面进行探索。

表 3 跨境电商综试区成熟经验及主要做法

序号	经验	主要做法
1	建设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信息枢纽	通过对接监管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集成在线通关、物流、退免税、支付、融资、风控等多种功能，实现“一点接入、一站式服务、一平台汇总”
2	建设线下产业园区，实现协调发展	园区提供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服务，汇聚制造生产、电商平台、仓储物流、金融信保、风控服务等跨境电商各类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
3	发展海外仓推动 B2B 出口	通过地方财政配套中央外经贸发展资金支持海外仓建设，鼓励企业自建或租用海外仓，加强售后服务、现场展示等功能，拓展海外营销渠道
4	创新金融支持模式	各综试区开发融资、保险等金融产品，提升中小跨境电商企业交易能力
5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通过简化手续、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提升出口退税效率、便利化外汇交易结算，极大地降低企业成本
6	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7	提升出口退税效率	
8	便利外汇交易结算	
9	建立统计监测体系	建立健全跨境电商统计监测体系，在三单标准、B2B 认定等方面先行先试，依托数据建设综合数据处理中心
10	鼓励商业模式创新	坚持“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原则，允许跨境电商企业在商业模式上大胆创新
11	打造跨境电商品牌	跨境电商通过智能推送、信息宣传等多种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支持培育自主品牌，扩大优质产品出口，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12	加强人才培育力度	加强政、校、企合作，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力度加大。

资料来源：商务部等 14 部门《关于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探索形成的成熟经验做法的函》（商贸函〔2017〕840 号）。

2. 数字化新外贸的通关监管模式创新

自 2014 年以来，海关为便利企业通关和统计，探索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商品实行简化归类，不断增列监管代码，创新通关模式。

第一，“9610”模式，全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适用于境内个人或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交易，并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模式办理通关手续的电

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一线的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除外）。“9610”模式下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境电商企业，尤其是跨境零售进出口企业的通关效率。

第二，“1210”模式，全称“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适用于境内个人或电子商务企业在经海关认可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跨境交易，并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进出的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境商品。在“1210”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网站可以将尚未销售的货物整批发至国内的保税物流中心，再进行网上零售，未销售的不能出保税中心，也无需报关，还可直接退回国外。

第三，“1239”模式，全称“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A”。适用于境内电子商务企业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一线进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第四，“9710”和“9810”模式。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在北京、天津等 10 个海关开展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710”，全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直接出口”，适用于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货物。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810”，全称“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适用于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的货物。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增加上海、福州等 12 个直属海关。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给予企业一次登记、一一对接、优先查验、简化申报、便捷转关、一体化通关、便利化退货等通关便利措施，全程通关无纸化，程序更精简便捷，大幅缩减了企业运营成本，有利于加快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

表 4 跨境电商通关监管模式

海关监管 方式代码	中文全称及简称	通关监管 模式	适用的主要业务类型
9610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跨境直购	B2C 一般出口；B2C 直购进口
1210	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保税电 商）	保税备货	B2C 特殊监管区域出口；B2C 网购保 税进口（用于免通关单的试点城市）
1239	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A（保税 电商 A）		B2C 网购保税进口（用于需要提供通 关单的非试点城市）
9710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直接出 口（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	B2B 出口	B2B 直接出口
9810	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跨境 电商出口海外仓）		B2B 出口海外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四、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数字化新外贸的实践

（一）发展历程

寻找商机难、流通成本高、享受政策红利难、资金融通难和信用屏障高是跨境贸易面临的五大难题。阿里巴巴国际站从 1999 年成立至今，一直帮助中小外贸企业解决物流、支付、金融、关汇税、获客与增长等方面的难题，搭建沟通、交互、履约所需的底层基础设施。1999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作为全球批发贸易市场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电商兴起；2001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注册买家数超 100 万；2010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收购一达通，开始提供关、汇、税等外贸综合服务；2015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信用保障服务”上线，作为全球跨境 B2B 中首个第三方交易担保体系，标志着跨境电商由信息撮合向线上交易发展，交易数据已基本实现全部沉淀；2017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从信息撮合全面升级为“撮合+履约”一体的数字化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跨境贸易步入成熟阶段；2020 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阿里巴巴国际站先后投入 20 亿元“新外贸补贴”，助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数字化新外贸。目前，阿里巴巴国际站从多元化贸易场景出发，立足中国 2000 个制造业产业集群，搭建政务、支付、物流、销服及商业五张大网，提供数字化、差异化跨境贸易解决方案。未来 3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将赋能全球 3000 万家中小企业，实现全面无纸化出口。

（二）构建畅通“双循环”的数字产业生态

阿里巴巴国际站基于生态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平台，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推出了新一代数字化外贸操作系统，通过集合国际国内的制造商、服务提供商、消费者，有效连接了供给端和消费端，联通了国际国内市场，形成以电商平台为核心的数字产业生态链。该操作系统是以“数字化人、货、场”为内环、“数字化交易履约”为外环、“数字化信用资产”为链接纽带的新贸易操作系统，围绕资金流、货物流、订单流、信息流提供外贸履约相关的多种服务。如，为卖家提供信用保障服务、e 收汇服务、一达通通关/退税/外汇外贸综合服务、“海陆空快”国际物流服务、超级信用证、财税服务等，为海外买家提供 Pay Later、^①“无忧赊”、验货等服务，覆盖贸易全链路的数据与服务超出了一般跨境电商平台的范围。

^①是买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采购时可用的一种全新支付方式，目前已对美国区域的买家开放。买家使用 Pay Later 支付时，第三方金融机构将直接垫付资金给卖家。买家可获得最长 6 个月的贷款期，卖家可安全快速收款。



图 6 数字化新外贸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国际站。

1. 数字化“人、货、场”破解“订单荒”

数字化“人”，利用交易主体标签展示技术，商家对客户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来定量或定性描述，精准展现用户画像，实现人的“可识别、可分析、可触达”。数字化“货”，强调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使更多中小企业将沉淀在国际站的消费端数据与生产端的设计、制造、管理等环节结合，实现生产端的精准分析和快速响应进一步满足个性化定制的需求。数字化“场”，充分考量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采购商的偏好和习惯，搭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导购场景，通过类目导购、热品榜单、行业资讯、个性化推荐等差异化的营销方案吸引采购商。

通过数字化“人、货、场”以及 B2B 直播、短视频、3D 逛展看厂等创新模式，把受疫情阻隔的“面对面”跨境交易变成了“屏对屏”。基于买卖家海量行为数据的机器算法学习，以实时最优人工智能算法（图文、语义、人机交互）促成陌生的买卖家之间“供需”碰撞，为商家提效。2020 年 6 月 8—28 日阿里巴巴网交会举办超过 8000 场跨境直播，B2B 直播商家的日均活跃买家数同比增长超过 200%。

2. 数字化交易履约解决“履约难”

传统的外贸服务无法满足客户对高效、集约、低成本服务的需求。阿里巴巴国际站联合生态伙伴，搭建了全球支付结算金融、数字化关务、数智化物流等全链路数字化的

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的智能解决方案。在数字化支付结算方面，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技术创新构建可靠、透明、高效、低成本的全球支付结算金融网络，本地化支付网络目前已覆盖 67 个国家和地区，支持 26 种主流贸易货币，可实现跨境资金一秒到账。在全球范围内阿里巴巴国际站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及银行合作，实现企业通过银行接入全球金融通信网络的云端数据库，令跨境汇款首次实现全程可视化、可实时追踪。在 2020 年度亚当·斯密奖亚洲区获奖名单中，阿里巴巴国际站独得最佳技术驱动、最佳数字安全解决方案 2 项大奖。在数智化物流方面，国际站支持快递、海运、陆运、空运等多样化解决方案，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天候在线查价下单，智能化操作系统结合客户需求，推荐优势线路服务，下单后全程轨迹可视，助力客户便捷发货，履约无忧。在数字化关务方面，国际站联手阿里达摩院，基于人工智能和云端科技打造一站式智能报关平台，可降低 60% 的通关成本，“大数据引擎 + 智能识别”双倍提效 80%，大数据模型智能预警纠控差错低至 0.01%，商品秒级归类准确率高达 98%，与全国超过 2000 家报关行及货代共同推动贸易及通关便利和智能化，探索报关行业新业态，实现通关链路全程可视，线上交互协同。在出口退税方面，国际站利用区块链技术与政府建立风控共建平台，将出口退税需要核实的环节进行秒级核验，退税核查时间可缩至“0 天”。

3. 数字化信用资产消除“信任难”

国际站跨境贸易的全部流程，从交易达成到物流、报关、支付结算、汇兑、退税、金融等均可在线上完成，每个环节的数据都为商家沉淀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和信用名片。国际站将信用保障服务与多种数字化工具有效链接，为具有优质信用的中小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支付条件、更快速的到账时间、更全面的物流途径以及免费享受更多流量资源和获取商机服务，使远隔重洋的买卖畅通且持久。2020 年 5 月，深圳市硕腾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信保服务，在买卖双方未见面的情况下，便收获了价值 346 万美金的有史以来单笔最大海外订单。

（三）为“六稳”“六保”注入新动能

第一，“稳出口”。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链”，大多数线下展会被取消，阿里巴巴国际站帮助商家真正用数据做生意，让外贸和内贸一样简单，有效顶住了疫情冲击。2020 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实收交易额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 101%，进入 2021 年 1 月又实现“开门红”，当月国际站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 177%。

第二，“稳供应链”。稳定可靠的跨境供应链确保海外订单落地。疫情以来，国际站

率先承诺“保价保舱”，并首次举行跨境供应链服务大会，帮助商家最高减少 60% 的履约成本。在国际站整体买家市场中，欧美市场稳、新兴市场快，成为出口逆势增长的来源。2020 年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超出 100% 的国家和地区达 100 余个。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为线上最大出口市场，东盟国家泰国亦进入前十市场排名。从国内看，深圳、广州、金华（含义乌）、东莞、宁波等 5 个城市的出口交易额均实现翻倍增长。

第三“稳企业”。国际站帮助 150 万国内中小外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并首期设立 10 亿元“新外贸专项补贴”，国际站提供全链路一站式托管智能服务，为过去只通过展会获取海外订单的传统外贸企业提供半年的转型护航服务，帮助零跨境电商基础的企业以最快速度和最简单的方式“跑”起来。2020 年 4 月，国际站“春雷计划”就以帮扶新商家为第一目标，截至目前已助力近万家外贸工厂数字化转型。2020 年 10 月国际站启动了“百亿生态投资基金”计划，加快完善数字化新外贸赛道，帮助所有中小企业开源提效，货通全球。随着“百亿生态投资基金”的启动，国际站还宣布再投资 10 亿元启动“春雷计划 2.0”，通过全程成长护航服务、线上展会等形式，继续帮助传统企业和年轻创业者顺利步入新外贸赛道。

五、推动数字化新外贸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新外贸以普惠化、个性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带来国际贸易模式的重大变革，必将成为未来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新外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贸易发展格局，并将为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中国积极推进新基建，5G、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也将助力数字化新外贸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数字化新外贸作为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渠道。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网络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化新外贸，是打通国内外市场、促进国内外要素流动、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主要渠道。同时，对于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和新业态、新模式的拓展，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新外贸的迅速发展也将为制造业与研发设计、信息技术、金融、物流、咨询、数据等服务业融合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为此，要把数字化新外贸放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二，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数字化新外贸持续发展。应在巩固中国跨境电商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加强国际规则标准对接。在跨境电商综试区持续推进海关

监管创新、金融服务开放和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规则标准探索，培育区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适时推进综试区由点及面，逐步覆盖全国。将跨境电商综试区与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建设结合起来，为构建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做制度准备。

第三，加强跨境电商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框架下的议题谈判，在跨境电商国际规则体系方面形成中国主张。同时，在双边、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纳入电子商务议题，在跨境数据流动、平台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字税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强协调，力争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共识，推动跨境电商有关交易信息数据及执法结果的信息共享、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使跨境电商相关企业的通关流程更加便利顺畅。

第四，支持数字化新外贸平台创新发展。要优化创新制度环境，鼓励平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要提高平台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依托平台数据为生态链企业提供精准的供需对接服务，创造市场需求。尤其要鼓励平台开放数据资源，为制造业企业、中小外贸企业及研发设计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同时，要探索与平台经济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创新，严厉惩处平台垄断、野蛮生长、消费欺诈、低价倾销等不公平竞争行为。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谢兰兰：《我国数字贸易与软件出口的发展及展望》，《开放导报》2019 年第 5 期。
2. 肖亮、柯彤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演化动力与创新实现机制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20 年第 2 期。
3. 李秋正、蒋励佳、潘妍：《我国跨境电商通关监管生态系统演化创新的动力机制》，《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 5 期。
4. 商务部服贸司：《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18》，2019 年。
5. 商务部服贸司：《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19》，2020 年。

责任编辑：李 蕊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复苏面临潜在风险

——2020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和 2021 年展望

张国洪 李婧婧 王庭锡 郝悦 胡晨沛

摘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广泛而深入的负面冲击，全球经济遭遇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经济领域方面，世界工业生产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负增长，货物贸易量额齐跌，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主要经济体方面，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经济大幅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随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全球实施，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逐渐消退，全球经济活动有望全面恢复。经合组织最新预测，2021 年世界经济有望在 2020 年萎缩 3.4% 的基础上恢复至 5.6% 的正增长。但是，病毒快速变异、疫苗分配不公、全球债务风险上升等负面因素加强了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关键词：世界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衰退 脆弱性复苏

作者简介：张国洪，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高级统计师；

李婧婧，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高级统计师；

王庭锡，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郝悦，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统计师；

胡晨沛，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统计师。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 2020 年世界经济萎缩 3.5%，^① 为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1 年初，疫苗的研发、部署与后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①IMF：《全球经济展望报告》，2020 年 1 月 26 日。

预期升温，主要机构预测 2021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将出现一轮较为强劲的反弹式增长。但是，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疫苗分配问题突出、全球债务水平高涨、流动性过剩等仍然是制约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

（一）美国经济遭受深度冲击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出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经济衰退压力，美国开启超量化宽松模式，推出总规模近 3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接近零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2021 年，虽然病毒变种导致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但随着疫苗顺利部署和刺激计划持续加码，多家国际组织机构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会明显改善。

1. 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萎缩。2020 年，美国 GDP 萎缩 3.5%，衰退幅度大于金融危机时期的 -2.5%，为 1946 年以来最低增速。分季度看，四个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速分别为 -5.0%、-31.4%、33.4%和 4.1%，呈现出深“V”反弹的特点。

表 1 2018—2020 年美国年度及季度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

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3.0	2.2	-3.5	-5.0	-31.4	33.4	4.1
个人消费支出	1.9	1.6	-2.6	-4.8	-24.0	25.4	1.6
商品	0.9	0.8	0.8	0.0	-2.1	9.6	-0.2
服务	1.0	0.9	-3.4	-4.8	-22.0	15.9	1.8
政府消费与投资	0.3	0.4	0.2	0.2	0.8	-0.8	-0.2
私人投资	1.1	0.3	-0.9	-1.6	-8.8	12.0	4.2
净出口	-0.3	-0.2	-0.1	1.1	0.6	-3.2	-1.6
出口	0.4	0.0	-1.5	-1.1	-9.5	4.9	2.0
商品	0.3	0.0	-0.7	-0.2	-6.6	4.9	1.9
服务	0.0	0.0	-0.8	-0.9	-3.0	0.0	0.1
进口	-0.6	-0.2	1.3	2.3	10.1	-8.1	-3.6
商品	-0.6	-0.1	0.7	1.4	7.3	-7.7	-3.1
服务	0.0	-0.1	0.6	0.9	2.8	-0.4	-0.5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消费活动低迷是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的最主要因素。2020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较上年减少 3.9%，为经济衰退贡献了 -2.6 个百分点；政府消费与投资略微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压力，全年拉动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私人投资在经济活动受限的情况下同样低迷，拖累经济下降 0.9 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拖累 0.3 个百分点，私人存货变动拖累 0.6 个百分点；疫情限制了全球贸易往来，导致美国进口、出口大幅下降，净出口拖累经济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拖累 1.5 个百分点，进口拉动经济增长 1.3 个百分点。

2. 工业从低位修复。2020 年，美国工业生产同比下降 6.9%，制造业生产下降 6.6%，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2%，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从月度数据看，工业生产、制造业生产和产能利用率分别从 4 月份最低点 -17.1%、-20.3% 和 64.2% 反弹至年末的 -3.4%、-2.3% 和 74.6%，略低于疫情前水平。

3. 零售深 V 反弹。2020 年，美国零售总额为 6.25 万亿美元，比上年小幅增长 0.6%。从月度数据看，4 月份美国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9.5%，是 1993 年有该项统计以来最大跌幅。9—12 月，消费需求得到集中释放，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连续获得 7.9%、5.8%、2.0% 和 4.0% 的较快增长。

4. 外贸增速明显下滑。2020 年，美国进出口总额为 49362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2.3%，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其中，出口额下降 15.9%，进口额下降 9.5%。全年贸易逆差 6817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 18.2%，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5. 通胀持续低迷。2020 年，美国消费价格上涨 1.2%，涨幅比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1.7%。生产者价格上涨 0.2%，涨幅收窄 1.5 个百分点。

6. 就业市场面临严峻挑战。2020 年，美国全年平均失业率为 8.1%，较上年增加 4.4 个百分点，是 2011 年以来最高；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减少 933.7 万人，远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减少 506.8 万人，是 1994 年有记录以来最低。

（二）欧元区经济陷入大幅衰退

2020 年，欧元区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导致深度衰退后的复苏进程中断，各成员国由于结构性问题经济表现差异较大，凸显欧元区经济的不平衡和脆弱性。展望 2021 年，受制于疫情发展和疫苗部署的不确定性，叠加欧元区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刺激效果的滞后性，欧元区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1. GDP 增速大幅下跌。2020 年，欧元区 GDP 增速为 -6.6%，为 2013 年以来最低。季度增速大幅波动，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3.8%、-11.6%、12.5% 和 -0.7%；同比增

速为-3.3%、-14.6%、-4.2%和-4.9%。从主要成员国看，欧元区经济增长引擎德国增速由上年的0.6%降至-4.9%，主要由于德国工业化程度高，因此经济衰退幅度明显低于欧元区整体水平；法国、希腊、意大利增速分别为-8.1%、-8.2%和-8.9%，为欧元区降幅较大的成员国；西班牙增幅下降最大，由上年的2.0%回落至-11.0%，创二战以来的最大降幅；荷兰表现相对较好，由1.7%回落至-3.8%。从GDP支出构成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改变了欧元区GDP增长的结构。政府消费支出为主要拉动项，拉动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个人消费支出成为拖累GDP增长的主要原因，拖累经济下降4.3个百分点（表2）。

表 2 2020 年欧元区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拉动 单位：%

	GDP 同比 增长率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净出口	出口	进口
		个人消 费支出	政府消 费支出	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库存 变化			
2020 年	-6.6	-4.3	0.2	-1.8	-0.3	-0.5	-4.5	4.1
一季度	-3.3	-2.1	0.2	0.2	0.1	-1.6	-1.5	-0.1
二季度	-14.6	-8.6	-0.3	-4.7	0.0	-1.0	-10.3	9.3
三季度	-4.2	-2.5	0.5	-1.0	-0.9	-0.3	-4.4	4.1
四季度	-4.9	-4.1	0.5	-2.0	-0.1	0.7	-2.7	3.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2. 工业生产显著恶化后逐步修复。2020 年，欧元区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较上年下跌 8.7%和 9.2%，均创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月度降幅呈现深“V”走势，4 月份为年内最低水平，分别达到下降 28.4%和 30.0%，均为有该项统计以来最大降幅，此后呈修复态势，年末降幅已收窄至 0.2%和 0.3%。

3. 消费市场表现低迷。2020 年，欧元区商品零售量较上年下跌 1.2%，创 2012 年以来最大降幅。其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皮革制品专门性商店的零售降幅最大，为 24.9%；通过邮购或网购的零售增速最快，达到 23.0%，增速较上年加快 13.5 个百分点。

4. 对外贸易受到重创。2020 年欧元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0286 亿欧元，较上年下降 10.0%，创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其中，货物出口额为 21315 亿欧元，下降 9.2%；进口额为 18971 亿欧元，下降 10.8%。

5. 价格水平持续低迷。2020 年欧元区通胀水平有所波动，全年消费价格上涨 0.3%，涨幅较上年回落 0.9 个百分点，创 4 年来最低水平；受交通和通讯价格拖累，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为 0.7%，较上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为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生产者价格涨幅由上年的 0.6% 大幅回落至 -2.6%，全年位于负增长区间。

6. 景气指标持续走低，市场信心难有改善。2020 年，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 1 月份的 47.9 波动回升至 12 月份的 55.2，前半年均处于收缩区间；服务业 PMI 指数从 52.5 波动回落至 46.4；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恶化，由 1 月份的 -8.1 降至 12 月份的 -13.9。

(三) 日本经济艰难复苏

2020 年，日本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重创后艰难复苏。工业、消费、贸易等主要指标在刺激政策与复工复产推动下缓慢恢复，但经济整体仍相对低迷。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仍将是影响日本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疫情再度反弹，叠加内需疲弱、通胀疲软、人口老龄化等中长期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日本经济或将延续缓慢修复态势。

1. GDP 大幅下滑。2020 年，日本 GDP 萎缩 4.8%，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分季度看，四个季度环比增速分别为 -0.6%、-8.3%、5.3% 和 2.8%，呈现大幅下滑后缓慢修复态势。从 GDP 构成看，内需、出口为经济主要拖累项，全年分别拖累经济 3.9 和 2.1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国内需求和出口分别拉低经济 5.2 和 2.9 个百分点，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得益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政府消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 0.5 和 0.2 个百分点，为主要拉动项（表 3）。

2. 工业生产缓慢恢复。2020 年，日本工业生产较上年下降 10.1%，降幅扩大 7.1 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从月度数据看，工业生产指数从 5 月份 72.2（2015 年 = 100）的年内低位逐渐企稳恢复，12 月份回升至 98.1，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

3. 国内消费持续疲弱。2020 年，在上年消费税持续影响叠加疫情冲击下，日本零售额较上年下降 3.2%，为 2002 年以来最大降幅；新车登记数下降 11.4%，降幅较上年扩大 9.3 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延续低迷态势，12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31.8，远低于疫情前 39.0 的水平。

4. 对外贸易明显恶化。2020 年，日本出口额较上年下降 11.1%，降幅扩大 5.5 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新低；进口额下降 13.7%，降幅扩大 8.7 个百分点。

5. 通缩压力不断加大。2020 年日本消费价格与上年持平，涨幅较上年收窄 0.5 个百

分点；其中，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下降 0.2%。生产者价格较上年下降 1.1%，为 2016 年以来首次转负。

表 3 2020 日本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

	2020 年	2020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GDP	- 4. 8	- 0. 6	- 8. 3	5. 3	2. 8
国内需求	- 3. 9	- 0. 2	- 5. 2	2. 6	1. 8
个人需求	- 4. 6	- 0. 1	- 5. 4	1. 9	1. 3
个人消费	- 3. 2	- 0. 3	- 4. 5	2. 7	1. 2
个人住宅投资	- 0. 3	- 0. 1	0. 0	- 0. 2	0. 0
个人企业设备投资	- 1. 0	0. 2	- 1. 0	- 0. 4	0. 7
政府需求	0. 7	0. 0	0. 2	0. 7	0. 5
政府消费	0. 5	- 0. 1	0. 0	0. 6	0. 4
政府投资	0. 2	0. 0	0. 1	0. 1	0. 1
净出口	- 1. 0	- 0. 4	- 3. 1	2. 6	1. 1
出口	- 2. 1	- 0. 9	- 2. 9	1. 1	1. 7
进口	1. 2	0. 5	- 0. 2	1. 5	- 0. 7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注：表内数据为环比贡献。

6. 就业形势严峻。2020 年，日本失业率为 2.8%，较上年扩大 0.4 个百分点，为 11 年来首次上升；因疫情导致企业用人需求减少，求人倍率为 1.19，较上年下降 0.41 个点，创 1975 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降幅。

（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2020 年，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保持正增长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和越南，增速分别为 3.1%和 2.8%。降幅较大的经济体中，新加坡经济增速由 1.3%回落至 - 5.4%；墨西哥降幅达到 8.3%；中国香港（- 6.2%）降幅扩大，并连续两年衰退，复苏更加艰难。

表 4 2019—2020 年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单位：%

经济体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中国台湾	2.9	3.1	2.5	0.4	4.3	5.1
越 南	7.0	2.8	3.7	0.4	2.7	4.5
韩 国	2.0	-0.9	1.4	-2.7	-1.1	-1.2
印 尼	5.0	-2.0	3.0	-5.3	-3.5	-2.1
巴 西	1.4	-4.1	-0.3	-10.9	-3.9	-1.1
新加坡	1.3	-5.4	0.0	-13.3	-5.8	-2.4
中国香港	-1.2	-6.2	-9.1	-9.0	-3.6	-3.0
南 非	0.2	-6.9	0.1	-17.5	-6.2	-4.1
印 度	4.8	-7.1	3.1	-24.4	-7.3	0.4
墨西哥	0.0	-8.3	-1.4	-18.7	-8.6	-4.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和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二、主要经济领域遭受冲击

（一）供给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表现不一

2020 年，世界工业生产下降 3.9%，是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 7.2%，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 0.9%，是 1997 年有记录以来首次负增长。从年内数据看，全球制造业 PMI 指标从疫情冲击中快速修复。4 月份，制造业 PMI 跌至低点 39.6%，是有数据以来最低值；7 月份，该指标回升至 50%荣枯线上方，并在年末攀升至 53.8%。全球服务业受疫情反复特别是欧洲疫情影响，PMI 指标表现不佳。4 月份，服务业 PMI 跌至低点 23.7%；7 月份，该指标回升至 50%荣枯线上方，但年末再度下挫。

（二）需求端：全球货物贸易从疫情中稳步修复

2020 年，疫情冲击市场需求并限制全球贸易往来，世界贸易大幅下滑。但防疫物资在全球的流动、市场需求在下半年的集中释放和企业对库存的补充缓解了贸易下行压力，整体贸易状况好于金融危机时期。首先是货物贸易量额齐跌，不同经济体表现不一。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2020 年全球贸易量同比下降 5.3%，好于金融危机时期的下降 12.8%。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 5.7%，新兴经济体下降 5.0%。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 年全球出口贸易额下降 6.6%，其中发达国家下降 7.7%，新兴市场国家下降 4.8%；全球进

口贸易额下降 5.8%，其中发达国家下降 6.9%，新兴市场国家下降 5.4%。其次是贸易从疫情中稳步修复。从年中数据看，全球贸易量从 5 月份的最大同比跌幅（-17.2%）稳步修复至年末的同比增长 1.3%，贸易量指数回升至 125.1，高于 2019 年年末的 123.6，显示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已经得到初步修复。

（三）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

2020 年，全球金融市场受疫情影响大幅震荡，并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一季度，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与原油价格暴跌带来的多重打击下，全球金融资产遭遇抛售，多国股市触发熔断机制，全球美元市场流动性显著恶化，美元指数大涨，多国国债收益率创下新低；此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史无前例的宽松措施及疫苗研发成功等利好消息推动下，流动性危机缓解，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在实体经济衰退过程中制造出了股市繁荣，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美元指数下行。

一是全球股市触底反弹，各国分化明显。2020 年，明晟全球股票指数累计上涨达 12.32%，再创历史新高。各国股市分化明显。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屡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全年累计上涨 43.66%，创 2009 年以来最佳年度表现，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则分别上涨 16.26%、7.25%。欧洲股市表现不尽如人意，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数全年累计下跌 14.34%，创 2008 年来最差年度表现；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 7.13%；西班牙 I-BEX 指数下跌近 15%。新兴市场表现强劲，明晟新兴市场股指全年累计上涨 13.86%，年末收盘创下历史新高。二是债市大幅波动后趋于稳定。2020 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下跌 99 个基点；德国下跌 68 个基点，英国下跌 62 个基点；日本上涨 5 个基点。三是汇市大幅震荡，美元指数暴涨后走低。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金融资产被抛售，流动性紧张推动美元指数一度大涨，2020 年 3 月 18 日突破 100 大关；随着美联储大量提供流动性，美元指数震荡下行；随后美国利率下降削弱了美元资产吸引力，加上全球风险偏好不断回升，美元指数持续走低，2020 年美元指数累计下跌 6.74%，全年振幅高达 13.99%，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升值。

（四）大宗商品价格先抑后扬

2020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先抑后扬。受疫情冲击，上半年全球商品需求疲弱，主要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下半年，随着全球相继放宽疫情限制措施，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全球流动性宽松导致美元走低，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升。全年来看，国际能源价格指数为 51.9（2010 年 = 100），较上年下跌 31.7%；非能源价格指数为 84.1（2010 年 = 100），上涨 3.0%。其中，农产品上涨 4.6%，原材料下跌 0.6%，化肥下跌 10.1%，金

属和矿产上涨 1.0%。

国际油价深“V”反弹。202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较上年下跌 35.2%。年初，因疫情叠加“OPEC+”减产谈判破裂、沙特与俄罗斯打响石油价格战，全球原油市场供应严重过剩。4 月份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跌至 17.66 美元/桶，创有记录以来新低；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中间基原油（WTI）期货价格更是跌至 -37.6 美元/桶，为历史首次出现负价格。此后，随着各国积极推进复工复产、“OPEC+”达成并延续减产协议，市场供需失衡有所缓解，油价企稳回升。12 月份，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升至 49.17 美元/桶，较年内低点上涨近 2 倍。

（五）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幅萎缩

2020 年 1 月 24 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疫情严重打击了全球投资活动，预计 FDI 将从上年的 15000 亿美元降至 8590 亿美元，是 1970 年有统计以来最大跌幅。FDI 的下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经济体 FDI 占全球份额创历史新高。报告称，2020 年，发达国家 FDI 仅为 2290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69%；发展中经济体 FDI 为 6160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12%，占全球 FDI 的 72%，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分国家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 流入国，FDI 增长 4%，达到 1630 亿美元；美国 FDI 减少 49%，降至 1340 亿美元；欧洲投资资源接近枯竭，FDI 降至 -40 亿美元，其中英国 FDI 降至 -13 亿美元。

三、2021 年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2021 年上行因素与下行风险共存，世界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疫苗积极部署和主要经济体追加政策支持等有利因素推动经济复苏预期升温，IMF、经合组织（OECD）和英国共识公司等 2021 年初的最新报告中分别上调了 2021 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幅度从 0.3 到 1.4 个百分点不等。但是，全球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各国和各部门之间复苏前景差距较大、病毒快速变异、疫苗分配不公、政策平衡难度加大等风险因素导致经济脆弱性大幅上升，经济复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积极因素

1. 主要经济体持续加码财政金融政策。一是财政刺激规模继续扩大。2020 年 12 月 8 日，日本政府临时内阁会议通过第三次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总规模达 73.6 万亿日元。2021 年 3 月 3 日，英国公布 2021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计划增加价值 650 亿英镑的财政措施支持经济复苏。3 月 12 日，美国正式签署总额达 1.9 万亿美元的新一轮经济救助计划。

二是货币政策维持宽松。3 月 14 日，英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将关键利率继续维持在 0.1%，同时维持资产购买总规模在 8950 亿英镑不变。3 月 18 日，美联储在最新发布的政策决议中表示，将继续保持每月 1200 亿美元资产的购入规模，并维持当前利率水平。3 月 18 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视频听证会上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支持欧元区经济复苏，并决定在 2021 年第二季度加大紧急资产购买计划下的购债力度。3 月 19 日，日本央行宣布维持当前超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 -0.1% 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同时将长期利率变动幅度由此前 $\pm 0.2\%$ 扩展至 $\pm 0.25\%$ ，增加利率弹性，扩大金融机构获益空间。

2. 全球疫情阶段性好转，疫苗接种计划顺利推进。一是从疫情趋势看，世卫组织周报告显示，3 月 18 日当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约 303 万例，较 1 月中旬的疫情高峰期下降 38%。全球六大区域中有五个地区新增病例数较高峰期有所下降，其中美洲、欧洲、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降幅均达到两位数，分别下降 50%、32%、69% 和 31%，东南亚地区下降 3.2%。二是从预订疫苗人口覆盖率看，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统计，截至 3 月 19 日，全球已确认新冠疫苗订购量达 86.3 亿剂，全球人口覆盖率达 54.9%，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美国、欧盟、日本预订疫苗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199.5%、227.4%、124.3%，均可实现全面覆盖。三是从疫苗接种总量看，截至 3 月 19 日，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量累计超 4.2 亿剂，其中美国疫苗接种量达 1.2 亿剂，欧盟（0.5 亿剂）、英国（0.2 亿剂）、印度（0.4 亿剂）也均处于较高水平。四是从接种覆盖率看，全球平均每百人接种量为 3.6 剂次，其中，英国（41.7 剂次）、美国（35.4 剂次）、欧盟（12.5 剂次）接种覆盖率较高。

3. 疫苗接种助推主要经济体放宽限制措施。一是放宽隔离和检测标准。美国部分州宣布国内旅行者在全面接种疫苗后 90 天内，将不再被要求进行隔离或测试；新加坡、泰国、以色列等国计划推出“疫苗护照”，为接种过疫苗的人放宽旅行限制。二是放宽社交距离管控措施。美国部分州计划放宽聚会人数限制至 200 人；德国政府宣布将在单日新增病例降至 100 例以下时放宽限制政策；英国政府宣布将根据疫苗部署计划的实施效果开放线下教学，并允许 6 人或 2 个家庭的户外聚会。三是重新开放公共场所。英国政府宣布将于 4 月 12 日重新开放非必要的零售、美发店美容院以及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此外，俄罗斯、新加坡、希腊、比利时等国也表示将考虑放宽对已接种疫苗人群的疫情限制措施。

（二）消极因素

1. 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依旧是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风险。一是全球累计病例依然较多。目前，全球疫情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由于感染基数大，现存病例依旧较多。世卫组

织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 1.21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 269 万例。其中，美洲、欧洲仍为全球疫情最严重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数分别占全球 44%、34%，死亡病例数占比分别达 48%、34%。二是病毒变异挑战疫苗效果。3 月 12 日，一篇发表在美国《Cell》期刊上的研究显示，^① 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中和抗体对在巴西、日本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有效性明显较低。尽管当前新冠肺炎疫苗对阻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散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病毒不断变异，全球抗疫前景仍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应针对变异病毒加快疫苗跟进研发及调整，以防止出现病毒进化到让疫苗失去作用的程度。三是疫苗存在较大缺口。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已上市疫苗计划产量将达 97.5 亿剂，可供全球约 61.9% 的人口实现接种，疫苗供需存在较大缺口。四是全球疫苗分配严重不公。在供应难以满足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全球疫苗分配高度不均，高收入经济体高度领先，预订量占全球比重高达 47.3%；低收入经济体则面临疫苗相对匮乏的困境，预订量占比仅为 6.5%，除非洲联盟已预订约 6.7 亿剂疫苗外，其他低收入经济体和地区将主要依赖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援助。从国家层面看，截至 3 月 19 日，全球疫苗确认订单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 的经济体为 13 个，除秘鲁外均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加拿大确认订单人口覆盖率高达 431%，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也均超过 100%，明显高于菲律宾（43.9%）、越南（41.5%）、印度（7.5%）等中低收入经济体覆盖率水平。此外，若包含协商订单与潜在追加量，加拿大预订疫苗总量将可完成人口全面接种 5.8 倍有余，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经济体不足 0.5 倍。

2. 财政能力差异助长经济前景分化。据联合国报告，2020 年发达国家的人均财政支持金额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近 580 倍，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仅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30 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冲击了生产部门，政府能否维持高强度的刺激政策以维持企业存续、生产恢复和就业市场稳定，是经济能否快速恢复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规模差异巨大，将造成复苏过程中经济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据 OECD 预测，2021 年各国增长前景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印度、中国和美国经济有望快速复苏，预期增速分别为 12.6%、7.8% 和 6.5%；土耳其、法国和西班牙增速预期略快于世界平均水平（5.6%）；而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预期增速仅为 3% 左右。

3. 全球债务危机风险上升。据联合国报告，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全球各国应对疫情

^① Wilfredo F. Garcia—Beltran. Multiple SARS—CoV—2 variants escape neutralization by vaccine—induced humoral immunity, CELL, March 12, 2021.

所采取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规模已经达到 12.7 万亿美元，导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了 15%，创历史新高。据 IMF 预测，2021 年各国将继续维持宽松政策，政府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攀升。其中，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将达到 GDP 的 125%，为历史最高点；新兴经济体政府负债将达到 GDP 的 65%。目前主要经济体名义利率处于历史低点，而一旦经济复苏动能减弱，或是政府过早退出超量化宽松政策，都将引发大规模债务违约，中小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4. 金融稳定风险不容忽视。疫情以来，各国为应对负面冲击，开启超量化宽松的政策模式，主要国家利率水平已全面处于历史低点。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四大央行政策利率都已经或基本达到“零利率”水平；印度、俄罗斯、巴西基准利率分别低于金融危机时期利率下限 25、200 和 675 个基点。主要经济体集中放水导致全球流动性激增，但由于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充沛的流动性未能有效刺激生产性投资，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和比特币等特异资产，助长了金融泡沫，对金融稳定性构成威胁。2020 年末，明晟全球股票指数较年内低点上涨 61%，其中，标准普尔 500 指数、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数、法国 CAC40 指数、东京日经 225 指数分别上涨了 68%、66%、49%、32%；美国 10 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较年内高点下降了 170 个基点，欧元区长期国债和英国、俄罗斯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则分别下跌了 56、61、250 个基点。汇率方面，美国作为“放水”规模最大的国家，2020 年末，美元指数振幅达到 13.99%，创 2014 年以来最大振幅。特异资产日益成为全球流动性新的蓄水池。2020 年，比特币市值较年内低点上涨 4439 亿美元，涨幅达到 473.8%，总市值达 5376 亿美元。

四、主要机构对 2021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

疫情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中国在疫情中的良好表现成功维持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美国下半年的经济数据也好于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两剂强心针。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普及，几个主要经济体选择继续追加刺激政策，利好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场对中期经济趋势和疫情形势的乐观情绪，大多数主要机构上调 2021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测 2021 年世界经济增长 5.5%（2021 年 1 月份预测值），较 2020 年 10 月份预测值上调 0.3 个百分点；OECD 预测增速为 5.6%（2021 年 3 月份预测值），较 2020 年 12 月份预测值上调 1.4 个百分点；英国共识公司预测增速为 5.3%（2021 年 3 月份预测值），较同年 1 月份预测值上调 0.4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出于对疫苗接种进度迟缓 and 全球金融风险累积的担忧，预测增速为 4.0%（2021 年 1 月份预测值），较 2020 年 10 月份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

表 5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的年度预测

单位：%

指标	预测机构	2019	2020 估计值	2021 预测值	指标	预测机构	2019	2020 估计值	2021 预测值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¹				通货膨胀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2.8	-3.5	5.5		发达国家	1.4	0.7	1.3
	发达国家	1.6	-4.9	4.3		发展中国家	5.1	5	4.2
	美国	2.2	-3.4	5.1		英国共识公司			
	欧元区	1.3	-7.2	4.2		世界	2.7	2.1	2.5
	日本	0.3	-5.1	3.1		美国	1.8	1.3	2.3
	发展中国家	3.6	-2.4	6.3		欧元区	1.2	0.3	1.2
	经合组织					日本	0.5	0	-0.2
	世界	2.7	-3.4	5.6	货物贸易量增速	世界贸易组织 ²			
	美国	2.2	-3.5	6.5		世界	-0.1	-9.2	7.2
	欧元区	1.3	-6.8	3.9		出口			
	日本	0.7	-4.8	2.7		北美	1	-14.7	10.7
	印度	4.2	-7.4	12.6		中南美	-2.2	-7.7	5.4
	英国共识公司					欧洲	0.1	-11.7	8.2
	世界	2.5	-3.7	5.3		亚洲	0.9	-4.5	5.7
	美国	2.2	-3.5	5.7		其他	-2.9	-9.5	6.1
	欧元区	1.3	-6.8	4.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³			
	日本	0.7	-4.9	2.8		世界	1	-9.6	8.1
	印度	4.2	-7.4	11.9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21 年 1 月；WTO，《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20 年 11 月；OECD，《经济展望：中期报告》，2021 年 3 月；英国共识公司，《共识预测》，2021 年 3 月。
注：1. 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2. 为 WTO 基准预测；3.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

参考文献：

1. Consensus Forecasts.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 March 2021.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anuary 2021.
3. OECD Economic Outlook. Interim Report Strengthening the recovery: The need for speed. March 2021.
4.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ubdued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January 2021.
5. WTO. Over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Environment. November 2020.
6.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January 2021.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 基于英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任继球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此之后都出现了从贸易保护向推动自由贸易转变，从对内投资为主向加大对外投资转变，从偏重有形生产向偏重无形生产转变，从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等趋势，随之带来了贸易逆差扩大、产业外迁、去工业化和技术外溢等压力和挑战。英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后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在半个世纪内被美国超越；美国制造业则向高度工业化发展，自登顶世界第一直至现在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制造业之所以能维持竞争力，主要是因为与英国相比，美国包容性增长造就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推动对等贸易自由化，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采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和限制潜在竞争国的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必须借鉴英美的经验和教训，理性看待当前我国制造业出现的产业外迁、去工业化等现象，警惕这些现象过早过快发展，演变成重大风险，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带来挑战。

关键词：制造业 去工业化 产业转移 产业链 高技术产业

作者简介：任继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0 年重大课题《产业转移发生机理、发展趋势与评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十四五”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顶层设计及体制机制保障研究》（A2020041007）、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新格局下稳定制造业比重问题研究》（A2021041007）的研究成果。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在 2010 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临着传统成本优势锐减，产业对外转移加大和技术引进难度倍增等新问题，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大国制造业长期发展趋势和挑战，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曾先后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后，英国和美国制造业先后出现了一些相同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英国制造业规模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 100 多年才被超越，且现在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应对这些趋势和挑战的经验做法，对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镜鉴参考。

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工厂：英美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演变

英国制造业产量在 19 世纪中叶登顶世界第一，在 19 世纪最后 10 年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1850 年左右，生产了世界 50% 的铁、5/7 的钢和 40% 的金属器件；1860 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接近 20%，居全球首位。但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等国家传播，英国制造业优势不断下降。19 世纪末，英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被超越，此后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不断萎缩。1890 年初，英国的优势产业也在衰落，在钢铁这一工业化关键商品的生产中，美国和德国双双超过英国。1900 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萎缩至 18.5%，低于美国的 23.6%（见表 1）。1913 年，英国制造业份额继续下降至 13.6%，远低于美国的 32%（见表 2）。

表 1 1750—1900 年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单位：%

年份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英国	1.9	4.3	9.5	19.9	22.9	18.5
法国	4.0	4.2	5.2	7.9	7.8	6.8
德意志诸邦/德意志	2.9	3.5	3.5	4.9	8.5	13.2
俄国	5.0	5.6	5.6	7.0	7.6	8.8
美国	0.1	0.8	2.4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数据来源：[英]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2 页。

表 2 1880—1938 年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 单位: %

年份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英国	22.9	18.5	13.6	9.9	10.7
美国	14.7	23.6	32	39.3	31.4
德国	8.5	13.2	14.8	11.6	12.7
法国	7.8	6.8	6.1	6.0	4.4
俄国	7.6	8.8	8.2	5.3	9.0
日本	—	—	—	2.5	3.8

数据来源：[英]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0 页。

注：表中日本 1928 年数据采用 1929 年数据替代。

美国制造业产量在 19 世纪末最后 10 年登顶世界第一，尽管 21 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有所下降，但至今仍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内战前的 1860 年，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仅为 7.2%。内战结束后，在其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美国制造业快速发展。1880 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上升至 15% 左右，低于英国的 22.9%。1890 年左右，美国制造业规模超越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达到巅峰。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 40%，但此后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滑趋势显现，1980 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降到 20.06%。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两者差距不断缩小。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被美国重新拉开差距。此后，美国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衰减，其低技术制造业和产业中低端环节转移或外包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下降，2010 年被中国超越（见图 1）。但至今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仍领先于其他各国，在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美国依然控制着全球产业链。例如，2019 年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前 10 家企业有 5 家美国企业，占前 10 家企业营收比重超过 50%，仅该 5 家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 30%，遥遥领先其他国家。^①

^①全球半导体协会（SIA）：《2019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报告》，2020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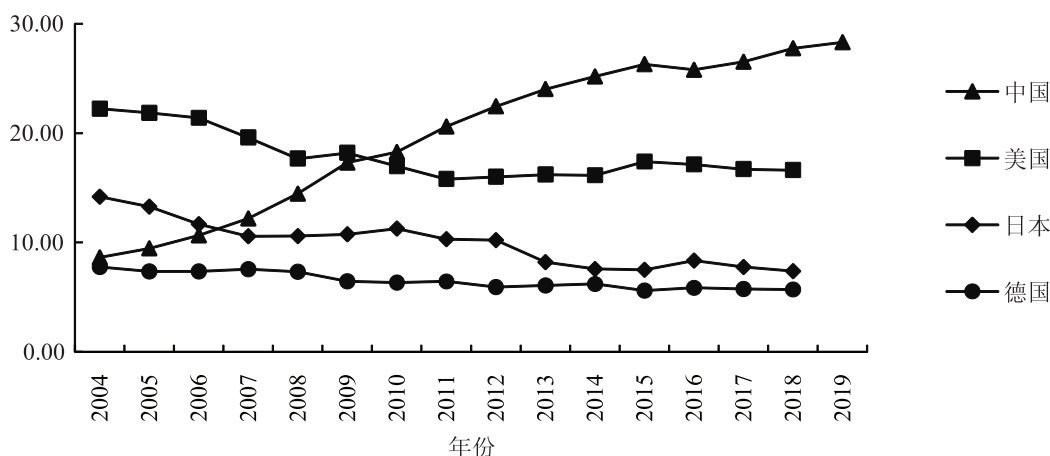


图 1 2004 年以来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世界工厂的共同烦恼： 英美制造业面临的相同趋势与挑战

（一）从贸易保护向推动自由贸易转变，贸易逆差压力加大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仍然对工业品保持非常高的关税。但随着英国制造业竞争力跃居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制造业厂商为换取国外市场开放和扩大世界商品市场，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开始逐步取消本国的贸易保护，对外开放步伐加快。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1849 年完全取消《航海条例》。1848 年，英国有 1146 种应纳关税商品，但到 1860 年已经下降到只有 48 种。1875 年，英国对制造品进口的关税率已经下调为零。英国一直沿用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美国等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外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 1850 年到 19 世纪末，即英国制造业从登顶世界第一到世界第一位置被超越期间，英国对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贸易逆差逐渐上升（见图 2）。

美国在后发追赶时期，一直实施着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内战后，其关税大幅上扬。19 世纪末，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美国贸易从逆差转向顺差，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见表 3）。在经济大萧条后，即 1934 年之后，为削减其他国家对美国进口壁垒，促进美国出口产品打开市场，美国通过一系列贸易谈判，不断削减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以换取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同等待遇。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在 20 世纪 40 年代大幅下降，50 年代早期在 10% 左右企稳，7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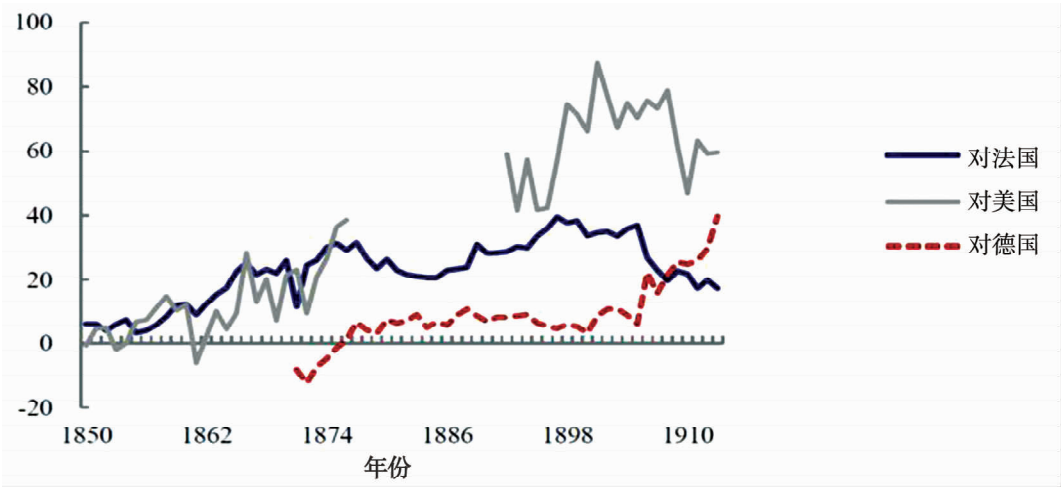


图 2 1850 年后英国对主要国家贸易逆差（百万英镑）

数据来源：兴证宏观，《19 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从历史看贸易体系变化系列之二》，第 7 页。

表 3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制造业进出口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制造品进口量	制造品出口量	制造品净出口量	制造品的国内产值	进口占国内消费份额
1859	191	46	− 145	1866	9
1869	220	61	− 159	4232	5
1879	180	133	− 47	5370	3
1889	327	166	− 161	9372	3
1899	262	381	119	13014	2

数据来源：[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6 页。

后期再降至约 5%，迄今一直维持在该水平。^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进口量开始上涨，而出口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贸易逆差压力加大。1971 年，美国出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货物贸易逆差，此后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9 年扩大至 8643 亿美元（见图 3）。

^①[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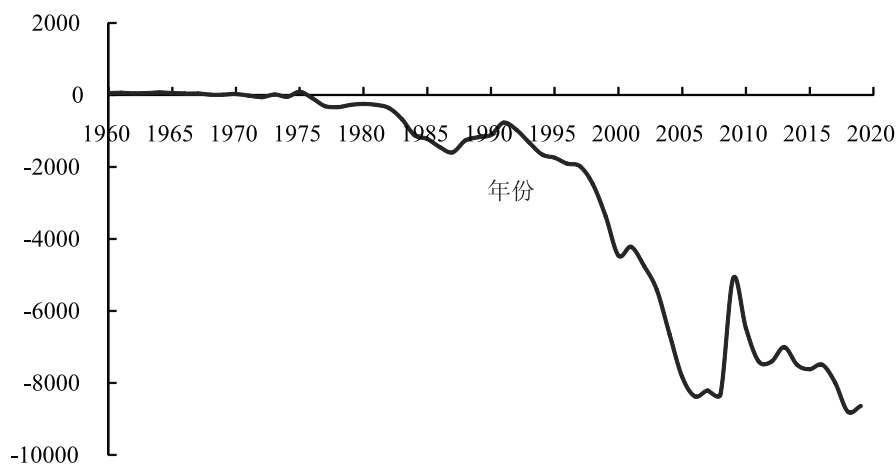


图3 1960年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二）从对内投资为主向加大对外投资转变，产业外迁压力加大

英国对外投资在19世纪中叶快速增加。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海外放款存量达到1.6亿英镑左右；50年代初，快速增至约2.5亿英镑；但在此之后到1870年间，英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年均2900万英镑。^① 1860—1870年，英国对外投资的50%以上流向欧美，对外投资规模逐渐超过国内投资。到1870年，英国海外投资已达7亿英镑左右，其中超过1/4投向美国工业。^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对外投资达到历史高峰。到1913年，英国拥有价值约40亿英镑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资产总计不足55亿英镑。^③ 英国对外投资为美国等潜在竞争国工业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高端设备，但此消彼长，英国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收缩，严重抑制了英国工业发展。在1914年前的25年里，英国国内资本形成额已远不足以让其生产设备更新，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运转。以铁路建设为例，1840—1850年，英国共开通铁路6000英里，与美国大致相当，而1870—1880年，英国仅开通铁路2000英里，不足美国同期的10%。^④

美国在19世纪末逐渐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美国国内战争后，大量外国投

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②同上，第124页。

③同上，第160页。

④同上，第121页。

资进入美国，在 1869—1875 年达到顶峰，占美国净资本比重达到 15%。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拥有 13 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但 10 年后，美国出现了 4 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加大。1946—1949 年，美国对外投资增加了近 50%，对外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欧洲各国政府。1950 年以后，美国大量投资海外制造业，跨国企业争先在海外办厂，为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持续的资金支持。1967 年，美国对外投资占全球资本支出的 55%，对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投资快速增长，同时，过多的海外投资削弱了美国国内工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②

（三）从偏重有形生产向偏重无形生产转变，去工业化压力加大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逐渐偏向无形生产，服务业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随着英国财富的积累，英国上层人士逐渐转向金融投资业务，食利者阶级不断成长扩大，依靠前几代所积累的利润和储蓄而生活，逐步远离制造业。在 19 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已无法割舍其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美国的扩张，海外收入成为英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并成为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二是由于船舶工业的崛起和军事实力的扩张，英国加强对全世界航运服务的垄断，英国航运总吨位占全世界的 1/3 到 1/2，是全世界重要的航运服务商。航运成为英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带来英国服务贸易的大幅增长。三是英国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力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依托伦敦城强势的金融地位，英国保险等金融衍生服务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在英国约 950 万人的就业中，1851 年仅有 9.1 万商业雇员；1881 年，这一数字超过 30 万人；1911 年，则达到 90 万人。^③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渐显。大量过剩资本远离实体经济，1975—1990 年，私人固定资本投资转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比例从 12%~13% 上升至 25%~26%，几乎翻了一倍。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起，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 1966 年的 26.07% 下降到 2016 年的 11.71%（见图 4），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下降，直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才止住下降趋势（见图 5）。

①[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第三卷上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19 页。

②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4 页。

③[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第 6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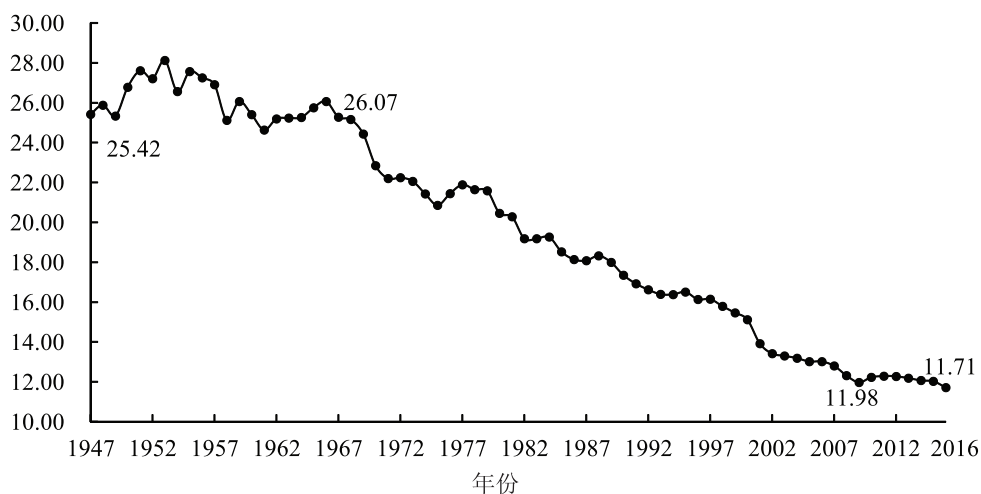


图4 194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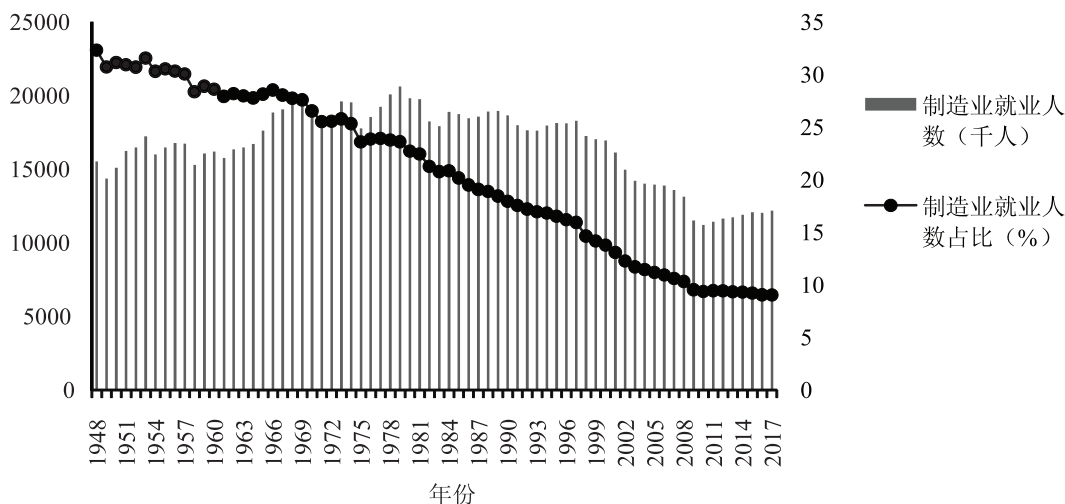


图5 194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注：就业人数采用行业全职等效雇员。

（四）从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外溢挑战加大

工业革命后，英国高技术产品输出增加，对外投资加大，对外移民也快速增长，给美国等国家带来了先进技术。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传入美国后，被大规模用于工业发展，迅速推动了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崛起。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仍处于技术跟随的阶段，主要依靠产业化欧洲的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以汽车为例，德国人奥托于 1886 年发明了内燃机，

同年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车。随后汽车技术被扩散到美国，很快美国制造出了第一台汽车，并迅速产业化。在化工领域也是如此，美国杜邦公司的先进技术主要靠外部引进，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批成熟的化工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大了技术研发投入力度，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扩大。1969 年，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研究与开发上投资的总和是 11.3 亿美元，而美国则达到 25.6 亿美元。^① 与此同时，美国技术外溢压力也逐渐加大，日本等国不断吸收和利用美国技术，并进一步在部分领域超过美国。例如，日本的钢铁行业 1951 年从美国引进了带钢连轧技术，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技术，研发出转炉炼钢技术、连续铸钢技术等先进技术，逐步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三、世界工厂的分岔路： 英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方向及其原因

（一）世界工厂发展的不同方向

英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 100 多年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两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后尽管面临着一些相同发展趋势和挑战，但两国制造业表现和发展方向却完全不同，美国制造业向高度工业化不断演变，而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

美国加快推动高度工业化步伐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汽车、飞机、通信、电子配件等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见表 4）。二是美国制造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生产生产资料的甲类工业快速发展，占制造业比重快速提升。1982 年美国甲类工业占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从 1937 年的 43.8% 上升到 53.5%（见表 5）。三是尽管美国的制造业份额在下降，但与制造业息息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却是上升的，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并不是收缩，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调整和延伸。1950—2019 年美国制造业份额下降 14.4 个百分点，但同期信息服务和专业商业服务占 GDP 比重分别上升 1.93 个百分点和 9.23 个百分点，合计提升 11.16 个百分点，接近弥补制造业份额的下降（见表 6）。尽管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美国服务贸易在近几十年里一直保持顺差，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贡献较大。

^① [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26 页。

表 4 1880—1980 年美国前十大制造业

1880 年	1900 年	1920 年	1940 年	1960 年	1980 年
棉制品	机器制造业	铁路机车	汽车	汽车	汽车
毛制品	棉制品	机器和铸造	钢铁	飞机	飞机
男子服装	木材业	木材业	棉制品	钢铁	通信
木材业	钢铁	棉制品	木材	新闻杂志	电子配件
机器和铸造	男子服装	钢铁	鞋类	妇女服装	新闻杂志
钢铁	铁路车辆	造船	面包类	木材业	钢铁
靴鞋	印刷出版	电气设备	毛制品	建筑金属	塑料
砖瓦	靴鞋	靴鞋	肉类包装	肉类产品	建筑金属
家具	木工	汽车	纸制品	面包类	妇女服装
印刷出版	水泥工	男子服装	罐头制品	商业印刷	商业印刷

数据来源：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3 页。

注：根据行业就业人数排名。

表 5 1937—1982 年美国制造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

年份	项目	甲类工业	乙类工业
1937	就业比重	39.7	60.3
	产值比重	43.8	56.2
1967	就业比重	47.5	52.5
	产值比重	52	48
1977	就业比重	47.8	52.2
	产值比重	53.6	46.4
1982	就业比重	48.9	51.1
	产值比重	53.5	46.7

数据来源：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5 页。

表 6 1950—2019 年美国制造业和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比重 单位：%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9
制造业	25.34	25.40	22.85	20.46	17.35	15.12	12.23	10.94
信息服务	3.33	3.52	3.83	4.15	4.52	4.59	4.88	5.26
专业商业服务	3.42	4.18	4.87	6.12	8.77	10.80	11.56	12.65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而得。

相比美国的去中低端化,^① 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以钢铁为例,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钢铁已成为英国的优势行业,大量出口美德等国家。钢铁制造中的大多数重大创新都来自英国,例如分别于 1856 年、1867 年和 1877 年问世的贝塞麦转炉、西门子—马丁平炉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碱性炼钢法。但由于英国钢铁更多转向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殖民地等海外市场,英国钢铁工业在采用新技术上动力不足、动作迟缓,无法跟上美德法等国的创新速度,英国钢铁工业生产率很快被世界主要国家甩在身后,在 19 世纪末期先后被美德超越。^② 1850 年,英国钢铁产量占世界比重接近 70%,1870 年下降到不足 40%,到 19 世纪末期仅为世界总产量的 20% 左右。^③ 在汽车、电气和化工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高技术产业领域,英国也都处于落后状态,新技术落地和产业化严重滞后,产业升级步伐停滞,失去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权。以汽车产业为例,20 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快速产业化,产量加快扩张。1900 年,美国汽车的产量已经达到每百户家庭拥有 0.1 辆汽车;而英国全国直到 1930 年左右才突破 1000 辆,同期美国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已经达到 89.3 辆。^④

（二）英美制造业不同表现背后的原因

在一个长历史周期里,英美制造业不同表现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资源禀赋等难以改变的因素,也有发展战略等可以改变的原因。由于历史资料和数据有限,本文选择了比较粗犷的方式,主要研究分析一些与发展战略选择相关的原因。

一是包容性增长造就庞大国内市场,很好地支撑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英美人均 GDP 水平先后快速提升。但相比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惠及各个阶层,中下层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培育造就了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⑤ 从工人工资来看,1780—1851 年,在英国工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其工人工资

① 去中低端化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美国制造业企业不断将加工组装环节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外转移,不断加大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组装件和制成品,满足国内制造业发展和消费需求。

② 相比英国,美国自 1890 年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以来一直强调、鼓励和促进国内企业竞争,竞争的经济环境迫使美国企业不断尝试和采用创新的技术。如,正是安德鲁·卡耐基不断采用酸性转炉、贝氏转炉和西门子平炉等新技术新工艺,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炼钢厂(参见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 凯恩所著《美国经济史》)。

③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7 页。

④ [美]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0 页;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89 页。

⑤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英国工人的移民和对美国等国家技术工人的输出。

的实际增长率仅为 0.8%。^① 1870—1910 年，美国工人实际年工资年均增长 2.08%，1910—1940 年年均增长达到 3.08%，收入增长水平明显高于英国。^② 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远高于英国，1870 年，美国的真实工资是英国的 1.72 倍，1890 降到 1.63 倍，1913 年又回到 1.72 倍。^③ 从财富分配来看，英国前 10% 的人群占有财富总量的比重在 1810—1870 年为 85%，到 1900—1910 年超过了 90%，前 1% 的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 1810—1870 年的 55%~60% 上升至 1910—1920 年的 70%。1910 年，即美国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的初期，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虽然处于较高水平，10% 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 80%，前 1% 的人群占有 45%，但不平等程度远低于英国（见表 7）。在此之后，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1930 年后美国 10% 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70% 以下，直到 21 世纪开始超过 70%，1% 的人群占总财富比重一直维持在 30% 左右。^④ 在如此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下，美国居民能够支付得起汽车等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有力促进了汽车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反，英国国内市场无法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一个深度市场，而由于可以持续开发殖民地、自领地等海外市场，英国也没有动力和压力开发和深耕国内市场。这导致英国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缺乏，很多起源于英国的领先技术，例如苯胺燃料、电报等难以落地和产业化，高层次市场需求不足制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英国逐渐被第二次工业革命边缘化。

表 7 英国和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时期的情况比较 单位：%

国家	10% 人群 占有总财富比重	1% 人群 占有总财富比重	10% 人群 占有总财富比重	1% 人群 占有总财富比重
英国	1850 年		1900 年	
	85	(55, 60)	90	70
美国	1910 年		2010 年	
	80	45	70	30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3、358 页。

二是美国持续推动对等贸易自由化，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也为打入国外市场创

①〔美〕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5 页。

②〔美〕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5 页。

③〔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 凯恩：《美国经济史》（第 7 版），邸晓燕、邢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4 页。

④〔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8 页。

造了条件。从 19 世纪起，英国逐渐从保守贸易政策转向单边自由贸易政策。^① 但英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不仅没有扩大开放，反而强化对英国的贸易保护。由于利益集团博弈等原因，英国一直保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成为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重要市场，英国国内市场孕育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而英国制造业却无法打入高利润的国外市场，改造升级动力和竞争压力严重不足。^{②③} 英国进口关税从 1841—1845 年的 32.2% 降至 1871—1875 年的 6.7%。^④ 美国内战之后，为保护本国工业，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从 1859 年内战前的不到 20%，提升至内战期间的 50% 左右，并在此水平维持数十年。德国在 1871 年统一后，开始大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英国的商品进口。在高关税下，英国对欧美出口大幅降低。举例来说，1840 年，欧美市场占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 29.5%，但到 1880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 10%。^⑤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逐渐开始主导推动贸易自由化，但美国主导缔造的全球贸易体系却是互惠互利的。例如，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之前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低于英国和日本，肯尼迪回合之后也仍低于英国，与日本大致持平（见表 8）。东京回合之后，美国的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仍低于欧共体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见表 9）。

表 8 主要经济体肯尼迪回合前后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 单位：%

经济体	肯尼迪回合之前	肯尼迪回合之后
美国	13.5	9.6
欧共体	12.8	8.1
英国	16.6	10.6
日本	15.5	9.5

数据来源：[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26 页。
注：肯尼迪回合于 1964 年 5 月开始，历时 3 年结束。非农业应税进口产品，矿物燃料除外。

①英国的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指的是，英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开放贸易市场，而不要求他国做出相应的自由贸易承诺。

②英国选择单边自由贸易是其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19 世纪末期在英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过程中，英国国内曾掀起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但由于其岛国资源的局限性，需要大量进口国外的原材料，为降低进口成本，国内部分行业企业坚持降低进口关税。19 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依赖海外市场资源的国家，即使后期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英国也没有推动发展战略转变。

③英国不仅在贸易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在资本输出上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放松本国对潜在工业竞争国的资本供给。

④兴证宏观：《19 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从历史看贸易体系变化系列之二》，第 4 页。

⑤[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5 页。

表 9 主要经济体东京回合前后的平均关税水平 单位: %

经济体	东京回合之前	东京回合之后
美国	6.5	4.4
欧共体	6.6	4.7
日本	5.5	2.8
加拿大	13.6	7.9

数据来源：〔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51 页。

注：东京回合于 1973 年 9 月开始，于 1979 年 4 月结束。

三是美苏争霸激发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美国制造业发展有效避免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持续主导国内的技术研发，美国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2 到 2/3 之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深入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前沿技术产业化。以集成电路为例，联邦政府不仅在研发上资助集成电路企业，还从需求侧通过军事采购大量购买集成电路产品，促进集成电路早期发展和价格快速下降，从而为集成电路产品的大规模商用化应用奠定了基础（见表 10）。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美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和起源地。而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对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英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即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国的竞争中优势明显，其自大和保守性滋生，坚信自己的技术优势仍将长期持续，导致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动力不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业界和民众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并无过多担忧，但由于对苏联军事崛起的担忧，美国为赢得对苏联的胜利，不断加大对军备和科技竞赛投入，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支持，为制造业长期发展储备了一批前沿技术，有效支撑了美国继续主导和引领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

四是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定向打压潜在竞争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半导体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优势地位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1978 年，美国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的 55%，日本仅为 22%；1986 年，日本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到 46%，而美国则下降至 40%。^① 认识到这一挑战，美国政府迅速组织起

^①〔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02 页。

对日本半导体的狙击，对日本半导体发起倾销案，逼迫日本政府对销往全球的半导体实施最低出口价格，并要求将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的外国份额从原来的 8%提升至 20%。在国内，美国通过放松反垄断法管制和政策支持等方式组织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有力促进了本国半导体企业的创新合作，大幅缩短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带动了全行业技术进步，很快便形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整体优势。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全面超越日本公司，重新确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此外，美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出口和技术扩散的管制体系，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管理，对其核心技术、人才与资源的扩散和流失实施全面管理及监控，以确保其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这种对高新技术的保护并不仅仅针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同样也通过构建等级不同的技术壁垒来防止英国等盟国获取美国的核心技术。

表 10 1962—1968 年美国集成电路的产值和价格以及军用市场的重要性

年份	总产值（百万美元）	平均价格（美元）	军用产值份额（%）
1962	4	50	100
1963	16	31. 60	94
1964	41	18. 50	85
1965	79	8. 33	72
1966	148	5. 05	53
1967	228	3. 32	43
1968	312	2. 33	—

数据来源：[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81 页。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英美制造业崛起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大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英美制造业都从保护国内市场和进口替代开始，通过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逐步培育和壮大本国制造业，提升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进而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等方式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做大做强本国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引起制造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提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难度大幅增加，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创新内生动力增强，技术外溢也开始显现，也面临新兴

国家和老牌工业国的严峻挑战。在他国贸易保护、本国传统要素成本快速提升，以及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增加的条件下，大国制造业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对外投资、产能外迁压力加大。同时，制造业的发展逐步奠定大国在全球军事和货币等领域的霸权地位，给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极大优势，服务业加快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显现。由此观之，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大国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可能会陆续出现和承受贸易逆差扩大、产业外迁、去工业化和技术外溢的烦恼与压力。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控制和延缓了这些烦恼及压力的发展速度，有效防范了这些现象和苗头快速演变成重大风险。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自 2010 年超过美国以来，占全球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9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 28%，接近美日德三国总和。同时，我国制造业也出现了产业外迁、去工业化等现象和苗头。从英美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后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出现这些现象和苗头是国际竞争中大国制造业的“共同烦恼”，但对比美国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我国这些现象和苗头出现过早。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美国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趋势，彼时美国城市化率接近 70%，人均 GDP 达到 1.7 万美元左右（2010 年美元不变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接近 6%。而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超过 60%，人均 GDP 刚突破 1 万美元（美元现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仍在 25% 左右，均远低于美国同期水平。^① 特别是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我国制造业附加值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健全，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卡脖子”技术问题突出。因此，我国必须警惕这些现象和苗头在未来一段时间演变成重大风险，发生英国制造业式的滑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挑战。需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和经验举措，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做好政策储备，强化风险管控，以双循环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转向。

第一，延缓“退”的速度。即夯实稳固国际大循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平衡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一是要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为本土制造业寻求利润更高、竞争更强的海外市场。强化与美国拜登政府的经贸谈判与沟通，加强与美国各界人士的沟通 and 交流，与美国探索设立“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基础的中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探索中美投资合作新模式。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有针对性地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第三卷下册），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98 页。

引进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增加鲶鱼效应，激发和提升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警惕在追求对外开放中出现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风险，强化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二是要推进制造业升级改造，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通过破除垄断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竞争，激发企业创新和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工程，打造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石化、纺织服装和机械等优势产业，提升和再造优势产业竞争力。三是要平衡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促进内外双循环联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相关产业分阶段、有重点“走出去”，引导国内企业加强境内境外双重布局。

第二，以“进”补“退”。即大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持续推动高度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一是要畅通国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制造业效率效益提升为导向，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和商业化等全流程一体化，推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全过程畅通。特别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保障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加快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深挖内循环市场需求潜力。二是要建设全球领先的高技术制造业市场，加速内循环新技术产业化。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聚焦重点科学问题和与产业技术难题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具有公益性质的研发项目，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为制造业未来发展储备一批前沿技术。加大公共部门采购力度，为新兴技术产业化提供应用场景。三是要鼓励重点领域优势企业建立研发和营销体系，强化对全球市场和营销网络的掌控，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贸易水平，弥补货物贸易的增长放缓。

第三，保持产业政策战略储备，应对重点行业潜在国家竞争的挑战。当前，我国制造业加快从后发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产业政策的适用条件和应用场景正在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产业政策，放弃政府对战略型产业的支持。未来仍需建立国防安全和技术创新等领域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储备，动态跟踪和评估这些战略型产业的发展情况，当潜在国竞争压力加大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化对本国战略型产业的市场保护、技术研发支持和技术出口管制。相应地，还需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技术产业和领先行业的技术管制体系，减少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外溢，保持对国外的技术领先优势，维持和夯实我国战略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2. [美]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
3. [美] 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 [美]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刘现伟、孙凤仪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5. [美] 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 凯恩：《美国经济史》（第 7 版），邸晓燕、邢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6. [美] 斯坦利·L. 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第三卷），高德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7. [美] 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 [日] 中西辉政：《大英帝国衰亡史》，王敬翔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9.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10.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
11. [英]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
12. [英]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廛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13. [英]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黄飞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14.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15. 邓久根、贾根良：《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 年第 4 期。
16. 任继球、曾耀：《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产业联盟创新发展》，《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 2 期。
17. 赵朝龙：《近代霸权兴衰与护持的技术因素研究——以战后美国技术创新与扩散管控为重点研究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

责任编辑：郭 霞

美国减税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刘栩畅

摘要：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税收政策，对我国形成税收竞争压力。美国税收政策调整不论是在税制改革内容，还是在全球影响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研究发现，美国 1980 年以来的减税政策对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有促进作用，但存在滞后现象。对收益再投资和关联债务形式的 FDI 影响迅速，但方向各异，减税能够刺激收益再投资的增加，但是关联债务形式的 FDI 流入会减少。同时减税对于制造业 FDI 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基于美国减税效应分析，可对我国税制优化等提供借鉴：一是稳步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优化国内投资和经营环境；三是主动应对国际税制挑战。

关键词：减税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 税收竞争

作者简介：刘栩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多数经济体均采取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方式。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结构性问题，缓解财政压力等，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开始调整税收政策。2017 年底，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减税为总基调的税改法案，这是美国自 1980 年以来的第四轮减税。从理论角度讲，税负成本的降低会促进企业加大投资，在美企业税负相对其他国家降低会促进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2013 年以来，我国也出台了多项企业减税举措，包括“营改增”、调降增值税税率和清理收费等。通过分析美国减税政策对 FDI 的具体影响及其机制，可从实践角度为我国下一步的减税政策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美国减税政策对 FDI 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均有较多研究。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减税政策会促进 FDI 流入，而高税负则会导致税基转出。例如，哈特曼（Hartman，1982）指出，税率降低会吸引 FDI 流入，同时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杨（Young，1988）对美国 1953—1984 年 FDI 数据的研究发现，FDI 中的收益再投资对税收、回报率的敏感性要高于其他股权投资；格洛普、科斯蒂尔（Gropp & Kostial，2001）认为，如果一国国内税负高于其他国家，税基就会转向低税负的国家。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减税政策增加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和资本回流美国的观点也较为认同。杨志勇（2018）对比了里根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分析指出，美国公司所得税税负降低，将提升美国公司的竞争力。曹婧、毛捷（2019）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认为，美国减税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税负差距，吸引企业和资本回流美国。聂平香（2018）认为，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市场、制度、智力资源等条件已具有优势，税收优惠会促进全球资本流向美国。郑联盛、陈旭（2018）认为，特朗普政府减税触及到了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实质性地降低了成本并强化了优势，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资本流动格局将使部分经济体面临较为显著的资本流出压力。还有学者梳理了美国 1980 年以来的减税内容及其影响（庞凤喜、张丽微，2015；于雯杰，2016），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张茉楠，2018；李超民、刘新利，2018），并对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竞争提出了优化建议。

国内外关于减税政策对 FDI 有积极影响的观点较为一致，但仍存在探讨空间。一是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较少。二是定量分析多限于 FDI 流量总量，关于税收政策对 FDI 流量结构、行业结构的异质性影响涉及较少。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已实施三年，结合之前三轮减税政策，可从美国的政策实践层面详细研究减税对 FDI 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以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等数据库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剖析美国 FDI 流量及其结构，深入研究减税政策对不同形式和不同行业 FDI 流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同时以美国为案例，结合对我国税收政策等的分析，提出政策启示和优化建议。

二、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任职期间的宏观经济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见图 1）。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推行了以减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目的均是促进经济增长，但宏观经济背景不同，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力度不同。

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时，美国仍处于滞胀时期。里根政府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6 年出台减税法案，简税制、宽税基、降税率，进行了大规模税改，对美国走出经济困境发挥了积极作用。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9·11”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预期造成重大打击。2001—2003 年，小布什政府颁布了三个减税法案，降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减轻企业税负，以此来带动美国经济增长。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经济仍处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泥潭中，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奥巴马政府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出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减税计划，以此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增加更多就业岗位。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时，美国国内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物价水平稳定。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减税法案出台，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负，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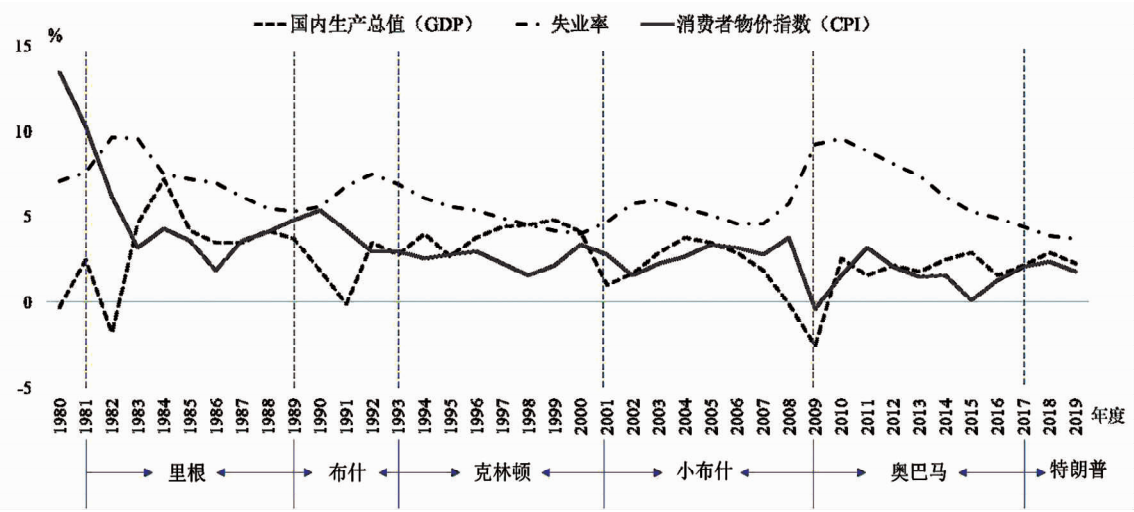


图 1 1980 年以来美国不同政府时期宏观经济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影响 FDI 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与公司投资和经营有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公司所得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共进行了四次以减税为主导的税收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两次为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每次调整中涉及联邦公司所得税的内容如表 1 所示。

如图 2 所示，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法定最高边际税率）自 1993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35%，2018 年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法案生效后降至 21%。在 2018 年之前，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因此并不是各收入规模的企业都会适用最高税率。同时，税前利润并不等于应纳税所得额，其中有折旧和抵扣方法等细节差异，因此公司实际承

表 1 1980 年以来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减税政策

时期	时间	联邦公司所得税
里根政府	1981 年	降低部分企业所得税率；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缩短各类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研发扣除；允许慈善捐赠抵扣
	1986 年	累进税率由 5 级减至 4 级；最高边际税率由 46% 降至 34%；更换折旧方法、取消或降低抵扣等扩大税基的措施
小布什政府	2002 年	对购买设备或其他经营性资产的开支给予折旧抵扣；延长亏损的追溯年限；延长多项税收优惠期限；取消对股息双重征税；出台针对小企业的折旧抵免政策
奥巴马政府	2010 年	给予企业投资税收减免
	2012 年	延长就业、研发费用、新能源抵免等多项优惠措施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由最高 35% 的边际税率降至 21% 的单一税率；对机械和设备等短期投资在 5 年内通过费用化全部税前抵扣；提升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抵扣支出；取消公司替代性最低税（AMT）；税改前公司利息支出可全额扣减，税改后限额抵扣；税改后净营业亏损抵补不可回溯，并在其后年度每年最多抵补应税收入的 80%；公司所得税由全球征税制改为属地原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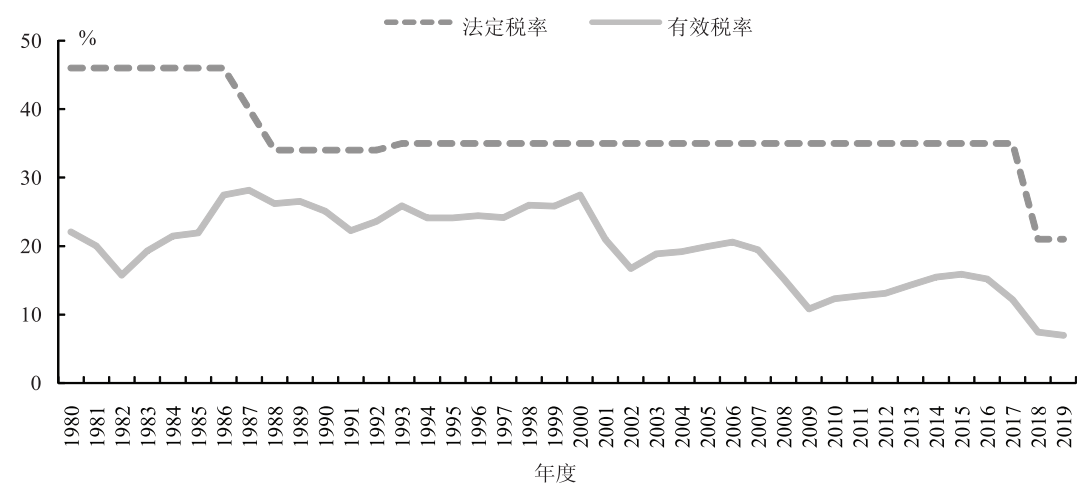


图 2 1980—2019 年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

数据来源：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美国圣路易斯联储。

担的所得税率不等于法定税率，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有效税率（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收入/公司所得税收入与企业税后利润之和）更能反映减税的综合效果。根据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的数据，虽然有效税率在部分减税周期内有小幅上升，但是有效税率总体呈阶段性下降态势。2019 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有效税率为 7%，是 1980 年以来的最低点。

三、减税政策对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原因分析

结合美国 FDI 流量及其构成的变化趋势，可分析其减税政策的具体影响及可能的原因。

（一）整体上减税促进 FDI 的流入，但存在一定滞后性

FDI 是跨境投资的一种，特点是一经济体的居民对另一经济体的居民企业实施了管理上的控制或重要影响。除带来控制或影响的股权交易之外，直接投资还包括公司间借贷、联属企业间股权和债务交易等形式。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为美国国际收支数据。国际收支中对直接投资的统计有两种原则，分别为资产/负债原则（Asset/Liability Principle）和方向原则（Directional Principle）。在方向原则下，关联债务为美国子公司的债务和债权，可将逆向投资视为撤资，更有助于了解直接投资的动机等情况，本文使用的美国 FDI 数据即为方向原则下的统计数据，数据期为有统计数据的最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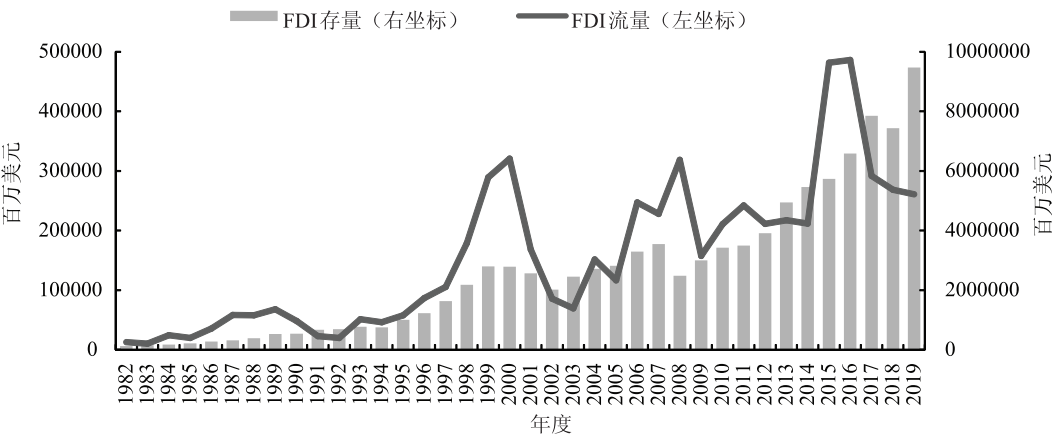


图 3 1982—2019 年美国 FDI 流量和存量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美国 FDI 的总体情况如图 3 所示。美国 FDI 流量规模自 1982 年以来一直为正值，2019 年为 2609.4 亿美元。2019 年底，美国 FDI 存量规模达到历史峰值 9.5 万亿美元。结合宏观经济背景和表 1 中几个减税时间点，可以分析得出，减税对美国吸引 FDI 有促进作用，但有一定滞后性。里根政府实施了多次以减税为主的公司所得税政策调整，但是减税后对 FDI 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立即显现。里根政府减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国 FDI 流量规模在 1985 年之后才开始呈现逐步扩大趋势，1989 年达到阶段性峰值。小布什政府 2003 年开始实施公司所得税的政策，而 2003 年反倒是 2000 年之后 FDI 流量最低

的一年，之后FDI流量规模才逐步呈扩大趋势。奥巴马政府 2010 年调整公司所得税政策，但 2010—2014 年期间的 FDI 流量规模相近，2015 年才开始大幅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自 2018 年初起生效，但 2018 和 2019 年美国 FDI 流量规模为近年来的低值。由此看，以减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对 FDI 的促进作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

从投资方式看，FDI 可分为股权投资和债务工具两类。股权投资可分为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和收益再投资。债务工具是美国子公司与外国母公司或母公司集团的关联债务，后文均称为关联债务。每种形式 FDI 的影响因素不同，需要分别分析减税的作用机制。

（二）减税对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形式 FDI 的促进作用明显滞后

如图 4 所示，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在 FDI 流量规模中的占比基本保持在 50% 以上，因此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的变化决定了 FDI 流量的基本走势。分析图 4 可知，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对于减税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是减税对 FDI 促进作用滞后的主因。里根政府税收政策调整后，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从 1986 年才开始明显上升，1990 年达到阶段性峰值。小布什政府调整税收政策后，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在 2003—2005 年的流量规模均低于 2002 年，2006 年才开始逐步上升。奥巴马政府时期，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流量规模也在税收政策调整后出现下滑，2011—2014 年的流量规模均低于 2010 年。特朗普政府减税后，2018 年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较 2017 年略有增长，但 2019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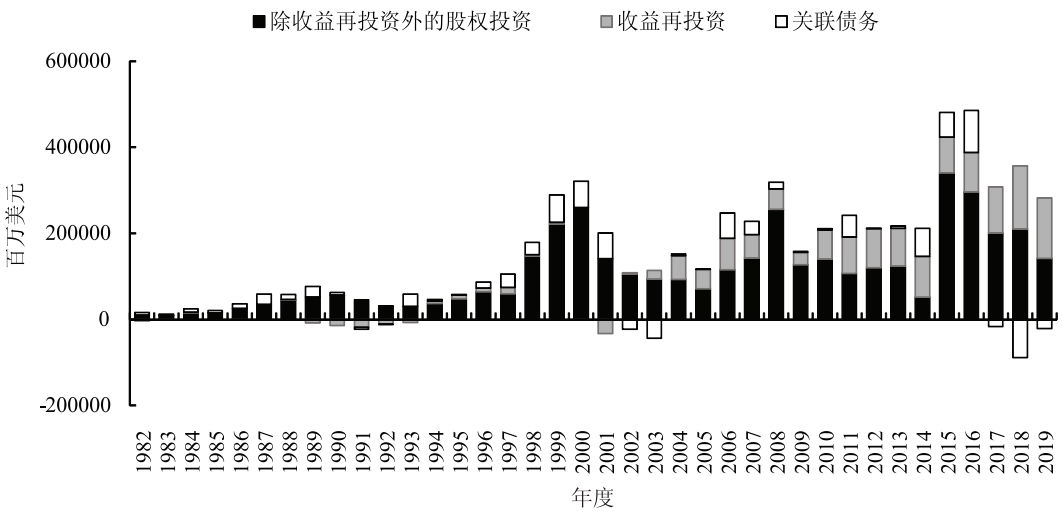


图 4 1982—2019 年美国 FDI 流量构成（分投资形式）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投资决策对于减税的反应速度和程度。外国公司在美直接投资的目的包括拓展市场、布局全球产业链等多种原因，在投资决策时往往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或是合适的地点进行绿地投资，设计合适的股权结构，进行尽职调查和可行性研究等前置投资程序等。因此，虽然理论上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对 FDI 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投资决策需要一定时间。同时，税负并不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企业跨国投资时有其战略布局，还会考虑人工成本、制度环境和经济增长前景等多种因素，美国国内的投资保护主义加剧也是影响 FDI 流量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减税并没有立即增加除收益再投资外的股权投资形式的流量规模，进而影响 FDI 的总体流量。

（三）减税对收益再投资形式的 FDI 具有快速、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 5 所示，美国收益再投资在 1989—1993 年以及 2000—2001 年为负值，但是 2003 年之后对 FDI 流量的贡献逐渐增大，2018 年达到最大规模，为 1467.9 亿美元，占当年 FDI 流量的 54.7%。收益再投资在 2003 年之后才形成稳定的流量规模，并对 FDI 越来越重要，在结合减税影响分析时，主要集中在 2003 年之后的时间段。美国收益再投资形式的 FDI 流量规模在历次减税后均有上升，例如 2002 年、2010 年和 2017 年的减税政策后，收益再投资形式的 FDI 对减税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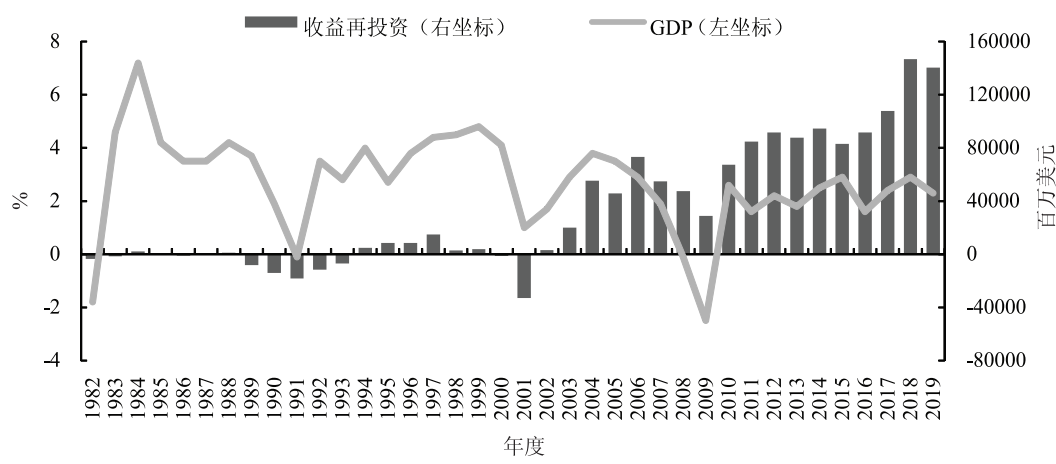


图 5 1982—2019 年美国 FDI 中收益再投资流量与 GDP 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分析减税对收益再投资的影响时，需要进一步对收益再投资进行分析。在国际收支统计中，收益再投资是直接投资者将在直接投资企业中应享受的归属收益用于再投资。收益再投资是企业对税后利润在再投资与分配股利之间的选择，减税政策可以带给企业未来更大的预期收益，会鼓励企业将收益用于再投资，而不是立即分配。此外，收益再

投资形式的 FDI 会有明显的顺周期特点。一方面，经济上行时期，企业利润一般会增长，归属于投资者的收益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另一方面，企业基于对经济增长形势和盈利能力的判断进行决策，在经济增长呈上行趋势时，会将更多的收益用于再投资，而经济下行或者增长形势不明朗的时候，则会减少收益再投资。分析图 5 可知，美国收益再投资为负值或明显呈收缩态势的年度，均对应于美国经济下行或衰退时期。

（四）减税对关联债务形式的 FDI 具有削弱作用，且快速显现

在股权投资还未形成较大规模之前，关联债务形式的直接投资曾与股权形式的投资平分秋色。关联债务形式的 FDI 是归属于美国子公司的债务减去归属于美国子公司的债权，其中美国子公司的债务是外国投资者以债务形式的直接投资。如图 6 所示，在减税政策出台前后，美国子公司债务均会出现大规模减少或是负值的现象，如 2002 年、2003 年、2009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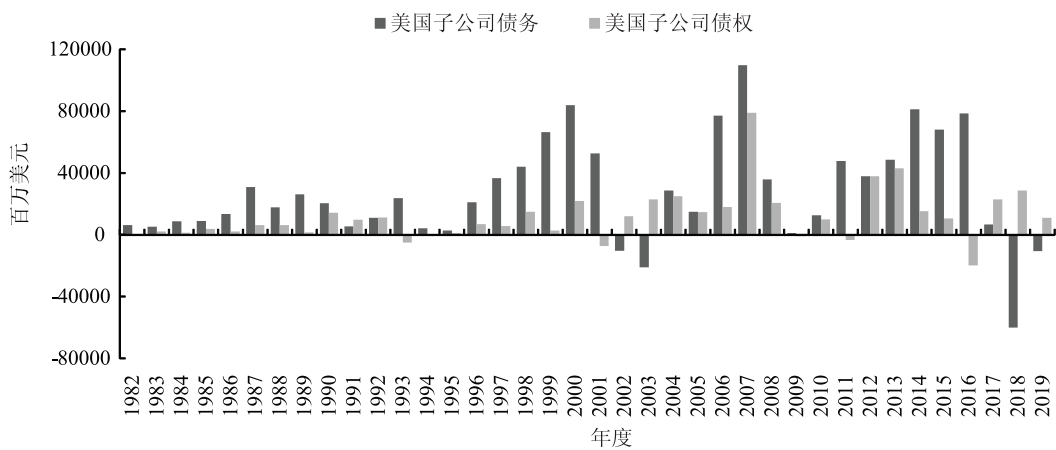


图 6 1982—2019 年美国 FDI 中关联债务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分析可能的原因与债务在公司财务中的“税盾”作用有关。在计算公司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先扣除利息支出，因此债务规模越大，利息支出越高，应纳税所得额就越低，应缴税额也就越低。当公司所得税税率较高时，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债务融资比重，以降低所得税支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减税后，美国子公司的债务流出规模大幅高于历史水平，除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外，此次税改中设置了利息支出税前扣除的比例，利息支出不能再以全额在税前抵扣。同时，针对关联公司间利息等费用扣除新设了税基侵蚀和反滥用税（Base Erosion and Anti - Abuse Tax, BEAT）规定。降税和利息支出抵扣政策的变化，使境外母公司及关联公司对美国子公司的直接投资结构进行了大幅调整，降低债务形式投资比重，造成了关联债务形式的 FDI 流量额为负的情况。

（五）减税对制造业 FDI 流入的促进作用最大

美国 FDI 流量的行业构成如图 7 所示。制造业的 FDI 流量在 2015 年达到历史峰值，为 2309.8 亿美元，2019 年降至 920.3 亿美元。批发贸易业的 FDI 流量规模一直较小，仅 2000 年和 2017 年超过 500 亿美元。金融保险业 FDI 流量在 2008 年创历史峰值，达 1201.1 亿美元，其余年份大多在 500 亿美元上下波动。其他行业的 FDI 流量在 2016 年达到历史最大规模，为 1802.3 亿美元，其余大部分年份均在 1000 亿美元以下。结合美国宏观经济基本情况和减税政策的几个时间点，可分析出减税对制造业 FDI 有一定积极影响，而其他行业则对税收政策调整反应不明显。在每次以减税为主导的税收政策调整后，美国制造业 FDI 的流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上升趋势，例如 2003—2006 年制造业 FDI 流量的逐步增长，以及 2018 年制造业 FDI 的大幅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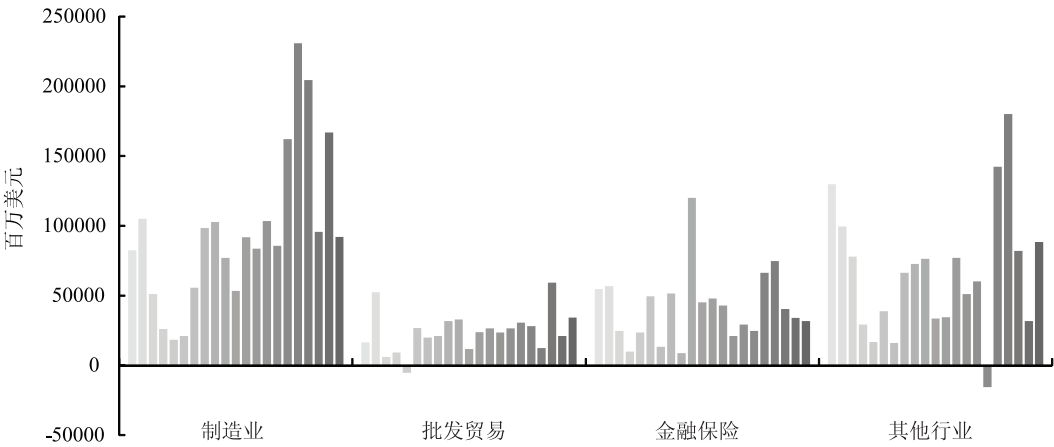


图 7 1999—2019 年美国 FDI 流量构成（分行业）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从行业本身特点来说，制造业固定资产比重一般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制造业也是技术研发的核心行业，因此对于减轻公司所得税负中常用的资产加速折旧、研发支出抵扣等政策，会受到更大的积极影响。从一国税收政策设计来说，强大的制造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石，因此税收政策会更多地体现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在设计上也会针对制造业固定资产比重较高、研发费用支出规模较大等特点，鼓励制造业投资。

四、对我国的启示

综合以上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减税对 FDI 的影响，可知减税的内容对于不同形式、不同行业的 FDI 影响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财税政策的制定中应予以关注。除美国以外，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近年也纷纷出台企业减税政策，促进投资，我国面临的税收竞

争压力逐步加大。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外资发展阶段和税制体系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政策也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情况。

（一）稳步推进结构性减税

我国近年来也在实施减税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清理涉企收费以及改革个人所得税等。从美国的减税情况看，政策对吸引 FDI 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滞后效应，因此我国应稳步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释放政策红利。同时，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单纯地减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就体现出“有增有减”，例如设置利息抵扣上限，其实可以算增加税负。对我国来说，在减税的同时要优化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一是适当提高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等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增大税制的累进效应，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二是降低企业税负，促进投资和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税负减轻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增加税后收益，从美国的经验看，对于股权投资有明显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利用外资存量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基础上，外资流量中收益再投资的比重会逐渐增加，降低企业税负的作用会快速显现，促进外资企业以其收益在中国境内扩大投资，更有助于受减税政策促进影响最大的制造业发展。

（二）优化国内投资和经营环境

从美国的经验看，减税一般是宏观经济政策或是税制改革的一部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往往是一系列政策激发的综合结果。因此，在减税的同时要协调配合其他领域的政策。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看，税负差异只是影响 FDI 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市场空间、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因素。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已跃居第 31 位，但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分项看，排名相对靠后的是获得信贷（第 80 位）、纳税（第 105 位）等指标。具体到纳税领域，企业直接负担的所得税、社保费、财产税以及其他各种收费等均记入税负，导致该指标数值较高，这也是我国纳税环节得分较低的主要原因。除减税政策外，我国应积极推进涉企收费清理、社保制度改革等多项措施。为发挥减税政策的更大效应，还应继续推进国内相关制度改革，例如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实施“放管服”改革，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不断优化投资和经营环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三）主动应对涉企国际税制挑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普遍关注跨国企业的转移定价问题。为此，二十

国集团 (G20)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起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项目, 由 OECD 研究并提出行动计划。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企业所得税制进行了大幅改革, 不同于 OECD 仅是国际税收的协作层面, 而是将具体措施落到了税制改革, 提出了国内解决方案, 更多体现了美国利益。具体措施包括对于受控外国子公司取得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入美国股东的应税收入, 设立 BEAT 等。对我国而言, 境内已有较大规模的外企投资, 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数量和投资规模也在增长, 同时我国也面对着 BEPS 等挑战, 未来将涉及更多国际税收规则和治理协调的问题。因此, 应及时关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新动向, 兼顾税收征管和企业发展需求, 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先行先试, 主动应对国际税收治理挑战。

参考文献:

1. 杨志勇:《里根与特朗普税制改革的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8 年第 3 期。
2. 曹婧、毛捷:《美国减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9 年第 2 期。
3. 聂平香:《特朗普减税对全球 FDI 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国际贸易》2018 年第 2 期。
4. 郑联盛、陈旭:《特朗普税改“冲击波”: 经济影响与政策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18 年第 3 期。
5. 庞凤喜、张丽微:《我国结构性减税的总体规模、方向选择与效果评价思考——基于美国减税浪潮的分析与借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
6. 于雯杰:《美国三次减税的比较研究》,《公共财政研究》2016 年第 5 期。
7. 张茉楠:《特朗普税改法案: 面向未来的大国竞争》,《宏观经济管理》2018 年第 11 期。
8. 李超民、刘新利:《美国国际税制改革及其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18 年第 4 期。
9. Hartman D. G. *Tax Polic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0967>, 1982.
10. Young K. H. *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Rates of Retur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Tax Journal, Volume 41, Number 1, 1988.
11. Gropp R. and Kostial K. *FDI and Corporate Tax Revenue: Tax Harmonization or Competition?* 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ume 38, Number 2, 2001.

责任编辑: 郭 霞

北极地区能源问题研究

魏 蔚 陈文晖

摘要：全球变暖使北极能源开发逐步变为现实。尽管北极地区蕴藏着巨大的能源资源，但从成本、环境、能源价格、地缘政治等方面考虑，油气全面开发并非易事。北极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及能源转型的前景看好。美国和俄罗斯意在成为北极能源开发的主导，在北极能源开发方面新举措不断。中国在北极的能源合作开发渐入佳境，但作为后来者，优势和劣势共存，机遇和挑战同在。未来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升温，中国北极能源开发进程取决于同美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进程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北极能源开发也为中国企业探索北极能源开发新技术和开拓可再生能源新市场提供了机遇。

关键词：北极 能源开发 能源合作 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

作者简介：魏 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文晖，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时尚研究院教授。

21 世纪以来，北极冰盖不断融化，冰层厚度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气候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 2 倍，气温升高使北极的能源资源开发日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北极国家也在进行能源转型，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北极能源开发与能源转型并存，能源资源的争夺，使地缘政治风险逐步加大，北极能源问题也更加错综复杂。

一、北极地区油气开发繁荣局面能否出现尚存疑虑

根据美国能源情报信息署（EIA）的数据，北极地区陆上及近海已探明的油气资源储量为 4.1 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探明石油储量的 13%、天然气储量的 30%、天然气液储量的

20%。从地理分布看，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占北极油气储量的 50%左右，美国占 20%左右，其余则分布在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几个环北极国家。俄罗斯的储量以天然气为主，美国储量以石油居多（具体见表 1）。丰富的储备及开发技术的不断提升，使北极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表 1 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及国别分布

地区名称	原油 (十亿桶)	天然气 (万亿立方英尺)	天然气液 (百万桶)	统计油气 (百万吨油当量)
西西伯利亚盆地（俄罗斯）	3. 66	651. 50	20. 33	132. 57
北极阿拉斯加（美国）	29. 96	221. 40	5. 90	72. 77
东巴伦支盆地（挪威、俄罗斯）	7. 41	317. 56	1. 42	61. 76
东格林兰裂谷盆地（丹麦）	8. 90	86. 18	8. 12	31. 39
耶尼塞哈坦加盆地（俄罗斯）	5. 58	99. 96	2. 68	24. 92
美亚盆地（加拿大、美国）	9. 72	56. 89	0. 54	19. 75
西格陵兰东加拿大（加拿大、丹麦）	7. 27	51. 82	1. 15	17. 06
拉普捷夫大陆架（俄罗斯）	3. 12	32. 56	0. 87	9. 41
挪威边界（挪威）	1. 44	32. 28	0. 50	7. 32
巴伦支海平台（挪威）	2. 06	26. 22	0. 28	6. 70
欧亚海盆（挪威、俄罗斯）	1. 34	19. 48	0. 52	5. 11
北卡拉盆地和平台（俄罗斯）	1. 81	14. 97	0. 39	4. 69
提曼—佩科拉盆地（俄罗斯）	1. 67	9. 06	0. 20	3. 38
北格陵兰山断裂边缘地带（丹麦）	1. 35	10. 21	0. 27	3. 32
罗蒙诺索夫—马卡罗夫海岭（加拿大、丹麦、俄罗斯）	1. 11	7. 16	0. 19	2. 49
斯维尔德鲁普盆地（加拿大）	0. 85	8. 60	0. 19	2. 48
莉娜—纳巴盆地（俄罗斯）	1. 91	2. 11	0. 06	2. 32
北楚科奇—兰格尔前陆盆地（俄罗斯、美国）	0. 09	6. 07	0. 11	1. 20
维尔吉茨基盆地（俄罗斯）	0. 10	5. 74	0. 10	1. 16
西北部拉普特夫海陆架（俄罗斯）	0. 17	4. 49	0. 12	1. 04
莉娜—维柳盆地（俄罗斯）	0. 38	1. 34	0. 04	0. 64
兹利扬卡盆地（俄罗斯）	0. 05	1. 51	0. 04	0. 34

续表 1

地区名称	原油 (十亿桶)	天然气 (万亿立方英尺)	天然气液 (百万桶)	统计油气 (百万吨油当量)
东西伯利亚海盆地（俄罗斯）	0.02	0.62	0.01	0.13
霍普盆地（俄罗斯、美国）	0.002	0.65	0.01	0.12
加拿大西北部内陆盆地（加拿大）	0.02	0.31	0.02	0.09
总计	89.98	1,668.66	44.06	412.16

资料来源：Philip Budzik. Arctic Oil and Natural Gas Potential. https://www.arlis.org/docs/vol1/AlaskaGas/Paper/Paper_EIA_2009_ArcticOilGasPotential.pdf. , Oct. , 2009.

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壳牌、英国石油、俄罗斯国家石油、俄罗斯国家天然气、法国道达尔、意大利埃尼和挪威国家石油等大型油气公司纷纷组成战略联盟，在巴伦支海、楚科奇海、波弗特海等沿岸和近海地区进行油气勘探。尽管在北极地区开发石油成本较高，在低油价下盈利困难，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使成本不断降低，未来在北极开发油气资源还是具有较好的前景。挪威 Johan Castberg 海上石油项目和阿拉斯加 Pikka Unit 陆上石油项目已经将石油开采的盈亏平衡价格从每桶 100 美元降至 35 美元，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和阿拉斯加 LNG 项目的启动使北极油气开发逐步具有了竞争力，格陵兰岛也计划在 2021 年开始油气竞标，未来北极能源开发利用的步伐似乎越来越近了。

但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并非轻而易举。首先，北极油气开发成本高。恶劣的气候环境会大幅增加油气的开采成本，而脆弱的自然环境也增加了油气公司在环境安全方面的投资。其次，较低的油价使北极油气开采缺乏吸引力。北极油气储量的公认数据还是美国地质勘探局在 2008 年公布的，当时处于油价的高点，有利于北极油气的开发。随着近几年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油气需求不振，北极油气开采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第三，石油公司除了负担深度钻探的成本外，还需要承担石油泄漏的财务和声誉风险。在较冷的温度下，水和石油很可能会冻结并成为冰和永久冻土的一部分，在环境中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石油在热带溢出的时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就损失了 187 亿美元，在北极的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对名誉的损失会更大。^① 北极油气开发所需的时间较长也蕴含着风险，业务环境可能在项目启动和完成日期之间发生巨大变化，加之环北极各国不同的油气开采许可证制度

^①Michael John Laiho, Four Myths About the Arctic Oil and Gas Bonanza. <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analysis—busting—myth—arctic—oil>, Oct 24, 2018.

及基础设施的缺乏，造成在北极地区油气开发延迟和成本超支的风险很高。近十年，尽管人们普遍对北极近海石油资源开采寄予厚望，但实际勘探和生产进展缓慢，迄今为止，也只有两个油田和一个天然气田在生产。^①

二、北极地区可再生能源转型充满希望

北极的油气资源开发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使土著居民和开发公司受益。但这种开发不可持续，还造成了许多北极社区对化石燃料供电、供暖和运输的依赖，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实际上，北极地区不仅富含油气，稀土元素、水电、风电、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同样不容小觑。目前北极地区的水电和地热能是主要的可再生能源，水电装机容量已超过 80 吉瓦。风电年理论发电量、技术可开发量分别占全球风能资源的 18.5% 和 17.2%，技术可开发容量为 110.6×10^8 千瓦，其中陆地 73.1×10^8 千瓦，海域 37.5×10^8 千瓦。北极理事会可持续发展工作组（SDWG）的优先事项就是为北极社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能源、农业以及环境管理等全面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提供可靠的电力和供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许多环北极国家也将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通过有效整合清洁能源资源，实现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以及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平衡发展。

可持续发展工作组设立的北极可再生能源项目，由美国、加拿大和格维奇国际理事会（GCI）共同组织。主要致力于编制包括风电、水电、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北极地区可再生能源在线图集，同时为社区提供能源生产、消费、效率数据库以及最佳实践指南，该项目已经募集了 27.5 万美元的资金进行相关研究。美国能源部成立了印第安人能源办公室，负责制定北极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以及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发展规划。美国北极研究委员会北极可再生能源工作组（ARWG）的主要工作是推动偏远北极社区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源系统的研究，将可再生资源和支持技术纳入社区发电系统，旨在增加当地就业，减少空气污染和碳足迹，降低消费者成本。加拿大政府与专家和社区领导人合作，为可再生能源投资创建一个可复制、可扩展和自我维持的发展模式，以减少北极社区对柴油的依赖。计划到 2020 年，在三个候选社区部署低影响、全社区范围的环境友好型可再生能源技术。

^①Daria Shapovalova, Kathrin Stephen. No race for the Arctic? Examination of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legal regimes for offshore petroleum licensing and level of industry activity. *Energy Policy*, 129 (2019), pp. 907~917.

可再生能源也被视为欧洲北极地区的机遇。^① 法罗群岛具有风能，格陵兰岛水资源丰富。挪威和冰岛已经投资水力发电，并将过剩的电力出口到丹麦。北大西洋能源项目正在研究将该地区孤立的能源系统连接起来，比如在挪威和格陵兰之间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网络，或者将英国和冰岛通过可再生能源网络联系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环北极国家，冰岛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意识到了能源转型的重要性，90 年代气候变化的讨论更是促使冰岛开始了以水电和地热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到 2018 年，水电和地热能消费已经分别占冰岛初级能源消费的 55.6% 和 24.2%，冰岛计划到 2050 年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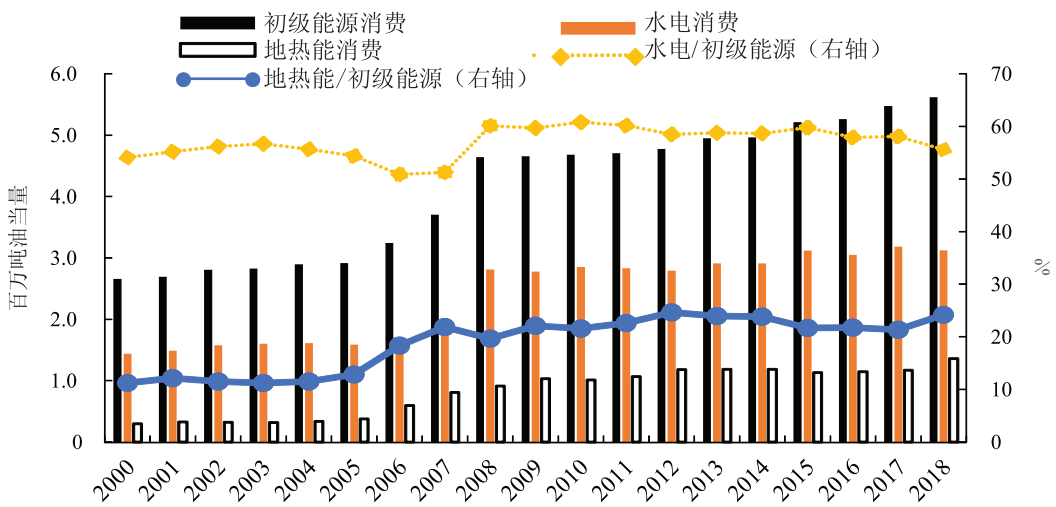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8 年水电和地热能成为冰岛初级能源消费的主力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整体来看，北极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开发都具有巨大潜力，既有鄂毕湾和普雷德霍湾油田及亚马尔天然气田的成功开采，也有冰岛能源成功转型的范例。一旦将北极的油气资源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结合起来，在有限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二者相互补充，不但可以显著降低系统成本，增加电力系统可靠性，同时依旧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北极地区有望成为全球能源开发应用及转型的样板。

三、美国和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新动向

美国和俄罗斯在 8 个环北极国家中资源储藏最多，影响最大，二者一直试图成为北极

^①Doris Friedrich, Renewable Energy Seen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uropean Arctic. <https://www.newsdeeply.com/arctic/articles/2016/11/21/renewable-energy-seen-as-an-opportunity-for-the-european-arctic>, 21/11/2016.

开发的主导，对北极能源开发有着重大影响。两国对北极能源开发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俄罗斯对北极开发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美国对北极能源开发也越来越重视。

（一）美国的北极能源开发政策变化

处于北极地区的阿拉斯加州曾经是美国石油主产地之一，1988 年产量最高时曾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近 1/4，但随着美国本土页岩油气革命的兴起，吸引了大量投资，北极油气生产则因为缺乏资金而日渐衰落，能源开发进展缓慢。

1. 美国对北极的主要关切是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历届政府从尼克松到小布什都对其北极地区的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科学探索、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方面予以更多的重视。美国的北极战略仅从宏观层面和理念层面进行了规划与设计，没有上升到优先议程和国家战略高度，^① 北极能源开发也不是美国北极政策的核心。直到 2013 年才由奥巴马政府颁布了美国第一份正式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文件，包括三个战略方向：推进美国安全利益、积极参与北极管理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在推进国家安全利益战略中，着重强调了北极在保障未来美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提出可以在经济、环境和气候政策目标范围内，积极与利益攸关方、工业界和其他环北极国家合作，负责任地开发北极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但总体基调依然是以保护北极自然环境为主。虽然这期间美国也在北极的国家石油储备区批准了油气钻探招标许可，但整体效果不佳。

2. 特朗普政府鼓励北极油气开发。特朗普上台以后，推出“美国优先能源战略”，重新评估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等相关法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取消奥巴马政府的多项限制本土化石能源开发的政策文件，意在增加美国化石能源产量，实现能源独立，并通过出口化石能源实现能源主导。北极的能源也逐步得到重视，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禁止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NWR）以及楚克奇和波弗特海域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禁令，还签署了《美国专属经济区及阿拉斯加海岸和近岸的海洋测绘备忘录》，以便更好地为油气勘探服务。甚至公布了 2019—2024 年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五年计划草案，意在推动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

3. 拜登上台后美国北极能源政策面临变数。2020 年美国大选拜登赢得胜利，美国的北极能源开发再次面临变数。拜登在竞选时发布的能源计划“清洁能源创新和环境公平”中表示，由于北极地区极端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挑战，他会将气候变化重新确立为北极理事会的优先事项，专注于减少北极黑碳和甲烷的污染，还将与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合作在全球暂停北极近油气海钻探。美国的北极能源开发本身就一直面临成本高、投

^①孙凯、杨松霖：《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北极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2 期。

资不足以及环保组织反对等问题，拜登上台后预计会禁止北极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租赁，并将这一理念推广到全球范围，有可能转而支持北极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美国的北极能源政策可能会再次向奥巴马执政时的政策转向，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北极油气能源开发可能会面临搁置的局面。

（二）俄罗斯的北极能源开发

俄罗斯对北极的开发比较重视，在油气资源开发、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破冰船等运输设备以及动力储备等领域全方位介入。

1. 全面制定北极开发战略。苏联解体后，严重的经济困境使俄罗斯缺乏足够资金用于北极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维护。近些年，俄罗斯北极开发逐步恢复。2001 年，普京签署了首份涉及北极开发战略的政策文件《俄罗斯联邦至 2020 年期间的海洋政策》；2008 年又颁布了首份北极开发纲要《俄罗斯联邦在北极至 2020 年及以后的国家政策原则》，强调自然资源是第一国家利益，其次是维护北极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第三是保护北极独特的生态系统，第四是推广北海航线作为俄罗斯管辖范围内的国际水道；2010 年，又颁布《2011—2020 年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纲要》；2011 年成立俄罗斯北极科研中心；2020 年 3 月，再次出台了《2035 年前国家北极政策基础》，仍将北极地区视为油气开发重点区域，支持对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石油和天然气技术的投资，进一步开发北海航线，加速北极地区经济发展，保护北极环境和少数民族原始栖息地及传统生活方式，加强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各项北极争端，维护俄罗斯在北极的国家利益。

2. 积极开发北极天然气项目。俄罗斯北极地区天然气储量丰富，2019 年总产量 1650 万吨的北极亚马尔 LNG 项目提前满负荷运转，不仅新增加 25 亿美元的销售利润，更提振了俄罗斯开发北极油气资源的信心，大型 LNG 开发项目逐步增加。北极液化天然气 2（Arctic LNG2）项目由 3 条液化生产线组成，每条生产线年产量 660 万吨，计划 2023 年第一条生产线投入使用，2024、2025 年分别投入使用第二和第三条生产线，2026 年实现满负荷运行，总产量将达到 1980 万吨。鄂毕液化天然气（obLNG）项目勘探也计划在 2023 年左右完成。^① 此外，诺瓦泰克公司还宣布北鄂毕湾气田的天然气开发量可达 9000 亿立方米，并将这一项目命名为北极液化天然气 3（Arctic LNG3）。为了应对巨大的 LNG 以及煤炭、石油和各种矿石运输，俄罗斯对北极的北海航线寄予厚望，计划将运输

^①Marlène Laruelle. Russia's Arctic Policy: A Power Strategy and Its Limits.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russienevisions/russias-arctic-policy-power-strategy-and-its-limits>, March, 2020.

量从 2018 年的 1800 万吨增加到 2024 年的 8000 万吨，北海航线的开通将会使北极夏季通往亚太地区的航程大幅缩短，时间减少近一半，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并为俄罗斯带来数万亿美元的财富。

表 2 2013—2024 年北海航道的运输量变化及预测 单位：百万吨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24
2.8	3.7	5.15	7.5	9.7	18	80

资料来源：Marlène Laruelle. Russia’s Arctic Policy: A Power Strategy and Its Limits.

3. 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面临的问题。其一，面临资金和技术限制。俄罗斯正在遭受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限制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诺瓦泰克公司等多个俄罗斯公司以及银行进入美国债券市场，欧盟和美国还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用于北极深海和页岩开采项目的高科技石油装备，俄罗斯北极油气开发的融资渠道和技术来源均受到限制。迫于制裁的压力，2018 年 2 月，埃克森美孚公司退出了在北极卡拉海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项目。此外，目前获得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勘探许可的大多是俄国有公司，而这些国有公司虽然具有陆上油气开发经验，但对北极地区岸上或近海勘探开采并无技术经验。受俄罗斯国有股份超过 50% 的公司才能颁发进入许可的限制，俄罗斯多数具有近海勘探开发技术经验的小型公司无法进行北极的油气勘探。其二，环境保护及北极地区移民问题。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是仅次于亚马逊流域的世界第二个“肺”，在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北极生态脆弱性方面非常重要。但目前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俄罗斯 27 个北极地区由于油气开采而造成环境破坏和人口死亡率增加，同时也对土著人的正常生活比如放养驯鹿等造成影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工业投入最多，人口也随着产业的兴衰而流动。现在近 1/3 的北极人口迁移到了其欧洲部分，预计除了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增长正在吸引新的居民以外，俄罗斯的极地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继续经历明显的人口下降，^① 进而影响其北极的整体发展。

四、中国开拓北极能源资源的尝试

北极的能源开发引起全球关注，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对北极能源资源开发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在北极能源开发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成为北极

^①Marlène Laruelle. Russia’s Arctic Policy: A Power Strategy and Its Limits.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russieneivisions/russias-arctic-policy-power-strategy-and-its-limits>, March, 2020.

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方”身份的承认。2018年1月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表明，中国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积极推动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主动参与北极油气、矿产、渔业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合作，探索北极新航道，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并在制定、解释、适用和制定北极国际规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与俄罗斯的 LNG 合作不断深化

积极参与俄罗斯北极地区 LNG 项目是中国能源进口多样化的必然选择，与北极亚马尔 LNG 项目的成功合作是中国深度参与俄罗斯北极能源开发的样板。在这一 270 亿美元的项目中，大股东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持股 50.1%，道达尔和中石油分别持股 20%，丝路基金持股 9.9%。按照合同，达产后销往中国市场的 LNG 为 400 万吨，占中国 LNG 进口量的 10%~15%。在诺瓦泰克公司主导的产量更大的 Arctic LNG 2 项目中，中石油和中海油分别持股 10%，未来 Arctic LNG3 等项目中国也会积极参与。

中俄亚马尔项目的深度合作，中国元素还体现在项目建设中，包括中国企业承揽 85% 的模块建造，提供极地低温钻机、建设工程船和普通运输船、运营 LNG 运输船等等，合同额超过 150 亿美元。中国企业为项目提供多种产品，促进了国内钢铁、电缆等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① 并为中国参与北极能源开发提供了技术和人才储备。

（二）广泛参与环北极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资源项目

除了与俄罗斯在北极能源项目的合作以外，中国还与许多环北极国家和地区签署能源资源开发协议，加强与环北极国家的合作。格陵兰岛（丹麦属地）拥有大量的油气、铁、锌、稀土元素甚至铀等资源，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希望通过能源及资源开发发展经济，增加公共收入、当地就业以及培训和教育机会，改变其出口商品 90% 依靠鱼类的局面。2014 年中国企业俊安集团全资收购了伦敦矿业公司的伊苏亚铁矿石项目（Isua Project），获得了在格林兰岛的勘探许可，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公司拥有的北极项目。^② 2016 年，中国企业盛和资源收购了格陵兰矿产公司 12.5% 的股份，获得了稀土矿 kvanefjeld 的开发权，未来盛和资源最高控股可达 60%。

美国阿拉斯加州石油天然气储藏量丰富，迫切希望通过出口能源振兴经济。2017 年 11 月，阿拉斯加州政府、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AGDC）同中国石化、中投公司、

^①陈甫：《怎么把中俄亚马尔天然气项目的产品运回中国》，腾讯新闻网，2018 年 1 月 29 日。

^②Marco Volpe. The tortuous path of China's win-win strategy in Greenland. <https://www.thearcinstitute.org/tortuous-path-china-win-win-strategy-greenland/>, March 24, 2020.

中国银行签署非约束性联合发展协议，当时中方计划投资 430 亿美元在阿拉斯加州开发 LNG，并购买 75% 的项目开采量，换取相等的股份，以及提供必要的融资，这是当年特朗普访华签署的大单之一。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爆发，两国在第二轮征税清单中均涉及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产品，中国与阿拉斯加的能源合作也受到影响。2019 年 7 月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总裁确认该项目不再进行。但鉴于双方在能源领域互补性好，企业间合作意愿强，项目的未来走向仍然值得关注。

（三）中国北极能源开发的 SWOT 分析

从这些年中国在北极能源领域的投资看，优势与劣势明显，机遇与挑战共存。通过 SWOT 分析可以看到，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和资本实力，以及能源企业在“走出去”中积累的经验和技術储备是中国开发北极能源的优势所在。环北极国家和地区寄希望于开发能源资源促进发展经济、增加国民福祉的初衷，与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迫切需要寻找海外能源市场的诉求高度契合，为中国参与北极能源开发提供了良好契机。“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深化，更是加快了中国开发北极能源的步伐。

表 3 中国北极能源开发的 SWOT 分析

优势： ——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 ——资金优势 ——海外投资积累经验和技術积累	劣势： ——北极开发的后来者，并购成本高 ——规范准则存在差异 ——文化差异大，沟通存在障碍 ——地缘政治不稳定，质疑中国投资
机会： ——北极国家（地区）发展经济，为巨大能源储备找投资方和市場 ——中国扩大能源资源供应 ——“冰上丝绸之路”的推动	挑战： ——项目成本高，赢利难度大 ——环保要求高，公众（土著）有反对 ——基础设施、劳工问题需解决

由于中国是北极开发的后来者，很多项目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先行布局，中国并购的项目未来是否赢利尚待观察。中国企业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对相关规则和政府政策理解不透彻，加上文化差异，都会使中国在北极投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近些年，部分欧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散布中国威胁论，^① 也对中国的投资造成一定影响。其实从中国在北极能源投资的情况看，项目的成功也是当地政府密切配合的结果。中俄亚马尔项目

①胡欣：《美国又在散布北极“中国威胁论”》，《世界知识》2019 年第 11 期。

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罗斯政府的补贴、免税和对建造港口设施的支持。^①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的投资不仅面临北极地区基础设施缺乏和高成本的挑战，还要面对北极圈对环境保护的严苛要求、绿色组织的抗议以及严格的劳工管理制度的约束。

尽管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作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中国未来进入北极最好的方式仍是基于尊重体制和法律框架下的合作，无论是科学项目还是能源开发，都追求双赢的结果。推动中国能源供给多样化，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也高度契合中国在北极通过合作寻求和平发展的理念。

五、对中国参与北极能源开发的再思考

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表明了中国对北极开发的基本立场，阐释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主张。中国在北冰洋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海域和特定区域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所规定的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资源勘探与开发等自由或权利。^② 中国捍卫在北极开发的权利的同时，面对北极开发的新变化，总结过去北极能源开发的经验教训，对未来北极能源开发需要重新思考和再认识，才能在北极能源开发中处于有利位置。

（一）如何应对北极角逐升温

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升温的趋势，实际上主要还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角逐，尤其是美国智库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能源开发合作十分关注并进行解读，呼吁美国增加在北极的投资。北极能源开发和北海航道通行是俄罗斯政府的绝对优先事项，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放松了对北极能源开发的管制，鼓励开发北极能源，但囿于资金、成本和民主党的反对等因素，开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加上美俄两国在北极的领土纠纷及北海航道的争议，二者的摩擦将多于合作。^③ 拜登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在全球禁止北极近海油气开发，北极油气开发又增加了变数。世界各国正通过联盟、国内立法和军事演习来获取北极资源。^④ 美国和俄罗斯是中国北极能源开发必须面对的主要国家，尽管中国不希望看到美俄双方在北极的对抗升级，但北极地区开发政治化已不可避

^①Maria Shagina. Is The Yamal LNG Project Overhyped? <https://oilprice.com/Energy/Energy-General/Is-The-Yamal-LNG-Project-Overhyped.html>, Feb 19, 2018.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国政府网，2018年1月26日。

^③郭培清、杨楠：《论中美俄在北极的复杂关系》，《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

^④汪彪等：《北极地区海洋环境军事利用及其战略思考》，《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年18期。

免，维持北极地区“低冲突”将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中美俄作为影响北极能源开发的三大主要因素，三方在北极都有其不同的诉求，也有各自的问题。从长远看，放弃争执，加强合作，和平开发北极能源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二）争取与更多国家合作共赢

一是加强与其他环北极国家的合作。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是北极开发中的第一阵营，那么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则是北极开发的第二阵营。这些国家为了提高在与北极大国竞争中的地位，更倾向于吸引域外大国参与北极开发。^① 2017 年习近平主席与 7 个环北极国家领导人会面，还到访阿拉斯加，显示出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关切。北极能源的开发同样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充分发挥环北极国家各自的优势，将北极能源开发的蛋糕做大做好，让大多数的环北极国家享受到北极能源开发红利，同时也可以规避或降低风险。

二是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合作。日本、韩国和印度对北极地区的能源都有需求，是亚洲市场的主要购买方，也是参与北极能源开发的重要力量。尽管在能源市场具有竞争关系，但中日韩三方已经启动了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推动三国在加强北极国际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探索商业合作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分享相关政策、实践和经验。中日韩可以联合起来，甚至加上亚洲能源市场的另一个主要买家印度，成立类似能源消费者联盟的组织，利用买方的市场力量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三）中国企业难得的学习机会

北极能源开发不仅是技术和资本问题，同样也是对组织能力的考验。中国作为北极能源开发的后来者，除了积极参与，更主要的是利用合作机会学习合作伙伴的长处，提高中国北极能源开发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许多跨国油气公司在北极开发 50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形成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他们使用最现代的钻机，具有先进的监测和自动钻井控制设备，配备了最新的安全和净化系统以及全天候的应急服务，重点从简化、标准化和工业化角度制定石油技术效率方案。此外，芬兰在破冰船、韩国在高附加值破冰型 LNG 船等相关设备技术领域也为中国参与北极能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提升样板。

实际上，中国在亚马尔 LNG 项目的建设运营过程中，逐步具备了在北极地区能源开发所需的勘探、工程设计及模块建造等技术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北极气田开发技术

^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向欧洲，往北走：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支点港口研究》，人大重阳网，2018 年 7 月 17 日。

人才。通过不断学习和自主创新，为中国深度参与北极开发提供技术支撑，才能实现中国北极油气开发“国货国运”的目标。

（四）积极参与北极的能源转型及社区建设

北极能源开发，要有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关注利益和环保问题，更要融入当地社区的发展，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油气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相结合，满足当地原住民的利益和需求，才能在北极能源开发中取得成功。北极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许多地方适合建设风电场和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中国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领域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太阳能光伏组件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投资和风电机组装备技术也位于世界前列，国际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中国在北极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拓宽风电机组和光伏组件出口渠道，还可以尝试通过适当的合作及融资方式帮助当地社区解决可再生能源前期建造费用过高问题，促进当地的能源转型和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凯、杨松霖：《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北极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2 期。
2. 郭培清、杨楠：《论中美俄在北极的复杂关系》，《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1 期。
3. 汪彪等：《北极地区海洋环境军事利用及其战略思考》，《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 年 18 期。
4. 肖洋：《中日韩俄在参与北极治理中的合作与竞争》，《和平与发展》2016 年第 3 期。
5. Daria Shapovalova, Kathrin Stephen, No race for the Arctic? Examination of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legal regimes for offshore petroleum licensing and level of industry activity, *Energy Policy*, 129 (2019).
6. Jesper Willaing Zeuthen, Malayna Raftopoulos, Promises of hope or threats of domination: Chinese in Greenland,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5 (2018).

责任编辑：李蕊

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研究^{*}

颜少君

摘要：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直接关系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形成的一大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产能合作等可视性成果，在助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同时，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示范，凝聚了更多共识。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得以持续推进。随着中巴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内容不断丰富，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展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随着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不断演变，经济走廊建设新旧问题并存，需谨慎应对，继续与巴基斯坦坚定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独特战略价值，更好布局、规划和谋划，化解可能的风险和挑

战，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颜少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点在中国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 3000 公里，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贯通南北丝路关键枢纽，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经贸走廊。中巴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的总体框架、建设重点和实施路径研究》(17VDL01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示范，凝聚了共识，积累了经验教训，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随着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特别是面对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走廊建设暴露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需高度关注和重视，以确保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进入充实、拓展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在中巴两国政府的大力倡导和主导下，通过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正步入充实、拓展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走廊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显著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习近平主席 2015 年访问巴基斯坦确立的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以及《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2017—2030 年）》，走廊建设已收获了一大批阶段性成果，巴基斯坦及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成果切实惠及了巴基斯坦民众。

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2015—2020 年）的 22 个优先项目基本完成。第二阶段（2021—2025 年）的走廊建设也已经实质性启动。瓜达尔港建设加快推进，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瓜达尔港“逆势”取得重大进展，开创了多个“首次”：首次正式开展阿富汗过境贸易，为当地创造了近千个就业机会；首次开展液化石油气业务，预计每月将有 1 万吨液化石油气通过瓜达尔港运往巴基斯坦国内；首次实现商业化运营。能源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的重点合作领域，22 个项目中有 11 个能源项目，极大缓解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巴基斯坦的能源瓶颈问题。例如，由中国电建与卡塔尔 Al Mirqab Capital 公司联合投资建设的卡西姆港燃煤电站，自 2018 年 4 月 25 日进入商业运营以来，发电量约占巴基斯坦国家电网供电量的 10%，截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全年完成发电量 80.1 亿千瓦时。基础设施方面，22 个项目中的 4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部竣工。例如，2019 年 11 月，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PKM）项目苏库尔至木尔坦段投入试运营，2020 年 12 月，正式移交通车。再如，2020 年 7 月，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工程赫韦利扬—塔科特项目全线通车。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框架下成立了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推动产业合作与园区合作，中巴经济走廊目前有 11 个经济特区正在建设中。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显著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志性项目，经济走廊在过去几年间大幅改善了巴基斯坦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增加了就业，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发展。中国已经连续 6 年成为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根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Pakistan）的数据显示，2020—2021 财年前 5 个月，^① 中国保持了巴基斯坦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巴基斯坦自中国进口额达 45.24 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同期增长 12.38%。

2020 年 12 月，在“中巴经济走廊：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上，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希布里·法拉兹（Shibli Faraz）表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发展符合巴基斯坦的最高利益，有利于促进就业，其发展成果将惠及巴基斯坦基层民众。根据预测，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道路基础设施项目将创造 5.1 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超过 94% 的岗位将提供给巴基斯坦本地人。所有中巴合资项目将创造 120 万个就业机会，其中 33% 以上将只对巴基斯坦人开放。2015—2030 年，中巴经济走廊将创造 230 万个就业岗位，为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每年 2.5% 以上的增长。^② 2021 年初，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阿西姆·巴杰瓦（Asim Bajwa）表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填补了巴基斯坦在能源、通信等方面的空白，将通过工业化和扩大农业领域合作，进一步推动巴基斯坦工农业发展，提振巴基斯坦经济，惠及更多民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2019 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为巴基斯坦创造 7.5 万多个直接就业机会，同时带动原材料加工和餐饮等相关上下游产业，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③ 在 2020 年 3 月举办的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的审查会上，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开展的项目对该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并将给就业、交流和经济繁荣提供巨大机遇。

（二）随着合作领域和内容不断拓展丰富，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展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充实、拓展新阶段，两国合作重点将转向深化产业合作，并逐步扩展农业、扶贫、教育、卫生、人力资源等社会民生领域合作，同时注重向巴基斯坦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2020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外发布，

^①前 5 个月指 2020 年 7—11 月。

^②张沁遥：《提供 230 万个就业岗位 中巴经济走廊重塑区域经济格局》，中国一带一路网，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56782.htm>。

^③李玉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已为巴方创造 7.5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新京报》2019 年 4 月 24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1690619976843117&wfr=spider&for=pc>。

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框架下的联合工作组增设农业和科技两个组，走廊建设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20年8月2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第二次中巴战略对话后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将继续为巴基斯坦的振兴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将及时完成在建项目，创造更多就业，大力改善民生，加强产业园区、人力资源培训、减贫脱贫、医疗卫生和农业等领域合作，持续释放走廊的巨大潜力，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农业、教育、医药等社会民生领域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合作的重点，2020年上半年，在巴基斯坦推广北京杂交小麦项目再获丰收，所播种子量是当地品种的10%，收获量是当地品种的120%。2019年12月，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瓜达尔医院和职业技术学校项目开工。截至2021年1月，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PKM项目苏库尔至木尔坦段为沿线村落修建学校11所，“一带一路”图书室2个，捐赠医疗器械33套、运动器械100余套。^①可以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绘制“工笔画”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开局良好。

二、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取得突出进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高质量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深刻变化，压力显著增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疑虑甚至抵制态度。尤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中美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在大国竞争中处于前沿和焦点位置。而且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地缘政治复杂，长期受多国力量博弈与掣肘影响。

1. 中美博弈加剧大背景下，中巴经济走廊遭遇美政治、经济和舆论炒作上的多重冲击。国际政治经济实力格局加速演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用更加凸显。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误解等负面认知持续加深，将“一带一路”看成是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首当其冲，遭遇了美国政治、战略、经济以及舆论炒作等多重冲击。

^①中国新闻网：《留下的是“故事”，得到的是“民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纪实》，2021年2月3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2-03/9403368.shtml>。

在政治和战略上，印太战略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国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抓手。美国推出并不断强化“印太战略”，推行以“抑巴扬印”为主基调的南亚新政策，企图制衡中国。中巴经济走廊处于大国博弈的前沿和焦点。强化与印度的关系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美印双方经贸关系逐年增强，政治基础日益牢固，安全合作稳步发展。受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击影响，中美关系恶化，中印关系动荡波折，美印关系上升，对中国进行战略对冲成为美印两国共同利益。后疫情时期，拜登政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竞争博弈的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更大可能会继续通过强化“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出台多种措施，阻挠、干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为了联合日、印、澳盟友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2021 年 3 月，美国主导“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严峻外部挑战。

在经济上，美国整合各种资源，提升对印太地区投资力度，将继续拉拢亚太盟友国家抗衡“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为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美国支持并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力度。2018 年 10 月 5 日，特朗普签署《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BUILD)，在整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IC)，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开发信贷局、企业基金、私人资本与微型企业办公室等部分职能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IDFC)，有望使美国的年发展融资能力从 290 亿美元提升至 600 亿美元。2019 年 11 月的东盟峰会期间，在美国推动召开的平行会议“印太商业论坛”上，美国 OPIC 宣布启动“蓝点网络”计划，搅局、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牵头，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和越南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提出了“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去中国化”势头明显。

在舆论上，抹黑污名化中巴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智库和媒体持漠视或无视态度，甚至故意误解和误读，也有部分是美国政府主导之下的集体抹黑攻击。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经济侵略”“新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控制”“债务陷阱”“地缘扩张论”“环境破坏”等言论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身影。对中巴经济走廊，美国积极宣传“债务陷阱”“不透明”“掠夺性贷款”，污名化走廊建设。例如，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前首席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 (Alice Wells) 多次发表不实言论，称巴基斯坦将因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面临长期经济伤害，从中获得的回报微不足道，中巴经济走廊也并非援助。她还称，建设走廊只对中国有利，而美国能够提供更好的模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外部舆论环境压力不容忽视。

2. 调整变动中的中印巴关系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增添了变数。首先，中印巴关系一直处于调整变动的非稳态。受中美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印度现实主义权力思维和全球大

国抱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影响，中印巴关系、中印关系与中巴经济走廊提出建设之初已有很大不同。在中印巴关系中，中巴政治关系基础厚实，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关系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印巴关系信任基础薄弱，两国长期敌对，关系复杂紧张。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偶有冲突，在一些领域和问题上的战略分歧较大。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一环，地缘政治关系上的高度敏感性增加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推进中的脆弱性。

其次，印度高度警惕、反对，甚至阻挠、破坏中巴走廊建设。由于一直以来印巴关系复杂，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十分警惕，担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增强巴基斯坦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极大提升其与印度对抗的实力与底气。同时，印度担心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会提升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对其一直寻求的南亚霸主地位带来不利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印关系时有波折。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大国博弈的双重刺激，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掀起抵制中国制造的浪潮，大量中国应用程序被印度封禁。随着美印关系加强，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影响上升，美印联合遏华，美国暗中助力或支持印度抗衡中国可能成为新常态，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必然会受到影响。

（二）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十分复杂，走廊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不降反增

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国内也存在塔利班、俾路支解放阵线和虔诚军等地方武装恐怖组织，这些地方武装与逃窜至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相互交织影响，致使巴基斯坦国内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难以根本扭转。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巴基斯坦仍属于全球恐怖主义极高风险国家，在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10个国家排名中，居第七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主要分布的旁遮普省、信德省、开普省和俾路支省等地恐怖活动频繁，尤其俾路支省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中巴经济走廊许多施工地区成为恐怖袭击发生频率较高的区域，恐怖活动不降反增，连续多年居巴基斯坦国内恐怖活动之首。根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PIPS）2019年6月发布的《巴基斯坦2018年平安申报》显示，2018年，俾路支省恐怖袭击活动频发，针对中巴经济走廊恐怖袭击活动就接近40次，且目标直指中巴走廊建设及负责警卫的巴基斯坦安保人员。2019年5月11日，恐怖分子持枪和手榴弹对瓜达尔港珍珠洲际酒店发动攻击，造成3名安保人员死亡，也是一起针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破坏行动。虽然成立了一支中巴经济走廊安保部队，但中巴经济走廊重点建设的瓜达尔港位于分离主义严重的俾路支省，暗中受到美印等域外势力支持，成

为其钳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工具，安全风险仍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

（三）受各种因素制约，走廊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经济风险不容小觑

第一，巴基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环境不容乐观。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产业基础发展非常滞后，不能有效为走廊建设项目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经济环境和营商环境不容乐观。巴基斯坦内部政治斗争严重，走廊建设中利益争夺十分激烈，央地矛盾、地区矛盾掣肘走廊建设项目推进。同时，巴基斯坦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办事效率低下，营商环境欠佳。政治体制、利益集团博弈和管理体制弊端致使很多项目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地。政治体制上，巴基斯坦是联邦和省相对独立，联邦政府提出的优惠政策，可能因地方政府不同意而搁置，特别是园区包括税收、财政、海关和能源等在内的优惠政策，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通过议会审批，纳入法律层面才可能落地，冗长的过程直接影响产业合作项目的推进速度和效率。

第二，巴基斯坦政府负债高，资金偿还能力弱，可能出现投资风险。巴基斯坦财政赤字严重，外债负担沉重，难以持续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正义运动党的执政期内^①里，巴基斯坦的债务将上升至 1300 亿美元，较穆盟（谢）政府执政时期同比增长 36.3%。IMF 预测，在此期间，正义运动党政府将借债 830 亿美元，用于偿还旧债，支撑经常账户赤字和国家外汇储备。面对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持续恶化的财政赤字状况，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强大的资金缺口需求背后隐藏着较大的投资回报不确定性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走廊建成项目难以得到有效收益回报。能源是走廊建设进展最快、成效最明显的领域，目前的情况是电站建好后能够发电了，但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电输送不出去，而我国投资企业正面临着电费收取困难的问题。

第三，巴基斯坦对我国期待过高，对走廊建设存在急于求成和依赖我国的心态。巴基斯坦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擅长并强调中巴全天候战略关系，经常用“比山高”“比蜜甜”等文学语言来表述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将中巴经济走廊视为解决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问题的“万能药”。例如，对于当前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园区合作进展相对较慢的客观情况，错误地认为园区建设同前期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样，我国政府应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认为当前园区进展缓慢是我国投入不够，不懂得园区发展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关键是要有产业项目落地和吸引投资。这种急于求成，“等”“靠”“要”思想，对本国基

^①即 2019—2022 年。

本国情、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认识不够，对走廊建设特别是后续园区合作的推进造成困难。

（四）新冠肺炎疫情对走廊建设短期影响可控，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的背景下，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总体看，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进顺利，影响可控，但后疫情时期的长期影响值得关注和重视。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遭受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普遍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境外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巴基斯坦经济也遭受重创，据世界银行预计，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巴基斯坦 2020 财年经济将萎缩 1.3%~2.2%。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国内经济，还有国外封锁的多重叠加共振，导致巴公共债务占比再次攀升到 2020 年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的 90%，巴基斯坦的财政压力空前沉重。因此，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难免受到一系列疫情和疫情相关事项的冲击，包括劳动力短缺，相关设备物资供应延迟，不可抗力导致的延期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等。不过，中巴双方特别是相关项目企业抗疫举措成效显著，项目保持零感染记录，各项目进展顺利，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是可控的。^① 巴基斯坦 2020—2021 财年的预算也为走廊建设铁路干线重点项目提供了配套资金。

在中巴经济走廊持续推进的后疫情时代，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将继续深入，也将在公共卫生、教育、水利和扶贫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推动走廊建设高质量发展。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全球经济增长不明，经济全球化风险挑战增加，供应链断裂风险和重构的影响等还会持续给走廊建设带来诸多挑战，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三、推动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应看到走廊建设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压力和挑战。为继续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走廊建设，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充分肯定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进展对中国和

^①参见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李碧建 2020 年 4 月 11 日在巴基斯坦《商业纪实报》上发表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署名文章。

巴基斯坦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价值。对中国而言，能否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好，直接关系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局。目前取得的一大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等可视性成果，在帮助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示范，也凝聚了更多共识。当然，期待过高等导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为下一步推进提供了经验教训。应充分认识并高度肯定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对“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推进的重大意义，决不能因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以及国际舆论的污名化而减缓或大幅收缩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而是应该更好规划和谋划，明确下一步建设重点，着力破解推进中的问题和矛盾，化解可能的风险，推动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开放共赢理念，运筹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为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趋势不可逆转，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朝于我国有利方向转变。截至 2021 年 1 月底，我国已与 140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政府间合作协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了广泛共识。应继续坚持开放共赢理念，运筹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斗而不破”可能格局下，加强国际友城合作，继续调动美国地方政府和工商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性，尽量化解消极因素；妥善处理中印关系，经济上拉住印度；处理好中印巴大三方关系，以不站队、不拉帮、不结派的域外协调者和调解者身份处理印巴关系，强化三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与争端解决。同时，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参与，积极推动与周边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印度和伊朗等国开展能源领域合作，开创互利共赢格局，为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三）坚持政府引领、市场运作原则，防范与应对风险，推动走廊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巴具有高度政治互信的独特优势，但巴基斯坦国内长期党派博弈，政局不稳，国内极少数地方党派和分离势力批评走廊的声音也从未间断。因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势，发挥联委会在走廊规划、设计和具体项目落实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与之进行更多沟通和对表，尽量避免因巴基斯坦期待过高，我国无法满足造成误解，影响走廊建设推进。应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走廊建设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应充分发挥企业在走廊建设市场化经营领域中的主体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国际通行规则和商业原则健全项目管理及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立项前的市场研究和风险评估，项目推进中的全方位动态跟踪、监测与预警，加强财务风险、安全风险和突发风险的预警管控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应健全完善项目合法合规经营制度，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鼓励企业注重保护环境、履行减

贫等社会责任，积极回应当地社会诉求，实现走廊项目建设中的各方共赢。

（四）创新和完善安保体系，为走廊建设保驾护航

恐怖主义仍然是中资项目建设的重要安全隐患，应在敦促巴基斯坦继续落实现行安保措施的同时，创新和完善安保体系。应进一步深化中巴双方反恐协调合作，探索在两国政府共同规划前提下，引入我国民间商业安保力量的新模式，发挥民间安保力量在我国建设项目和工业园区内部的安保预案设计、巡查保卫、人员安全培训等日常安保事务的积极作用，逐步建立中资项目安保公司、巴基斯坦军警内外两层安保新模式。应深化《中阿巴三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情报交流，加强反恐领域的合作。应建立走廊建设项目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定期发布走廊地区的安全事件、安全预警和安全形势分析，根据不同的项目性质和需要，制定和细化安保方案，并积极利用领事保护条约和外交渠道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利。

（五）加强智库与外宣的科学引领，推动走廊建设行稳致远

舆情能力博弈是事关走廊建设成败的另一个主战场，应予以高度重视。应发挥我国智库优势，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共同举办研讨会等多样化形式，及时动态发布走廊建设进展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正面回应国际舆论的误解和不实指责；面对国际社会提出的走廊债务可持续发展的质疑，系统梳理走廊建设中有关债务问题，开展深入细致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应持续、深入、动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巴基斯坦法律制度、政策、民族、宗教、文化特点以及地缘政治潜在风险等进行深入研究，深入分析走廊建设对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以及重大项目规划落实对资源环境、市场供需和对外经贸关系平衡的影响，适时形成具有战略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研究及咨政建议，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时，应鼓励我国国内主流媒体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巴基斯坦有影响力的媒体合作等方式，正面宣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成就；鼓励个人和社会组织不断创作更多体现中巴合作的宗教、历史风俗、文化特点的个性化人文交流产品，并充分利用微信海外版（Wechat）、抖音短视频海外版（TikTok）等自媒体网络平台等，以更加灵活、社会化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多、更好、更快传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行稳致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加稳固的中巴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巴基斯坦] 法斯赫·乌丁、阿克拉姆·斯瓦蒂：《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历程——需要新的范

式》，陈继东、晏世经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0 年出版。

2. 吕佳：《全球新冠疫情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新阶段的研究》，《当代经济》2020 年第 9 期。

3. 范毓婷、刘卫东、王世达：《“中巴经济走廊”背景下中巴跨境合作需求及风险研究》，《工业经济论坛》2016 年第 6 期。

4. 金戈：《中巴经济走廊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5. 美通社：《2020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prnasia.com/lightnews/lightnews-1-102-31074.shtml>。

6.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的国际干预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9 年第 1 期。

7. 李芳芳、王璐璐、高素梅、周子学：《“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指数报告》，《产业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

8. 王云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探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9. 曹忠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19 年第 30 期。

10. 刘长敏、焦健：《“印太”视域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内涵与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11. 刘勇、姜彦杨：《“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巴经济走廊的地缘风险及其应对》，《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2 期。

12. 舒洪水、刘左鑫惠、裴新迪：《“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 AHP-SWOT 分析》，《情报杂志》2020 年第 3 期。

13. 陈小萍：《巴基斯坦极端势力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战略》，《南亚研究季刊》2019 年第 4 期。

14. 林民旺：《中巴经济走廊将倒逼印度与中国合作》，《中国外资》2015 年第 6 期。

15. Tucker Boyce, *The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Trade Security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Sandia Report, January 2017, <http://prod.sandia.gov/techlib/access-control.cgi/2017/170207.pdf>.

责任编辑：郭 霞

正确认识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

范恒山

近些年，在整体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增大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东西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势头有所回转时，南北区域发展的差距逐渐加大。西南地区以及中部的南方省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普遍高于西北、中部北方省区以及东北地区，华北有些省份的经济增速下降较快，区域经济总体呈现增长速度“南快北慢”和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人发出惊呼之声，放言“南方全面碾压北方”；更有人断言，中国经济“南强北弱”“南盛北衰”，区域发展进入了“大南方时代”。

应当承认，这些年我国区域经济的确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状态。就南北方而言，增长速度放缓的北方省份比重较大，与南方省份多数表现较好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从整体上看，也存在资源要素向南方省份流动更多，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问题。2018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8.5%，比2012年下降4.3个百分点，近两年又有进一步下降。但笔者认为，对这种状态作出恰当分析，特别是准确提出关于南北发展的一些趋势性判断与结论，既要有深入的研究，更要有正确的思路，特别是要有历史的眼光、全面的视觉、辩证的思维和科学的方法。笔者就此谈一些粗浅的观点和看法。

一、转型转换是北方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对于北方经济发展近一时期明显放缓的原因，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似乎大部分诟病都指向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认为相对于南方，北方省份总体上市场意识不强，创新动能不足，营商环境不够优良，无形的发展制约较多。笔者不否认北方省份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何况改革、创新和营商环境建设等都永远走在路上。关键

在于，这类问题并非是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并且在这方面也不会短时期内突然与南方拉开很大差距，从而高强度地影响到现实经济发展；同时，北方之大，也并非所有地方在这些方面都是同一个状态。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个与“转”有关，涉及到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动能转换和城市动能转型等。相对于南方，北方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资源型城市较多，新动能发育不够充分，“转”迫在眉睫，也成为了主题。可以看到，这个“转”不仅涉及到整个北方，而且一些支撑北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首当其冲。北方第一大经济体山东省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两个 70% 的特点：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约 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约 70%。近几年，山东下决心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培育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力争“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天津以津城、滨城功能合理分工为基础，以企业改革重组和债务清理化解为重要抓手，着力推动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北京积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推动城市由追求“经济中心”向体现建立“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定位转变。河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6643”工程，大幅度削减煤炭、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传统产能。山西作为中部的北方地区，是典型的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主要靠煤炭、焦炭、冶金和电力等产业做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在国家支持下，近十年来山西加大了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力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处于关键节点上。至于东北地区，为实现经济振兴，自 2013 年以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动能转换以及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等的力度明显加大。各种形态的“转”落实到位、形成新格局都有一个过程，处于这个过程之中，眼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分析一下相关统计数据，其中的联系就能看得十分清晰。

另一个与“限”有关，即推行绿色发展带来的限制。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转型，可称之为绿色转型。进入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发展成为开展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底线。相对于南方，北方的特殊性表现在：其一，生态屏障功能在国家全局中更加显著，同时生态环境的自然基础更加脆弱，因而保护的任务更加繁重，这不仅限制了许多经济活动的开展，而且还需要付出更大投入；其二，京津冀等北方核心地区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状况比较严重，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放到了优先位置，由此推动了京津冀地区及周边区域一大批企业的关、停、并、转；其三，因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等的限制，北方地区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环境保护有机结合的难度更大，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空间相对较窄。

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是，随着绿色发展价值理念的确立，生活由温饱向全面小康的转变，人们的追求也从单纯看重富裕发展到富裕与幸福并重。这导致了资源要素流动越来越青睐区域的综合品质，即投资者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往往会将营商环境、发展机会以及自然生态等作一体化考量，而不仅仅只是考虑投资回报。追求利益与追求舒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方省份资源要素的集聚与稳定。这些年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等地资源要素流入南方省份较多，不能不说与之有直接关联。

二、北方经济增长放缓不等于“南强北弱”“南盛北衰”

综上所述，转型转换是近些年来北方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对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及其特质的认识，要置于时代背景下，且不仅要看现象，还要看内容；不仅要当前，还要看长远；不仅要现状，还要看后劲。同时，不仅要有经济视角，还要有其他视角。总之，要全面观察，系统分析，辩证把握。基于此，可以得出三个观点。

第一，南北经济发展实际差距没有经济增速或总量状况表现得那么大，目前尚不存在“南方全面碾压北方”的问题。看待差距，不能只看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仅以经济总量论英雄。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追求增长速度的实际冲动被追求发展质量的核心原则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北方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了，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实现了三个“优化”：一是发展基础得到优化。许多省份大幅压缩了经济水分，为厘清问题与正确决策奠定了基础；一些省份花大力气化解巨额债务等风险，消除了复杂关系和不良平台形成的经济隐患；一些省份收缩了运作战线，突出了工作主线和发展重点等等。二是产业、动能结构得到优化。通过调整，提高了产业的市场适配性，特色产品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新型经济动能得以快速增进。三是生态环境得到优化。以京津冀地区为代表，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东北等地区森林碳汇能力进一步增加。对北方而言，这三个“优化”或具有独特性，或力度强度明显超过南方。综合考量和科学核算，北方整体经济发展并不像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显示出的与南方存在那样大的差别。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北方也体现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出现了不少亮点地区和新增长极。

第二，北方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整体上低于南方，但并不等于资源要素的配置都存在问题。在中国这样幅员宽广的大国，各地区在水土环境、气候特点、地质状况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基于不同的区域发展条件配置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格

局，不仅是政府自觉的政策导向，也是市场的自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看待一个地区或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速度，更要看比较优势的发挥。由于各类产业的附加值与产品的市场价格表现差别较大，因而，以地区比较优势是否得到发挥作为判断地区或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更具客观性和实质意义。基于此，可以看到，尽管出现了北方资源要素向南方流动的状况，但一些体现北方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不仅没有相应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黑龙江、吉林等粮食生产达到新高，农业发展地位进一步增强，而这对于国家整体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基础支撑的粗钢等产品的生产，北方占比也有进一步提高。

第三，北方经济在转型中积蓄着发展能量，眼前的差距并不意味着长期衰退。一个地区或区域的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通过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最直接、最直观的经济指标表现出来。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影响程度不一样，从而形成了区域增长的波动状态，所以区域经济增长出现波动起伏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应当强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并非都由负面因素引起，因此一个区域在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也并不代表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走衰。不可否定，导致北方一些省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中包含有负面的内容，但无论是产业转型、动能转换，还是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更全面地说，是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换言之，北方经济正在通过转型积蓄起强劲的发展动能，眼前的缓慢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实现未来经济长期向好所承负的代价，或者说体现出的是一种“转变中的阵痛”。这意味着，在当前驱动北方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体现正能量的方面仍然占主体地位。因此，无论是基于眼前与未来的联系看，还是超出增长速度局限全面地看，都不能把北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经济总量与南方拉大简单看作是“南强北弱”“南盛北衰”。

三、强化举措，推动北方经济加快发展

近一时期北方经济增长放缓事出有因，且近期下行并不意味着长期下滑，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的下滑毕竟是现实存在的，而未来的良好发展前景还是一种逻辑结论和良好预期。这个时期不是自然到来的，不能坐等这个时期的到来。我们还要认识到，北方经济最终是否能摆脱困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型转换的成功，而实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因此，北方各省份应当增

强忧患意识，深入谋划、扎实工作，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特别是推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当前经济增长下行，保障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向好的目标。

推动北方经济加快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操作思路。基本方向是在转型中实现跨越。笔者认为关键是把握住两点：一是科学推动转型转换。应坚持先立后破，防止新旧动能转换出现物理性质的中断；不盲目或一味地追求发展高端产业，应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发展新兴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开发生态产品的价值，大力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空间与路径。二是做强做大比较优势。不跟风随流，不搞同质竞争，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的，从实际出发培育、发展产业与产品，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以特色占领市场高地，同时，也依此形成资源要素的强大集聚能力。

推动北方经济加快发展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举措。要强化上下协同、内外联动，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提高资源要素的集聚水平和生产经营者创新创造能力为指向，全面优化发展环境。要抓住世界科技加速创新和改革全面深化的机遇，坚持对标国际一流管理方式，创新体制机制，以优化软环境；努力打造高水平的新老基础设施，以提升硬环境。二是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适应性及竞争力为指向，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不仅要注重产业发展的适宜性，还应重视推动产业的多领域融合与新型元素的及时赋能。三是以强化引领作用和形成实际效能为指向，部署和实施好国家战略。加强对北方重点地区的国家战略支持，通过赋予更大的先行先试权利和安排更多的重大项目工程，促进资源要素加快向北方重点地区流动，推动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极。

（作者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郭 霞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 年 4 月)				
世 界	2.8	-3.3	6.0	4.4
发达国家	1.6	-4.7	5.1	3.6
美 国	2.2	-3.5	6.4	3.5
欧元区	1.3	-6.6	4.4	3.8
日 本	0.7	-4.8	3.3	2.5
发展中国家	3.6	-2.2	6.7	5.0
印 度	4.2	-8.0	12.5	6.9
俄罗斯	1.3	-3.1	3.8	3.8
巴 西	1.1	-4.1	3.7	2.6
世界银行(WB,2021 年 1 月)				
世 界	2.3	-4.3	4.0	3.8
发达国家	1.6	-5.4	3.3	3.5
发展中国家	3.6	-2.6	5.0	4.2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1 年 4 月)				
世 界	2.5	-3.6	5.6	4.2
美 国	2.2	-3.5	6.2	4.1
欧元区	1.3	-6.8	4.2	4.3
日 本	0.7	-4.9	2.8	2.4
印 度	4.2	-7.5	11.8	5.9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世 界	1.0	-8.5	8.4	6.5
进口				
发达国家	1.7	-9.1	9.1	6.4
发展中国家	-0.6	-8.6	9.0	7.4
出口				
发达国家	1.3	-9.5	7.9	6.4
发展中国家	0.9	-5.7	7.6	6.0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 年 4 月)				
世 界				
发达国家	1.4	0.7	1.6	1.7
发展中国家	5.1	5.1	4.9	4.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1 年 4 月)				
世 界	2.7	2.1	2.6	2.7
美 国	1.8	1.3	2.6	2.3
欧元区	1.2	0.3	1.6	1.3
日 本	0.5	0.0	0.0	0.5
印 度	4.8	6.2	5.0	5.0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0 年		1.6	0.5	2.8
	3 月	1.9	0.8	2.9
	4 月	1.7	0.1	2.5
	5 月	1.3	0.0	2.3
	6 月	1.6	0.3	2.5
	7 月	1.4	0.4	2.7
	8 月	1.4	0.2	2.5
	9 月	1.5	0.1	2.5
	10 月	1.6	0.1	2.5
	11 月	1.5	0.2	2.6
	12 月	1.3	0.1	2.6
2021 年	1 月	1.5	0.5	2.8
	2 月	1.3	0.6	2.8
	3 月	1.8	1.3	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0 年		- 3.9	- 7.2	- 0.9			
	3 月	- 5.2	- 7.0	- 2.8	47.3	45.0	43.3
	4 月	- 14.5	- 19.4	- 9.4	39.6	32.5	31.5
	5 月	- 12.1	- 18.1	- 6.1	42.4	39.1	36.4
	6 月	- 6.4	- 11.6	- 0.7	47.9	47.3	46.8
	7 月	- 3.5	- 7.8	1.0	50.6	52.0	51.2
	8 月	- 2.3	- 6.2	1.9	51.8	53.6	52.8
	9 月	- 1.2	- 5.8	3.7	52.4	53.7	53.8
	10 月	0.6	- 3.8	4.7	53.0	54.3	54.9
	11 月	1.2	- 2.8	5.0	53.8	55.3	55.1
	12 月	2.3	- 1.8	6.2	53.8	54.9	54.4
2021 年							
	1 月	9.1	- 1.2	20.4	53.6	54.1	54.2
	2 月	8.4	- 2.4	19.5	53.9	54.3	54.0
	3 月				55.0	55.1	55.8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9 年		2.2	2.4	2.3
	1 季度	2.9	1.8	2.5
	2 季度	1.5	3.7	5.0
	3 季度	2.6	2.7	2.1
2020 年	4 季度	2.4	1.6	2.4
		-3.5	-3.9	1.1
	1 季度	-5.0	-6.9	1.3
	2 季度	-31.4	-33.2	2.5
2021 年	3 季度	33.4	41.0	-4.8
	4 季度	4.3	2.3	-0.8
	1 季度	6.4	10.7	6.3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9 年		1.9	-0.1	1.1
	1 季度	2.9	1.8	-2.1
	2 季度	-0.4	-4.5	1.7
	3 季度	2.4	0.8	0.5
2020 年	4 季度	1.0	3.4	-7.5
		-1.8	-12.9	-9.3
	1 季度	-1.4	-9.5	-15.0
	2 季度	-29.2	-64.4	-54.1
2021 年	3 季度	31.3	59.6	93.1
	4 季度	18.6	22.3	29.8
	1 季度	10.1	-1.1	5.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9 年		2.2	2.4	2.3
	1 季度	2.3	2.3	1.7
	2 季度	2.0	2.4	2.3
	3 季度	2.1	2.5	2.2
2020 年	4 季度	2.3	2.5	3.0
		-3.5	-3.9	1.1
	1 季度	0.3	0.2	2.7
	2 季度	-9.0	-10.2	2.1
2021 年	3 季度	-2.8	-2.8	0.3
	4 季度	-2.4	-2.7	-0.5
	1 季度	0.4	1.6	0.7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9 年		1.9	- 0.1	1.1
	1 季度	2.7	0.3	2.4
	2 季度	1.5	- 1.3	2.9
	3 季度	1.9	0.2	1.0
	4 季度	1.5	0.4	- 1.9
2020 年		- 1.8	- 12.9	- 9.3
	1 季度	0.4	- 2.6	- 5.3
	2 季度	- 7.8	- 23.9	- 22.4
	3 季度	- 1.9	- 14.6	- 8.6
	4 季度	2.1	- 10.9	- 0.6
2021 年				
	1 季度	5.0	- 8.9	5.0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20 年		2.6		8.1	- 933.7
	3 月	- 0.8	0.8	4.4	- 168.3
	4 月			14.8	- 2067.9
	5 月			13.3	283.3
	6 月	11.1	3.0	11.1	484.6
	7 月			10.2	172.6
	8 月			8.4	158.3
	9 月	4.2	3.9	7.8	71.6
	10 月			6.9	68.0
	11 月			6.7	26.4
	12 月	- 4.2	2.4	6.7	- 30.6
2021 年					
	1 月			6.3	23.3
	2 月			6.2	46.8
	3 月			6.0	91.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0 年	21264		- 13.0	27716		- 9.3	- 6452
	2 月	2081	0.2	2461	- 2.4	- 4.7	- 380
	3 月	1851	- 11.0	2324	- 5.6	- 11.3	- 472
	4 月	1488	- 19.6	2014	- 13.3	- 22.1	- 526
	5 月	1437	- 3.4	2000	- 0.7	- 24.3	- 563
	6 月	1575	9.6	2092	4.6	- 19.8	- 518
	7 月	1699	7.9	2320	10.9	- 11.3	- 621
	8 月	1734	2.1	2395	3.2	- 8.4	- 661
	9 月	1776	2.4	2409	0.6	- 6.3	- 632
	10 月	1816	2.2	2456	2.0	- 3.1	- 640
	11 月	1838	1.2	2529	3.0	0.5	- 690
	12 月	1901	3.4	2571	1.7	0.0	- 670
2021 年							
	1 月	1922	1.1	2601	1.2	3.2	- 678
	2 月	1873	- 2.6	2583	- 0.7	5.0	- 71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234	- 1944	4178
	4 季度	730	- 707	1437
2019 年		2614	936	1678
	1 季度	768	- 333	1101
	2 季度	680	889	- 209
	3 季度	486	- 28	514
	4 季度	681	408	273
2020 年		1563	928	635
	1 季度	388	- 78	467
	2 季度	205	675	- 469
	3 季度	363	521	- 158
	4 季度	607	- 189	79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9 年		1.3	1.3	1.8
	1 季度	0.5	0.6	0.6
	2 季度	0.2	0.2	0.4
	3 季度	0.2	0.3	0.7
	4 季度	0.1	0.1	0.3
2020 年		-6.6	-8.0	1.2
	1 季度	-3.8	-4.5	-0.3
	2 季度	-11.6	-12.6	-2.2
	3 季度	12.5	14.1	4.6
	4 季度	-0.7	-3.0	0.4
2021 年				
	1 季度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4 季度	4.9	0.9	2.7
2019 年		5.7	2.5	3.9
	1 季度	-2.2	1.1	-0.9
	2 季度	6.8	0.1	3.4
	3 季度	-5.5	0.7	-2.2
	4 季度	6.2	-0.2	2.2
2020 年		-8.3	-9.4	-9.2
	1 季度	-5.9	-3.7	-2.9
	2 季度	-16.1	-18.8	-18.2
	3 季度	13.9	16.7	11.8
	4 季度	1.6	3.5	4.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20 年		-5.0		7.8	1261.9
	2 月			7.3	1206.4
	3 月	-3.5	-3.4	7.1	1153.7
	4 月			7.3	1178.9
	5 月			7.5	1200.4
	6 月	-8.9	-12.2	8.0	1285.8
	7 月			8.5	1383.0
	8 月			8.7	1427.1
	9 月	11.4	-2.2	8.7	1425.1
	10 月			8.5	1384.1
	11 月			8.3	1347.1
	12 月	-1.0	-2.5	8.2	1341.1
2021 年					
	1 月			8.3	1352.3
	2 月			8.3	1357.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9 年		1.3	1.3	1.8
	1 季度	1.6	1.3	1.6
	2 季度	1.3	1.3	1.4
	3 季度	1.4	1.5	2.1
	4 季度	1.0	1.2	2.0
2020 年		-6.6	-8.0	1.2
	1 季度	-3.3	-3.9	1.1
	2 季度	-14.6	-16.1	-1.5
	3 季度	-4.2	-4.6	2.4
	4 季度	-4.9	-7.6	2.5
2021 年				
	1 季度	-1.8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4 季度	7.4	2.0	5.0
2019 年		5.7	2.5	3.9
	1 季度	4.4	3.2	4.0
	2 季度	10.0	2.4	6.2
	3 季度	3.5	2.9	2.9
	4 季度	4.7	1.8	2.5
2020 年		-8.3	-9.4	-9.2
	1 季度	0.8	-3.1	0.3
	2 季度	-20.8	-21.4	-20.6
	3 季度	-4.6	-9.0	-9.2
	4 季度	-8.7	-5.6	-7.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月份						
2020 年	21315		-9.2	18971		-10.8	2343
	2 月	1986	1.0	1726	-3.4	-1.8	259
	3 月	1829	-7.9	1561	-9.6	-10.3	268
	4 月	1359	-25.7	1353	-13.4	-25.5	6
	5 月	1480	9.0	1394	3.0	-26.7	87
	6 月	1638	10.6	1478	6.1	-12.2	159
	7 月	1730	5.6	1543	4.4	-14.3	186
	8 月	1760	1.8	1552	0.6	-13.4	208
	9 月	1824	3.7	1596	2.8	-6.8	228
	10 月	1859	1.9	1606	0.7	-11.7	253
	11 月	1892	1.8	1649	2.7	-4.1	243
	12 月	1914	1.2	1644	-0.3	-1.2	271
2021 年							
	1 月	1909	-0.3	1622	-1.3	-14.2	287
	2 月	1861	-2.5	1677	3.4	-2.7	184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19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0 年		1663	461	1202
	2 月	-26	30	-56
	3 月	-571	-582	10
	4 月	300	-98	399
	5 月	1667	1284	383
	6 月	-183	-497	313
	7 月	127	582	-454
	8 月	16	113	-97
	9 月	-150	-457	306
	10 月	-654	-71	-583
	11 月	1220	69	1151
	12 月	-528	-1190	662
2021 年	1 月	375	511	-136
	2 月	63	178	-115

注:(1)指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8 年		0.6	0.3	1.0
	4 季度	0.5	0.1	0.8
2019 年		0.3	-0.3	1.9
	1 季度	0.6	-0.1	0.4
	2 季度	0.1	0.4	0.6
	3 季度	0.2	0.5	0.8
2020 年	4 季度	-1.8	-3.1	0.4
		-4.8	-5.9	2.7
	1 季度	-0.6	-0.6	-0.3
	2 季度	-8.3	-8.4	0.2
	3 季度	5.3	5.1	2.9
	4 季度	2.8	2.2	1.8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2	3.8	3.8
	4 季度	2.5	1.8	4.2
2019 年		0.9	-1.4	-0.4
	1 季度	0.4	-1.6	-3.9
	2 季度	0.3	-0.1	1.7
	3 季度	0.9	-0.5	0.9
2020 年	4 季度	-3.1	0.2	-3.2
		-4.1	-12.3	-6.8
	1 季度	0.4	-5.3	-3.1
	2 季度	-3.2	-17.2	1.3
	3 季度	-2.2	7.4	-8.2
	4 季度	3.0	11.1	4.0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8 年		0.6	0.3	1.0
	4 季度	-0.2	0.1	1.5
2019 年		0.3	-0.3	1.9
	1 季度	0.3	-0.1	0.9
	2 季度	0.6	0.4	1.9
	3 季度	1.3	0.9	2.6
2020 年	4 季度	-1.1	-2.4	2.2
		-4.8	-5.9	2.7
	1 季度	-2.0	-2.7	1.4
	2 季度	-10.3	-11.1	1.4
	3 季度	-5.8	-7.3	3.3
	4 季度	-1.4	-2.4	4.8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2	3.8	3.8
	4 季度	0.2	1.8	5.1
2019 年		0.9	-1.4	-0.4
	1 季度	0.5	-1.3	-0.4
	2 季度	0.5	-2.0	0.7
	3 季度	4.4	-0.4	2.9
2020 年	4 季度	-1.6	-2.0	-4.5
		-4.1	-12.3	-6.8
	1 季度	-1.6	-6.0	-4.0
	2 季度	-5.3	-22.0	-3.9
	3 季度	-8.0	-15.4	-12.9
	4 季度	-2.1	-6.2	-6.3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20 年		-6.6	1.19	2.8
	2 月	-4.6	1.45	2.4
	3 月	-4.8	1.40	2.5
	4 月	-12.8	1.30	2.6
	5 月	-17.7	1.18	2.8
	6 月	-10.4	1.12	2.8
	7 月	-11.0	1.09	2.9
	8 月	-5.4	1.05	3.0
	9 月	-5.8	1.04	3.0
	10 月	-2.3	1.04	3.1
	11 月	-1.0	1.05	3.0
	12 月	1.4	1.05	3.0
2021 年	1 月	-2.0	1.10	2.9
	2 月		1.09	2.9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日元								单位:%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月份		(%)	(%)		(%)	(%)										
2020 年	684005		-11.1	678371		-13.7	5634	2019 年		2.0	0.0	-1.2	2.9	7.0	5.0	
3 月	57409	-8.9	-11.7	60339	6.7	-5.0	-2931	1 季度	1.8	1.4	0.7	1.9	6.8	5.1		
4 月	50883	-11.4	-21.9	60704	0.6	-7.0	-9821	2 季度	2.1	-0.9	0.4	2.9	6.7	5.1		
5 月	45895	-9.8	-28.3	54391	-10.4	-25.9	-8496	3 季度	2.0	0.0	-2.8	3.3	7.3	5.0		
6 月	47809	4.2	-26.2	53760	-1.2	-14.1	-5952	4 季度	2.3	-0.6	-3.0	3.7	6.8	5.0		
7 月	52467	9.7	-19.2	52328	-2.7	-22.0	139	2020 年	-0.9	-8.3	-6.2	3.1	2.8	-2.0		
8 月	55603	6.0	-14.8	53180	1.6	-20.4	2423	1 季度	1.4	-1.4	-9.1	2.5	3.7	3.0		
9 月	60302	8.5	-4.9	54679	2.8	-17.1	5624	2 季度	-2.7	-18.7	-9.0	0.4	0.4	-5.3		
10 月	62474	3.6	-0.2	56685	3.7	-13.1	5790	3 季度	-1.1	-8.6	-3.6	4.3	2.7	-3.5		
11 月	61714	-1.2	-4.2	55237	-2.6	-11.0	6477	4 季度	-1.2	-4.3	-3.0	5.1	4.5	-2.1		
12 月	63215	2.4	2.0	55511	0.5	-11.5	7704	2021 年								
2021 年								1 季度						4.5		
1 月	65718	4.0	6.4	59626	7.4	-9.5	609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2 月	62566	-4.8	-4.5	62676	5.1	11.8	-110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3 月	65237	4.3	16.1	62259	-0.7	5.7	2978	单位:%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0 年		70581	183174	-112593			
	2 月	722	12302	-11580			
	3 月	4604	23273	-18669			
	4 月	-670	17753	-18423			
	5 月	2966	13694	-10728			
	6 月	48686	30916	17770			
	7 月	-602	19644	-20246			
	8 月	4223	10083	-5860			
	9 月	6158	7920	-1762			
	10 月	-1888	6993	-8881			
	11 月	4056	8690	-4634			
	12 月	7381	18596	-11215			
2021 年							
	1 月	11122	27826	-16704			
	2 月	1293	13031	-11738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2.4	1.3	0.8	1.8	7.3	2.5							
	4 季度	2.3	1.2	1.1	1.7	5.4	2.7							
2019 年		1.9	1.5	0.2	1.4	4.8	1.3							
	1 季度	1.7	1.7	0.0	1.2	5.7	0.4							
	2 季度	2.1	1.5	0.9	1.5	5.4	1.1							
	3 季度	1.9	1.4	0.1	1.3	4.6	1.5							
	4 季度	1.7	1.2	-0.5	1.6	3.3	2.1							
2020 年		-5.3	-9.9	-6.9	-4.1	-6.8	-2.9							
	1 季度	-0.3	-2.2	0.1	-0.3	4.0	1.4							
	2 季度	-12.5	-21.4	-17.5	-10.9	-24.4	-7.8							
	3 季度	-5.2	-8.5	-6.2	-3.9	-7.3	-3.5							
	4 季度	-3.2	-7.3	-4.1	-1.1	0.4	-1.8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9 年		2.0	0.0	-1.2	2.9	7.0	5.0
	1 季度	1.8	1.4	0.7	1.9	6.8	5.1
	2 季度	2.1	-0.9	0.4	2.9	6.7	5.1
	3 季度	2.0	0.0	-2.8	3.3	7.3	5.0
	4 季度	2.3	-0.6	-3.0	3.7	6.8	5.0
2020 年		-0.9	-8.3	-6.2	3.1	2.8	-2.0
	1 季度	1.4	-1.4	-9.1	2.5	3.7	3.0
	2 季度	-2.7	-18.7	-9.0	0.4	0.4	-5.3
	3 季度	-1.1	-8.6	-3.6	4.3	2.7	-3.5
	4 季度	-1.2	-4.3	-3.0	5.1	4.5	-2.1
2021 年							
	1 季度					4.5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0 年		9.5	4.4	29.2	13.2	10.4	5.8							
	3 月	7.8	4.0	30.1	12.2	8.8	4.7							
	4 月	13.0	4.0		12.6	23.5	5.8							
	5 月	13.7	4.1		12.9	21.7	6.1							
	6 月	12.3	4.1	23.3	13.3	10.2	6.2							
	7 月	10.9	4.3		13.8	7.4	6.3							
	8 月	10.2	4.5		14.4	8.4	6.4							
	9 月	9.0	4.8	30.8	14.6	6.7	6.3							
	10 月	8.9	4.9		14.3	7.0	6.3							
	11 月	8.5	5.0		14.1	6.5	6.1							
	12 月	8.8	5.1	32.5	13.9	9.1	5.9							
2021 年														
	1 月	9.4	5.0		14.2	6.5	5.8							
	2 月	8.2	4.9			6.9	5.7							
	3 月	7.5				6.5	5.4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20 年		3.9	4.4	5.5	3.9	2.4	6.0							
	3 月	3.8	2.9	4.2	3.8	2.2	5.0							
	4 月	3.8	4.7	5.2	4.1									
	5 月	4.5	4.2	5.9	4.2									
	6 月	4.3	5.5	6.2	4.0	2.7								
	7 月	4.2	5.4	6.1	3.9									
	8 月	3.2	5.2	6.1	3.8									
	9 月	3.9	5.1	6.4	3.8	2.5	7.1							
	10 月	4.2	4.7	6.4	3.8									
	11 月	4.1	4.4	6.3	3.8									
	12 月	4.6	3.8	6.6	3.8	2.4								
2021 年														
	1 月	5.4	4.7	7.0	3.8									
	2 月	4.0	4.4	7.2	3.7									
	3 月	3.9	3.9	6.8	3.7									

注:(1)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2)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3)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为半年度数据。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3908	4196	-288	4033	6347	-2314
2 月	335.3	345.4	-10.1	355.6	505.7	-150.1
3 月	345.3	361.5	-16.3	353.0	513.6	-160.6
4 月	231.3	264.2	-32.9	295.2	367.8	-72.6
5 月	243.8	252.3	-8.5	267.7	361.5	-93.7
6 月	303.3	328.6	-24.4	306.0	480.9	-174.9
7 月	320.7	354.2	-33.6	321.4	516.8	-195.4
8 月	329.6	363.2	-33.6	303.7	533.0	-229.3
9 月	352.9	375.1	-22.1	336.8	644.9	-308.2
10 月	361.1	391.6	-30.5	371.1	639.8	-268.7
11 月	357.0	376.5	-19.1	375.8	642.1	-266.3
12 月	372.1	373.5	-0.4	377.6	598.8	-221.2
2021 年						
1 月	368.9	349.5	19.4	277.5	463.6	-188.4
2 月	357.1	343.9	13.2	357.8	470.2	-112.5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858	689	170	2128	1605	523
3 月	70.9	56.5	14.4	188.1	145.2	42.9
4 月	28.4	47.4	-19.0	176.1	116.1	60.0
5 月	56.0	47.2	8.7	175.3	133.9	41.4
6 月	67.7	40.6	27.1	175.2	104.5	70.7
7 月	73.1	50.8	22.3	194.5	115.1	79.5
8 月	75.4	52.9	22.5	174.8	111.3	63.5
9 月	80.9	61.0	19.9	182.6	123.0	59.7
10 月	90.6	68.7	21.9	177.0	123.8	53.2
11 月	88.8	65.5	23.3	174.3	138.0	36.3
12 月	83.8	63.0	20.8	184.7	184.1	0.6
2021 年						
1 月	72.4	64.6	7.8	149.5	159.3	-9.9
2 月	86.7	67.1	19.5	161.8	150.3	11.5
3 月				245.0	230.2	14.8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2754	3685	-931	3322	2414	908
3 月	213.8	311.7	-97.9	300.0	205.4	94.5
4 月	102.7	171.2	-68.5	249.7	175.9	73.9
5 月	191.0	222.0	-31.0	209.9	172.4	37.5
6 月	219.1	211.1	7.9	244.9	191.2	53.7
7 月	236.4	284.7	-48.3	246.1	198.0	48.1
8 月	227.0	294.7	-67.7	232.3	200.2	32.1
9 月	275.8	303.1	-27.3	309.6	205.6	104.0
10 月	248.2	336.0	-87.8	284.1	219.5	64.6
11 月	235.2	333.9	-98.7	298.5	238.2	60.3
12 月	271.5	425.9	-154.4	354.4	251.1	103.3
2021 年						
1 月	274.5	419.9	-145.4	268.3	175.0	93.3
2 月	279.3	405.5	-126.2	292.7	209.5	83.2
3 月	344.5	483.8	-139.3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5125	4676	449	4177	3832	345
3 月	461.7	418.0	43.7	383.4	350.1	33.4
4 月	362.7	379.3	-16.6	233.9	264.7	-30.9
5 月	348.5	346.6	1.9	180.7	215.9	-35.2
6 月	392.1	357.9	34.2	330.8	275.3	55.5
7 月	427.9	388.5	39.4	356.6	298.6	58.0
8 月	394.7	358.2	36.5	369.8	308.6	61.2
9 月	478.2	394.0	84.2	385.5	341.6	43.8
10 月	448.2	390.9	57.3	419.5	357.2	62.2
11 月	457.5	399.4	58.1	383.2	352.9	30.3
12 月	513.3	446.4	66.9	431.6	369.0	62.6
2021 年						
1 月	480.2	442.6	37.6	327.0	339.4	-12.4
2 月	448.1	421.1	27.1	361.9	335.1	26.8
3 月	538.0	496.5	41.5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5488	5698	-210	3454	2866	588
3 月	445.3	482.0	-36.7	282.7	254.8	27.8
4 月	443.9	452.5	-8.6	252.4	229.7	22.7
5 月	460.7	443.9	16.8	270.0	222.8	47.2
6 月	426.9	457.8	-31.0	271.3	222.9	48.4
7 月	461.0	477.3	-16.3	282.0	228.3	53.7
8 月	495.6	482.6	13.0	311.7	247.1	64.7
9 月	545.7	518.2	27.5	307.1	235.8	71.4
10 月	472.5	504.0	-31.6	322.3	247.7	74.6
11 月	523.0	531.9	-8.9	319.9	267.2	52.7
12 月	531.5	574.5	-43.0	330.0	272.4	57.6
2021 年						
1 月	520.3	547.8	-27.5	342.7	280.8	61.9
2 月	410.9	427.0	-16.1	277.9	232.8	45.1
3 月				358.9	322.3	36.6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0 年	2706	2529	177	1631	1416	215
3 月	241.3	221.5	19.8	140.7	133.5	7.2
4 月	175.8	185.2	-9.4	121.6	125.4	-3.8
5 月	191.9	181.8	10.1	104.5	84.4	20.1
6 月	225.6	207.1	18.5	120.1	107.6	12.5
7 月	248.7	221.0	27.7	137.0	104.6	32.4
8 月	265.0	230.0	35.0	131.0	107.4	23.5
9 月	271.6	242.0	29.6	139.6	115.7	23.9
10 月	272.6	243.2	29.4	143.6	107.9	35.8
11 月	252.4	246.9	5.5	152.8	126.6	26.1
12 月	276.5	279.0	-2.5	165.4	144.4	21.0
2021 年						
1 月	285.5	264.6	20.9	152.9	133.3	19.6
2 月	200.0	208.0	-8.0	152.6	132.7	19.9
3 月	286.0	282.0	4.0	183.6	167.9	15.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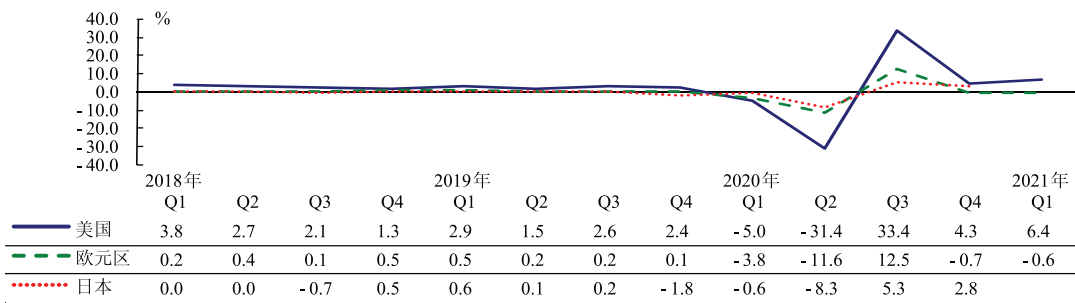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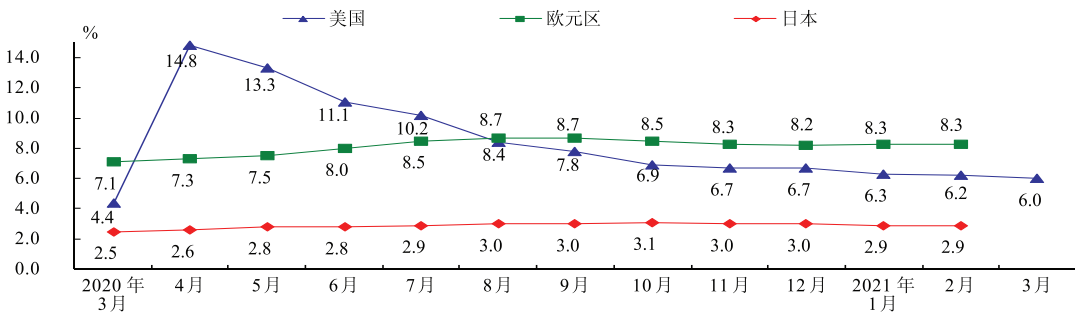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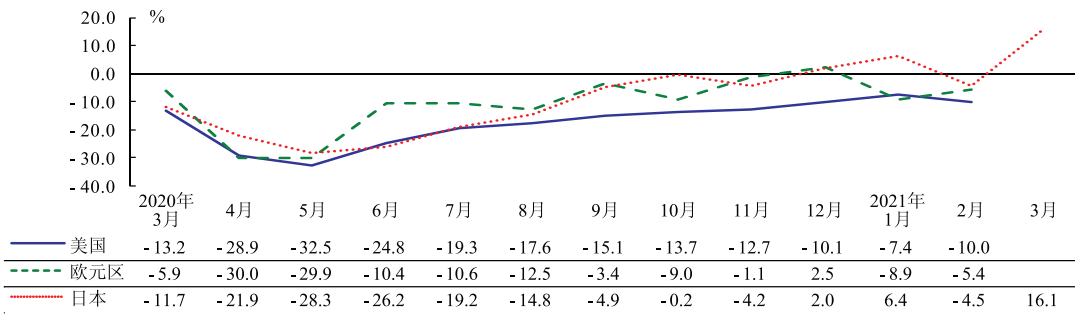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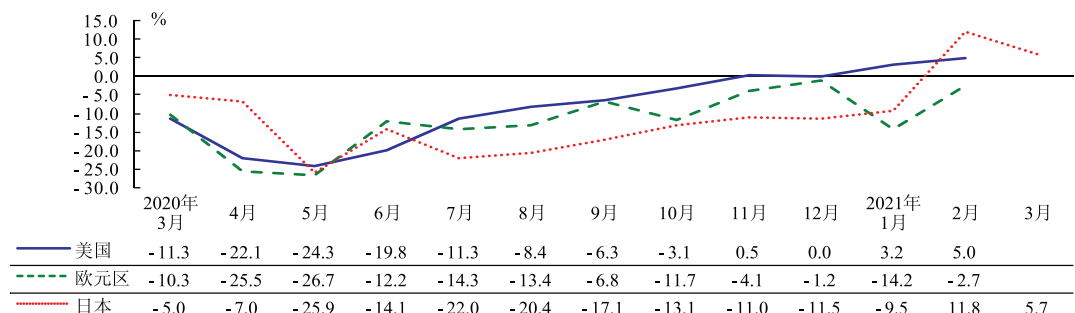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ABSTRACTS

(1)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Low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Rural Areas

Ma Xiaoh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low and middle income rural residents. There are 3 ways to measure low and middle income earners, and the third method is suitable for China. According to the exclusion method,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calculated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or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group in China’s rural area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middle income is slow,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slowdown in farmers’ income growth, the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yield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o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slowdow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basic systems.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a ten-year income doubling plan for low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crease support for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implement special employment projects for the group in rural areas, and implement “Complete cancellation” “Comprehensive relaxation” of the policy for the settlement of agricultural migrants in cities, and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2)Prospective Assessment for the Risks of Financial Frictions Faced by Large Banks

Huang Zhiling

I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chieve its own political or strategic goals from the trade field, or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suppress China’s development, etc., it will be inevitable that trade frictions will escalate to the financial field. In extreme situ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llowing blockade or attack measures may be taken against domestic commercial banks: First,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banned, trading channels are blocked, and sanctioned banks are prohibited from entering the America’s financial market or even the maj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The second is to cut off the liquidation system, blocking the sanctioned banks’ U.S. dollar and even other foreign currency clearing channels; The third is IT technology blockade or attack, the sanctioned banks are prohibited from using the I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rvices of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echnical attacks are adopted in extreme scenarios. As the domestic commercial banks rely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operations,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prepare emergency plans in advance for various extreme scenarios that may occur. The first is to expand trading channels; The second i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isk of restricted international clearing; Third, in response to the US IT technology blockade, emergency plans can also be prepared for several possible sanctions situations; Third, in response to the US IT technology blockade, emergency plans can also be prepared for several possible sanctions situations.

(3)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Demand-side Reform During the “Post-Pandemic and New Economy” Era

Jia Ka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COVID-19 has severely impacted human social life, so far, there are obvious uncertainties about its changes,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China has taken the lead in opening the post-Pandemic era.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be fully ideologically prepared to fight the “protracted war”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conduct target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and the specific major social need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n discuss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the “New economy” and related “Demand-side Reform”, and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4) Research on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Based on Full-link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Case Study of Alibaba International Station

Wang Xiaohong, Xia Youren, Mei Guanqun, Liang Peng, Guo Xia, Li Rui

Since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xpedited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de and the growth of new formats and models,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represented by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becoming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foreign trade format innovation and a new engine for foreign trade growth.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studies and judg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in the world and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China’s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using Alibaba International Station as a case.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position of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ill be further highlighted, which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he future global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 will also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focused on domestic flows while facilitating positive interplay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low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take new digital foreign trade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a smooth double dual,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foreign trade with institutional opening, strengthen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foreign trade platforms.

(5) The World Economy is in Deep Recession and Recovery Faces Potential Risks ——Review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0 and Outlook for 2021

Zhang Guohong, Li Jingjing, Wang Tingxi, Hao Yue, Hu Chenpei

In 2020, the COVID-19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causing a broad and deep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the global economy has suffered the most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In terms of major economic sectors, the world’s industrial production has experienced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volume of trade in goods has fall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has experienced fluctuation. In terms of major economies, the econo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zone, and Japan have experienced a sharp declin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emerging economies has fallen sharply. With the glob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plan,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economy has gradually subsided, and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expected to fully resum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OECD forecast, the world economy is expected to return to a positive growth of 5 – 6% in 2021 on the basis of a 3 – 4% contraction in 2020. However,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rapid virus mutation, unfair vaccine distribution, and rising global debt risks have increa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economic recovery.

(6)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of the World Factory: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n Jiqiu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uccessively become the largest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brought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expanding trade deficit, industrial relocation,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The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ed a trend of stagnation 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fter reaching the top of the world, and it was surpas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half a century; The U.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developing towards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reaching the top in the world, it still controls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through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reason why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when it compares with the UK, because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a huge domestic market and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liberalization of reciprocal trade. The US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opts strong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potential competitors. At present, the scal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urpasse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become a veritable world factory, it must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ationally treat the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be wary of the prematur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se phenomena, which will evolve into major risks and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power.

(7) The Impact of U. S. Tax Reduc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u Xuchang

In recent years, major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djusted their tax policies, creating tax competition pressure on China. United States' tax policy adjustments are representative and important in terms of tax reform content and global impac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ax reductio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80 has promo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form of equity investment other than the reinvestment of earnings, but there is a lagging phenomenon. FDI in the form of income reinvestment and related debt has a rapid impact, bu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ax reduction can stimulate an increase in income reinvestment, but FDI inflows in the form of linked debt will de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ax cuts have the most obvious positive impact on manufacturing FDI.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ax re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my country's tax system, first is to steadily promote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and second is to optimize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s; the third is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8) Research on Energy Issues in the Arctic Region

Wei Yu, Chen Wenhui

Global warming has gradually made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a reality. Although the Arctic region contains huge energy resources, considering the cost, environment, energy prices, and geopolitics, full-scale exploitation of oil and gas is not easy, prospects for renewable energy exploit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Arctic region are promis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tend to become the leader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Arctic energy, and there are continuous new measures in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China's energy coope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Arctic is gradually getting better, but as a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In the futu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Arctic region will intensify, the process of China's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depends o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companies to explore new technologies and open up new renewable energy markets in exploring Arctic energy.

(9)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Yan Shaojun

As the flagship project and model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has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other visible results. While boosting Pakist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provided a good exampl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has gathered more consensus. In particular, in the face of various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As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continue to expand, the cont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orridors has entered a new step of substantial and expand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t some new challenges have also emerged.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s continue to evolve, it need to deal with them cautiously, continue to firm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corridors with Pakistan, 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unique strategic value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and better layout, Plan and plot to resolve possi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build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nto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ditor: Zhao Ze